

世新大學
性別研究
碩士學位論文

中港經濟融合下的跨境婚姻探究

指導教授：夏曉鵬 教授
研究生：劉升平 撰

中華民國一零六年一月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Cross-border Marriag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in the
Era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dvisor : Hsiao-Chuan Hsia, Ph.D.

Graduate Student : Sing-PingLau

January 2017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謝誌

論文終於走到終點，沒想到我真的堅持下來了，開始的半年一度想要放棄，愈做下去，愈感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祝福、受訪者的熱心分享、當然還有指導教授的認真回饋，不做下去不行呵，怎麼好意思辜負他們！還有，有伙伴一齊拚、一起寫、一起討論、一起大吃、一起憂慮，不怕！

對台灣留學的無知和美好想像，讓我快樂地踏上了飛機(當時真的不知道畢業要這麼難)。來到台灣，同學、老師、所上秘書對我這個來自香港的外人很友善，每當我需要幫忙他們都會伸出援手，有時上課和日常有人講了台語，身邊總會有人主動給我解釋和翻譯，又或者順便教我幾句。倒是社會系統的安排讓我有時覺得錯亂，暮然醒悟「外來者」的身份，尤其找工作和申請獎學金的事讓我深刻感受到社會制度和國家之間的政治形勢對非本地人的影響。這種感覺喚起了我初到香港的回憶，以及作為移民，一直背負著的身份迷茫。或許是由於我勇氣不足，以致於打算借由論文的機會去面對我一直忽略的移民經驗。在訪談時，我才意識到，訪談者跟我都是同一個年代出生，就在聊著他們作為女人、作為工人、作為移民、和作為留學生的經驗，他們的話打到我的心上，好像回答了藏在我心裡的疑問。或許，這也是讓我必須寫下去的力量。感謝你們的信任！

依方 yvonne

2017年2月5日

論文題目：中港經濟融合下的跨境婚姻探究

校所名稱：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班

畢業時間：2017年（二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劉升平指導教授：夏曉鵬

論文摘要：

世界體系的分工一直在變動，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持續強勁，中港兩地在世界體系的位置一時難以辨別高低。中港融合計劃和階級主義移民制度讓中港婚姻持續發生並繼續成為香港婚姻的主要模式之一，以及促成了多種類型的中港婚姻配對，例如香港妻內地夫，以及高學歷中港夫妻等。近年到香港定居的內地女性比起早年的移民女性無論在學歷、社經地位均較為優勢，中港男女的社經背景差距正在縮小。不過，即使男女的經濟能力相約，男性仍然被期待要「養家」、能力要比妻子強，「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根深柢固。

香港和內地女性經濟能力提升，從事全職工作的女性的收入對家庭經濟有著重要的貢獻，動搖了跨國婚姻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別分工想像；女性經濟獨立有助於提升家務分工的議價能力，高學歷女性更會要求伴侶分擔家務。雖然，高學歷香港男性和基層內地男性願意主動分擔家務，用以建立關係的親密感和表達對配偶的情感。不過，家務勞動仍以女性為主要承擔者，經濟充裕的家庭可以以外包方式把家務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和本地勞動階層女性身上；而基層家庭則由移民女性或者同住母親來處理。

【關鍵字】 跨境婚姻、中港婚姻、上嫁下娶、家務分工、性別分工

**Cross-border Marriages of China and Hong Kong
in the Era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Student :Lau Sing Ping

Advisor :Prof. Hsia, Hsiao-Chuan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For Gender Studies

Thesis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 division has been changing. The economy of China has gone up and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ether China or Hong Kong is more dominant in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f division. The Hong Kong-China integration programs and immigration policy have made Hong Kong-China marriages to be one of the main modes of marriage in Hong Kong, and also have facilitates diversified types of marriage matching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such as Hong Kong wife and mainland husband, and cross-border couples with high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Mainland women who settle in Hong Kong had a higher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than earlier immigrant women. Although the economic capacities of men and women are getting similar, men are still expected to be the "bread-earner". The idea of hypergamy is still prevalent in China and Hong Kong.

Women have improved their economic abilities, and working women hav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family. They change the stereotyped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 On the one hand, the economic independency helps women increase bargaining chips and thus they can ask husband to share housework. On the other hand, high educated husband and the mainland husband are willing to share housework and thus to establish intimacy relationship and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their wife. However, women still have to do most housework. Bourgeoisies can lower the workload by hiring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working-class families would ask immigrant women or their mother to share the housework.

【Keywords】 Cross-border marriages, Hong Kong-China marriage, hypergamy,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目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緣起	1
第二節研究動機	3
壹、 中港婚姻的普遍性	4
貳、 中港婚姻的新趨勢	6
參、 移居香港的雙管道	9
肆、 個人移民經驗的連結	10
第三節問題意識	12
壹、 中港婚姻何以持續發生？	13
貳、 變動中的國際位置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15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17
第一節全球城市的階級主義移民制度	17
第二節中港婚姻的轉向	20
壹、 國際分工位置的影響	21
貳、 「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和實踐	22
參、 「下嫁上娶」的跨國婚姻	24
肆、 當代婚姻的實際需求	25
伍、 中國年青人親密關係的轉變	26
第三節變動局勢中的中港夫妻的性別分工	27
壹、 「上嫁下娶」的家庭分工	27
貳、 家務分工的轉變	28
第三章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30
第一節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30
第二節研究範圍時間、對象	30
第三節方法選取及步驟	31
第四節訪談對象介紹	33
第五節反思及限制	35
第四章經濟帶動的中港婚姻和移民制度轉變	37

第一節兩地經濟發展和中港婚姻的變化.....	39
壹、 90年代前：首波大型中港婚姻潮.....	39
貳、 1990年至2010年：經濟轉型跨境工作湧現.....	40
參、 2010年及後：中港婚姻高學歷、中產化.....	46
肆、 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城鄉差距.....	48
第二節以全球城市作為亞際競爭出路.....	53
壹、 競逐人才提升競爭力：專才移民計劃的放寬.....	54
貳、 更有經濟潛力的人才：非本地學生.....	55
參、 官方對家庭團聚移民的曖昧立場.....	58
第三節差別待遇的移民制度：內地專才 V.S.家庭團聚.....	60
壹、 單程證申請流程.....	60
貳、 就學簽證申請流程.....	61
參、 階級篩選制度對基層婚姻移民的影響.....	64
第四節基層和高學歷中港夫妻差異.....	66
第五節小結.....	69
第五章共同生活的追求.....	72
第一節中港夫妻定居考慮.....	72
壹、 以小孩利益作為考慮.....	73
貳、 以家庭收入作為考慮.....	74
第二節基層家庭的困難.....	76
壹、 短期簽證的影響.....	76
貳、 公共服務的排擠.....	78
第三節小結.....	81
第六章中港婚姻的面貌.....	83
第一節 結婚的考慮.....	83
壹、 「結婚」的緊箍咒.....	83
貳、 作為維持關係的一種策略.....	87
參、 作為長期共同生活的前提.....	88
肆、 「合適」的結婚伴侶.....	89

伍、 階級品味的婚姻選擇	91
第二節變動的局勢不變的「上嫁下娶」婚姻觀	95
壹、 香港男性優勢滑落	95
貳、 家長對男性配偶的經濟擔憂	97
第三節小結	99
第七章不一樣的性別分工？	101
第一節基層中港家庭的分工：「真的很辛苦」	101
壹、 沒有薪酬的工作	101
貳、 履行性別角色的壓力	105
參、 生產和再生產的兼顧	107
第二節高學歷中港家庭：「我們一起做」	111
第三節香港妻內地夫的家務分工：「都是他做的」	113
第四節小結	116
第八章結論	118
第一節研究結果	118
第二節反省及未來研究建議	120

表目錄

表 1- 1：1991 年至 2015 年香港婚姻數量及組成.....	6
表 1- 2：新來港家庭 1998 年至 2015 年每月收入.....	8
表 2- 1：香港各項就業計劃簡介.....	18
表 2- 2：香港就學計劃簡介.....	19
表 3- 1：內地女性受訪資料.....	33
表 3- 2：內地男性受訪資料.....	33
表 3- 3：香港女性受訪資料.....	34
表 3- 4：香港男性受訪資料.....	34
表 3- 5：不同類型的中港婚姻配對.....	34
表 4- 1：1995 年至 2010 年在內地工作從事的主要行業.....	41
表 4- 2：1995 年至 2010 年跨境工作人口資料.....	42
表 4- 3：2009 年至 2014 年度香港每年核發的學生簽證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回港就業安排」簽證數量.....	56
表 4- 4：內地女性和香港配偶背景資料.....	68
表 4- 5：香港女性和內地配偶背景資料.....	69
表 4- 6：不同時期的中港婚姻新增類型.....	70

圖目錄

圖 4- 1：2000 年後香港移民制度和全球城市經濟的兩極化發展	71
---	----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緣起

中港婚姻在 90 年代末開始被大肆報導，報導焦點在於基層移民女性騙取社會資源和新來港的家庭暴力，這些故事的主角都有很類似的特質：貪婪、無知、落後。更有團體聲言新來港人士¹拖香港後腿，暗示了新來港人士在各方面表現跟不上香港水準（香港商報，2014 年 3 月 22 日；鄭治祖，2014，轉自崔志輝，2014）。兩地政治經濟在這十幾年不斷改變，中港婚姻無論在類型和階層都有所變化，社會大眾和媒體對於中港婚姻依舊保有一種刻板印象，學術研究主要呈現基層中港婚姻的面貌，以下將會以 2 個內地移民女性的經歷，來看看中港婚姻的變化。

黃槿的故事

再次看到瘦小的黃槿，有點仿如隔世。她面容沒變，依然綁著黑色長髮，可是胸前多了個小嬰兒，還有背著裝滿小嬰兒物品的背包，看到我連忙說：「不好意思，小孩早上有點不舒服，晚了出門，我們快點開始」。黃槿是我工作時認識的內地移民女性之一，她在社區教育活動中擔任導師角色，她講解有條不紊，反應敏捷，特別擅長和公眾互動、溝通；她的參與並不穩定，有時一個多月都沒能見到她一面。這次訪談是我們道別 2 年多的首次見面。

黃槿出生於廣東省廣寧縣的一個農村，廣寧又有竹鄉之稱，現在以農業和工業為主要經濟產業，二十一世紀逐漸發展旅遊業和商業。1998 年，黃槿高中畢業便和朋友離開了家鄉到廣州找工作，她試過在廣州的菜市場開糧油雜貨店、在餐廳當服務生，也試過在製衣廠和駕駛學校當文員，離家在外工作多年，黃槿覺得工作辛苦卻沒有什麼不習慣，只是家人一直覺得黃槿沒有結婚，就著急起來，嫁去香港的姨媽也開始幫忙介紹香港男生給她認識，由於覺得不投緣，她們就沒有繼續發展。黃槿年齡將近 30，家裡要她結婚的聲音也更大了，姨媽再次給黃槿介紹香港男生相思。這一次，黃槿覺得和相思聊得來又投契，他們每天靠著電

¹香港社會大眾一般把從內地移居到香港的人士稱為新移民，近來愈來愈多人採用「新來港人士」一詞。如何界定「新」來港，香港官方界定通常以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作為分水嶺，把所有未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亦即居住不足 7 年人士）統稱為新來港人士，下文會按照表達需要，交替使用「新移民」、「新來港人士」簡稱從內地移居到香港的人士。

話維繫感情，相思偶爾在假日到廣州找黃槿，就這樣遠距離拍拖一年多，黃槿申請旅遊簽證到香港登記結婚。

受限於移民管制，香港居民的內地配偶必須先在戶籍地取公安局得《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²，才可以合法移居到香港長期居留。港澳通行證的配額限定每天 150 個，長期累積下來的婚姻移民申請眾多，在 90 年代時等候需時約 10 年左右，而從二十一世紀，等候年期下降至最少 6 年，近來減少至 4 年或以上才能取得通行證。黃槿 2010 年結婚，終於在 2015 年正式取得單程證在香港長期定居。這 5 年等候期間，黃槿只能以三個月探親方式留港生活，照顧家庭；由於未取得香港身份證，她也沒有辦法在香港工作，家庭的經濟收入主要由相思支撐，相思在酒樓當廚師，收入一萬八港幣左右，還好他們住在公共房屋，租金相對便宜，可以勉強支撐多人生活。黃槿、相思和婆婆、公公、小姨一起住，公公已經退休、婆婆平常去做兼職工作，黃槿負責家務勞動。

傘樹的故事

傘樹在 80 年代初出生於上海，2003 年大學畢業憑著優秀的成績考入了英國一所有名的大學修讀碩士課程，2005 年再到香港繼續進修。在香港同學的教導以及自學下，傘樹很快學會了廣東話，並在香港結識了愈來愈多的朋友。後來，在朋友的婚禮上，傘樹認識了在大學教書的蒲葵；一年後他們在街頭重遇，聊著貓咪兩人熟絡起來。除了喜歡貓咪，他們有聊不完的話題，兩人的價值觀一致，尤其對於平等、自由與人權的看法更甚。傘樹和蒲葵戀愛數月便開始了同居生活，隨後在 2010 年在香港登記結婚。傘樹覺得蒲葵一家人對自己很好，婆婆沒有同住，也會主動為他們準備飯菜和湯，就算兩代人在相處上有不同的喜愛和習慣，雙方可以透過溝通，互相遷就和磨合。

同居初期，傘樹覺得突然和另一個人分享生活空間，有很多不習慣。尤其蒲葵當時並不太會做家務，傘樹用了很多心思、耐心地教導著蒲葵要如何去做家務，縱然蒲葵很願意去嘗試，不過，過程充滿挑戰和障礙，讓傘樹感到沮喪和不開心。加上婚後，傘樹轉為全職大學講師，工作時間愈來愈長，無法再像就學時期一樣

²單程證是專門給內地居民因「家庭團聚」因素而到港定居的證件。根據《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暫行管理辦法》第 12 條的規定，持證人應當在前往香港、澳門之前，到所在地公安派出所註銷戶口，並在規定的時間內前往香港、澳門。因此，前往港澳通行證就被民間稱為「單程證」(one way permit)。而往來港澳通行證，則是發給內地公民短期前往香港、澳門的通行證，持證人須在規定時間內前往並按期返回，民間稱為「雙程證」(two way permit)。另外，持單程證到港定居人士需要連續在香港居住 7 年才具資格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負責大部分的家務勞動；兩人經過協商，聘請了一位鐘點家務工來處理住所的清潔。

兩地政府對就學、就業人士和婚姻移民的移出移入管制非常不同，就學、就業人士須向內地公安機關申請「往來港澳通行證」（俗稱雙程證）和「逗留簽注（就學）／（就業）」，需時約兩至三星期。在香港居留時期，內地就學、就業人士可以獲發香港身份證；連續居留 7 年或以上，便具有資格申請成為永久居民³。傘樹取得博士資歷和香港永久身份後，在香港的一所大學先找到了兼職講師的工作，之後再次應徵，取得全職的教職職位。傘樹原本打算畢業了就回上海，可是沒想到竟然在香港成家立業，傘樹覺得和配偶一起生活而不在父母身邊，對他們有所虧欠。父母對於女兒不靠人脈，獨自在香港打拚感到自豪，另一方面又很擔心傘樹沒人照顧，一直催促她結婚。雖然傘樹的配偶不是上海本地人，不過比起不結婚，父母樂於接受愛護女兒的香港女婿。傘樹父母會持雙程證和「旅遊簽注」到香港探望傘樹，隨著日益嚴重的中港矛盾，他們近年來減少了到香港的次數。

黃槿和傘樹是配在中港婚姻的兩種典型例子，基層和高學歷中港婚姻，他們的教育背景、社經地位、居港的方式、居留地／公民權的考慮，以至於家庭分工和家務分工都非常不同。Beck&Beck-Gernsheim(2014)察覺到全球化之下，資本和勞動力正在穿越民族國家的界限，家庭的形式起了變化，他們更形容世界家庭和普通家庭是連續光譜的兩端，其中存在無數的家庭形態。Beck&Beck-Gernsheim把家庭多元化的型態比喻為光譜，強調了當代家庭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同時提醒了我：在經歷中港兩地經濟變動的同時，中港家庭形態同樣變得多樣和複雜，此研究嘗試把中港婚姻研究對象從慣常的基層群體擴闊至被忽略的高學歷群體，把基層和高學歷中港婚姻作為中港家庭的兩端型態，發掘兩地政治經濟產生了怎樣的變化，以至於影響了中港婚姻產生了新的型態。

第二節研究動機

中港婚姻的研究碩果纍纍，尤其內地移民女性在香港生活的面貌更有豐富的探究，其中 Newendorp 的著作《Uneasy Reunions: 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Family Life in Post 1997 Hong Kong》除了探討了內地妻子和香港丈夫長期分離的

³根據 1997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的《入境條例》附表 1 第 2 段 b 項：在香港特區成立以前或以後通常居於香港連續七年或以上的中國公民。

婚姻經驗，更嘗試以內地移民女性向社會服務尋求協助的經驗，探究香港社會的理想公民意識如何影響了這些女性在香港生活的融入和被排斥。此書獲得 2009 年東亞人類學協會的年度書籍獎項⁴，肯定了 Newendorp 的貢獻和此研究的價值。2001 年至 2002 年期間，Newendorp 在香港接觸了大量中港婚姻的內地移民女性⁵，並把她們分成 2 類，一是來自於廣東省的農村，她們年齡較大(40 至 60 歲)、學歷較低，因為婚姻從農村去到香港；而她們的香港丈夫於 60 至 80 年代間從內地偷渡到香港，其後取得了合法的居留身份；這類型的數量日漸減少。另一類的內地移民女性比較年輕(25 至 39 歲左右)，來自中國不同省份，多數具有中學學歷，畢業後從農村老家到廣東省或者深圳經濟特區的工廠工作，經由工作認識香港男性，或者由朋友親戚介紹到深圳消遣或回鄉探訪的香港男性。Newendorp 的研究中，兩類內地移民女性都是來自農村的基層女性，較年輕的後者受經濟改革的影響，在結婚前都有移動到廣東省大城市工作的經驗，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變遷。黃槿的故事是基層中港婚姻的一個典型例子，基層中港婚姻是眾多中港婚姻研究聚焦的群體(洪雪蓮，1999；何雪松，2006；Law and Lee，2006；Newendorp，2008；彭澤生，2010；Ho et al.，2014)；而傘樹的故事則是高學歷中港婚姻的例子，雖然香港近年多次放寬人才移民限制，高學歷中港婚姻愈趨普遍，不過，由於內地移民長久以來被視為「社會問題」，高學歷內地移民無論在社經背景、就業狀況、甚至家庭分工方面都被認為與典型的中港婚姻南轅北轍，往往備受忽略，到目前為止未有學術研究關注此群體的狀況，以下將會指出中港婚姻的一些重要轉變：

壹、中港婚姻的普遍性

不少發達國家的未婚率都比上個世紀有所增加。2012 年，英國雜誌《經濟學人》(Economist) 報導，全球各地單身人口急增，越文明、越發達的國家，單身人口也越多，報導更以美國為例，指出 1950 年美國只有 22% 單身人口，獨居人口是 4%，到了 2012 年，未婚的成年人口占了成年人口一半，獨居率的增加到

⁴ 「She was awarded the 2009 Francis L.K. Hsu Book Prize by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nthropology's Society for East Asian Anthropology for her ethnography.」。資料來自哈佛大學的教師介紹：<http://socialstudies.fas.harvard.edu/people/nicole-newendorp>

⁵ Newendorp 是次在香港田野接觸了數百位內地女性和兒童移民，當中與 40、50 位內地移民和其家人持續互動的，以及有 15 位以上的關鍵報導人(key informants)，透過非正式互動和正式訪談，收集了大量的資料。

15%⁶。2016年12月有台灣媒體⁷報導日本單身率已榮登已發展國家之首，日本30歲以上未婚男性高達47%，人數是30年前的3倍多，30歲以上未婚女性高達32%，人數是30年前的4倍多。參考中國國家年度數據，直至2015年中國內地15歲以上的未婚人口接近2億；香港男、女性的未婚率從1991年至2011年期間分別上升至33.5%和29.2%，香港女性單身的狀況比起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大陸更為普遍(香港統計處，2013)。在單身熱潮之下，香港登記婚姻數量從90年代開始下降到3萬多宗，2003年以後數量卻維持在4萬至5萬宗，當中雙方為香港居民的數量從1991年的36,126宗下降至2002年最低點20,712宗，此後多年來出現反覆升降的情況，到了2013年有28,837宗，佔總體婚姻的52.2%，同年，中港婚姻則佔38.0%，而在港登記的中港婚姻在2005年以後，維持在2萬宗左右，數量相當穩定。

香港居民和大陸居民結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大陸居民以旅遊簽證到香港註冊，另外一種是香港居民在港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書」到大陸註冊。由於早期大陸對於簽發到香港的旅遊簽證控管相對嚴厲，很多香港居民都會採取後者的方式到大陸辦婚姻登記。以至於在2003年之前，在香港登記的中港婚姻數量不到一萬宗；同期，香港發出的「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維持在一萬多份至兩萬份(香港統計處，2015)。香港和中央政府聯手推動香港旅遊業，於2003⁸年7月28日開始開放港澳「個人遊」(又稱自由行)⁹，以及2009年推行的「一簽多行」¹⁰政策。由於到香港愈來愈便利，促成更多省份的大陸女生以遊客身分來港與香港男生註冊結婚。參考香港統計年刊(2015)數據，開放「自由行」的翌年，在香港登記結

⁶資料來自於蘋果日報，2012年8月28日報導：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20828/18001940>

⁷資料來自亞洲衛星電視寰宇新聞，播放日期2016年12月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y2n7N3oLQ>

⁸2003年經歷了SARS事件亦即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香港經濟受打擊，失業率上升；加上香港市民不滿香港政府管治的情緒高漲，導致7.1回歸紀念日舉行了回歸後最大型的遊行，人數達50萬。

⁹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劃範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簽注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以逗留一週。現時，49座中國大陸城市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訪香港旅遊。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及農曆新年等中國主要長假期——黃金週，曾是港澳個人遊的高峰期。資料來自於香港旅遊事務署：http://www.tourism.gov.hk/tc_chi/visitors/visitors_ind.html

¹⁰2009年，中央政府准許合資格深圳戶籍居民申請一年多次訪港「個人遊」簽注(一簽多行)。隨著自由行政策的出台，中國大陸旅遊來訪香港人次由2002年的638萬大幅度增加至2013年的4,075萬，佔每年訪港旅客總數的比例由41.2%急升至75%。資料來自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於2016年7月11日下載：

<http://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314rb06-individual-visit-scheme-201405-07-c.pdf>

婚的中港婚姻數量突破了 15,000 宗，推行「一簽多行」至今，每年約有 20,000 宗左右。同時，每年仍然約有五千名香港居民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書」到大陸註冊。中港婚姻近年維持在 26,000 宗左右(表 1-1)，2013 年在港登記的中港婚姻佔了香港結婚總數量的 38.0%。所以說，中港婚姻數量從 90 年代至今一直處於穩定的水準，在兩地政府聯手推行便利的旅行簽證措施之下，在港登記的中港婚姻數量有了明顯的提升。

表 1-1：1991 年至 2015 年香港婚姻數量及組成

年	香港登記			新郎為香港人新娘為內地人			新娘為香港人新郎為內地人			中港婚姻總數量
	婚姻總數	新郎新娘均為香港人	中港婚姻總數	香港登記	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	總計	香港登記	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	總計	
1991	42568	36126	680	590	20630	21220	90	1300	1390	22610
1996	37045	31143	2484	2215	22349	24564	269	1552	1821	26385
2001	32825	24176	5892	5169	13211	18380	723	1636	2359	20739
2002	32070	20713	8701	7724	10127	17851	977	1394	2371	20222
2003	35439	21441	11509	10185	7501	17686	1324	1083	2407	20093
2004	41376	23853	15014	13126	7842	20968	1888	1504	3392	24360
2005	43018	21102	19501	16775	8094	24869	2726	2193	4919	29788
2006	50328	25682	21588	18182	9963	28145	3406	3077	6483	34628
2007	47453	25280	18468	15978	5910	21888	2490	1825	4315	26203
2008	47331	26697	16615	14206	4797	19003	2409	1539	3948	22951
2009	51175	31227	16350	13751	4394	18145	2599	1595	4194	22339
2010	52558	27534	18659	15400	3791	19191	3259	1577	4836	24027
2011	58369	30903	20635	16506	3806	20312	4129	1738	5867	26179
2012	60459	32523	21860	16930	3691	20621	4930	1987	6917	27538
2013	55274	28837	21030	15737	3429	19166	5293	2151	7444	26610
2014	56454	30124	20698	15266	3379	18645	5432	2253	7685	26330
2015	51609	未有提供	17953	13123	3031	16154	4830	2306	7136	23290

資料來源：〈香港統計月刊 2016 年 9 月〉、〈香港統計年刊 2015〉、〈1991 年至 2013 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

貳、中港婚姻的新趨勢

中港婚姻分成香港男性居民與內地女性居民結婚，以及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的兩種類型。香港男性與內地女性結婚比例一直偏高，不過數目(包括獲發「無結婚紀錄證明書」)由 2006 年的高峰 28,145 宗下降到 2015 年的 16,154 宗；反觀香港女性與內地男性結婚的數目，由 1991 年的 1,390 宗大幅上升至 2015 年的 7,136 宗(表 1-1)，佔中港婚姻的 30.6%，相對於 1991 年的 6.1%，增長幅度的確是十分顯著。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趨勢是新來港家庭的每月收入增加，尤其高收入的家庭數量在 2009 年開始大幅增加(表 1-2)。新來港家庭收入來源主要來自工資，雖然多年來的每月收入水準有輕微增加(最近 20 年增加了\$3,100 港幣)，不過相較於全港家庭的收入水準，新來港家庭收入水準仍然屬於偏低；2011 年，當全港家庭的每月收入中位數高達\$20,500 港幣，新來港家庭的月入中位數約是\$8,000 港幣(人口普查，2011)。

民政事務總署根據新來港家庭的收入所得從最少到最高分成了 8 個級別(表 1-2)，值得注意的是，1998 至 2003 年期間，也就是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以下簡稱 CEPA)之前，新來港家庭的收入屬於第 1 級別至第 4 級別的比例超過 65%，第 6 級至第 8 級別的比例未有超過 15%。來港團聚的內地居民至少要在婚後等候 4 年才取得單程證來港定居，也就是說，落實 CEPA 之後的第一批中港家庭最快在 2007 年到港，從數據來看，2007 年至 2015 年，第 6 級至第 8 級收入的家庭比例有接近 3 倍的升幅，到 2015 年更占了整體新來港家庭的 41%，尤其第 8 級別的升幅更為顯著由 1991 年 6%上升至 2015 年 19.7%。另一方面，從 2007 年開始第 1 至第 5 級家庭的合共比例更由 88.3%下降至 58.9%；這些家庭中，惟有第 1 級別的家庭比例未有明顯減少，而 2011 至 2013 年間更由 15.2%上升至高峰 29.6%，相反，第二至第四級別家庭比例卻於 2007 年左右出現持續下降的趨勢。簡單來說，落實 CEPA 之後，新來港家庭的每月收入有所提升，其中收入最高的家庭在整體比例有明顯的增加，而收入最低的家庭在整體新來港家庭中佔有的比例則未有太大的改變，也就是說，新來至港家庭的經濟差距有擴大的跡象，反映了締造中港婚姻的階級從基層勞工擴散至其他階層。

表 1- 2：新來港家庭 1998 年至 2015 年每月收入

級別	家庭每月收入 (港幣)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	(%)	(%)	(%)	(%)	(%)	(%)	(%)	(%)	(%)	(%)	(%)	(%)	(%)	(%)	(%)	(%)	(%)
1	\$3,000或以下	13.1	15	18.4	28.7	20.7	18.3	22.2	14.3	15.1	14.3	13.7	13.4	14.3	15.2	29.7	29.6	18.7	15.2
2	\$3,000-\$4,999	11.8	10.1	11.6	11.7	10.3	9	8.3	12.3	13	11.1	7.1	7.5	6.8	9.3	9.2	6.9	6.9	6.7
3	\$5,000-\$6,999	20.3	19.2	19.4	17.8	18	21.7	20.8	27.2	30	28.1	23.4	19.8	17.8	15.2	9.9	7.7	6.5	5.6
4	\$7,000-\$8,999	23.6	22.5	19.7	16.1	19.4	21.2	19	21.4	20.8	23.1	26.1	24.8	23.5	20.2	16.4	16.1	16.4	10.1
5	\$9,000-\$10,999	17.1	16.6	14.5	12.2	13.7	15	15.1	12.7	11	11.7	15.3	17.3	18.6	19.5	14.5	14.3	17.4	21.3
6	\$11,000-\$12,999	6.6	7.9	7.2	5.4	5.6	5.8	5.2	4.4	3.7	3.9	5	5.4	5.7	7	7.3	7.6	10.3	12.5
7	\$13,000-\$14,999	3.3	3.7	3.5	2.8	3.3	2.8	2.2	1.9	1.6	1.9	2.4	2.4	2.4	3.1	3.3	4.5	6.5	8.8
8	\$15,000或以上	3.4	4.8	5.7	5.2	6.7	6.4	7.1	5.8	4.7	6	7	9.5	10.9	10.5	9.6	13.3	17.2	19.7

資料來源：《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2016 年第 1 季》、《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2002 年第 3 季》

除了港女陸男的婚配數量增長，我們把焦點放在大陸配偶的背景轉變。一方面，大陸配偶的教育程度都有所提升，參考《內地來港定居不足七年人士報告 2011》¹¹及《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2015》，新來港人士取得專上學歷的比例都有所增加，從 1991 年時 7.8% 上升到 2011 年的 16%，到了 2015 年更攀升到 20.8%；與此同時，小學或者未受教育的比例從 1991 年 34.5% 減少到 2011 年的 15%。至於原戶籍地方面，大陸配偶在 1999 年及以前有 9 成以上是來自廣東省，期後逐漸減少至 5 成左右，近年有更多大陸配偶來自福建、湖南、湖北、廣西、四川及其他省等等。

至於來港前的就業狀況，愈來愈多大陸來港定居的配偶從事服務業和專業人員，從事「專業及行政人員」和「文員及售貨員」¹²的數量和比例在近年都有所提升，1998 年從事「專業及行政人員」只有 524 名到了 2015 年有 2,094 位，而從事「文員及售貨員」從 1991 年的 535 名增加到 2015 年的 4,612 名；而從事「農民、獵人及漁人」多年來變化不大，維持在 1,000 多名左右。無論在教育程度、

¹¹由於官方未有公開大陸配偶的個別數據，而來港與丈夫/太太團聚的人數佔了內地來港定居不足七年人士的多數，故此處採用由人口普查資料整理所得的《內地來港定居不足七年人士報告 2011》及由入境事務處所收集的資料《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 2015》，來參考大陸配偶的背景改變之趨勢，以上資料均不括以工作和就學簽證來港的內地人士。

¹²由於官方對職業分類只作了五個分類，只能大約看到近年來，新來港人士來港前從事服務業和專業人士的數量有所增加。

來源地、和在大陸從事的職業等方面來看，大陸配偶的背景越趨多元。

中港婚姻從 90 年代至今，仍然是香港婚姻的主要組成之一，數量維持在每年兩萬多宗。不過，近年來中港婚姻在多方面呈現了變化，包括婚配組合的模式(香港男性內地女性的數量減少，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數量增加)、婚姻註冊地點的轉移、高收入家庭的增加、大陸配偶背景的多元化。

參、移居香港的雙管道

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和澳門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採取「一國兩制」的管治方式。有別於其他中國城市，香港和澳門的邊界管理受著不一樣的監控，雖然同屬一個國家，可是並非擁有中國戶籍的人口都可以在這兩個地方自由進出和取得居留權。

中港婚姻的比例維持在四成左右，可是，持從中國內地到香港定居的人數在逐漸減少。2014 年只有 40,496 位內地人士持單程證來港，該年的數量是近 10 年來最少人持單程證來港的一年。參考《2011 年的人口普查主題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也呈現出新來港人口及家庭數量在 2001 至 2011 年 10 年間逐漸下降的趨勢。2001 年新來港人口約 26.7 萬人，到了 2011 年只有 17.1 萬人，而新來港家庭占全港家庭比例由 2001 年的 7.1% 下跌至 2011 年只剩 4.9%。

從 2003 年起，兩地政府積極落實 CEPA 計劃，推出多項專才、投資計劃¹³(以下統稱「吸才／財計劃」)。當中「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至 2015 年共有 83,685 名大陸人才經此計劃到港工作；2005 學年起，香港政府放寬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的入境政策，大陸學生可來港就讀全日制副學士、學士以及兼讀修課式研究生課程。到了 2010 年開始，大陸學生每年已突破 1 萬名，2014 年更超過 19,000 名；部分內地學生畢業後會留港就業，之後更會和本地人結婚生子，組成高學歷、高收入的中港家庭。這些高學歷內地配偶不用經單程證系統便可留在香港定居，他們以升學或／和工作簽證連續在港居住 7 年便具有資格申請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另外，升學、工作簽證比起單程證的申請，在程序和限制方面都要便利得多。

香港的移民制度和出入境措施，嚴緊地篩選著什麼人可以進入、什麼人才可以有資格移入及居留，近年兩個主要的方向是(一) 家庭團聚；(二) 吸引專才／

¹³ 2006 年至 2012 年期間，每年經專才和投資計劃來港居留的人數維持在三萬至四萬多人左右。

投資，內地基層人民(例如婚姻移民)只能經家庭團聚的管道申請單程證到港，而內地人才可以經由就業／投資和就學的管道申請工作或者升學簽證到港。兩地政府聯手打造經濟融合，透過調節移民條件，規範著兩地不同階級的人出入，中港婚姻的多項轉變是否因應著國家的經濟發展而產生的呢？

肆、個人移民經驗的連結

經歷了一百五十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香港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中英聯合聲明講到以「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管治方式，讓香港人繼續「馬照跑，舞照跳」。然而，香港社會當時瀰漫著回歸中國所引發的不安躁動氣氛，不少人趕在回歸前移居到其他海外地方生活，當時 12 歲的我懷著複雜的心情踏在連接著深圳和香港的羅湖橋，想著「終於再次和家人在同一個地方生活了」。如同其他大陸新移民一樣，這個轉變開啟了生命中新的一扇門，顛顛驚驚地在既陌生又熟悉的地方生活¹⁴。當時還沒有普及地使用「新移民」、「新來港」來稱呼從中國大陸移居到香港生活的移民，通常只會說「大陸來的」，這幾個字對年紀小小的我來說，有一種不知名的沉重感，我小心翼翼地隱藏著這個身份。然而每當聽到新朋舊友說我一點都不像「大陸來的」，我會糾結得說不出話來，對於自身的身份和移民的經驗我是迷茫的，而我也一直沒有勇氣直視這種種。

社會把新移民視為社會問題，為了要減少社會問題，協助新移民融入香港適應新生活成了解決社會問題的藥方，特區政府投放在新移民適應的資源亦有所增加，不過，污名的情況卻未有減退。與此同時，在成長和工作上，我和「新移民」一直有一種斷不了的連繫。和其他早期來香港的新移民兒童一樣，除了由教育局安排入學，我並沒有取得任何協助的資源來解決香港生活的需要，一直都是以家庭的能力來應付種種。2002 年，我在一家資助中學重讀中五，當時學校得到資助辦了「啟動課程」¹⁵，招募學生成為「大哥哥大姊姊計劃」的義工。我成為了

¹⁴熟悉是由於從小就看香港的電視也曾經到香港旅遊，對於香港的建築、現代化的設備、人文生活略有所知。

¹⁵為新來港兒童提供的一種支援服務，課程為期六個月，單元包括：中文、英文、學習技巧、個人發展、社會適應、體育、藝術。新來港兒童可選擇先行修讀這個課程，然後才入讀合適的學校。教育局曾在二零零零年三月，以試驗計劃形式提供這項服務，並已於二零零零年九月正式落實推行這個課程。（資料來源：香港教育局

<http://www.edb.gov.hk/tc/student-parents/newly-arrived-children/services/initiation-program/index1.html>)

義工之一，教導新來港的孩子認識香港生活的文化和習慣，以及協助追趕學習進度；大學時以社工身份到小學為新來港小孩辦適應課程；畢業了在非政府福利團體工作，負責新來港女性的活動和協助，以及後來在民間團體倡議政策修改，以改善新來港女性在香港的處境。在這些年的成長中，官方投入新移民適應的資源間接促成了我與其他新移民相會相知(支持)，共同的移民經驗和身份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讓我們可以不怕被誤解、不怕被責罵，安心地訴說著生活的種種。不過，即便我親身地感受到官方對新移民的協助，可是以同化為目的的協助並沒有令社會結構起到變化，新移民的處境仍然是困難的，尤其，我特別感受到社會底層的新移民的處境是愈來愈嚴峻了。

2009 年至 2013 年期間，我在非政府團體工作接觸了很多的底層女性，其中新移民女性以及其家庭的狀態跟媒體所描述的「蝗蟲」¹⁶、低水準、處心積累的騙子等等的形象大相庭徑；由於中港矛盾日益嚴重，每當媒體報導了相關的社會事件，就好像挑起了社會敏感的神經，市民不但對於新移民的困境充耳不聞，尤其不少網民表示香港人比新移民更慘，最好的解決方法就是新移民遷回大陸¹⁷。中國大陸來的新移民成了社會問題「壓倒蘆葦的最後一根稻草」，媒體把各種社會資源不足、經濟衰退、教育問題根源都聚焦在新移民身上，近年在本土民粹右翼的論述中更把新移民視為中共化身¹⁸，新移民到香港是同化香港、赤化香港的手段；排擠新移民等於抗共、保衛香港的行動。在二元對立的視野下，社會議題的討論難以跳脫出族群的野食，又或者說是過於聚焦於族群的差異。身份的迷茫一直籠罩著我，我無法輕易地在「我者」和「他者」之間，來二選其一站邊。

對於中國尤其是近代的中國發展，我是無甚認識的，除了可以在嘴邊掛上一些事件，例如：「文化大革命」、「六四」、「豆腐渣工程」、「李旺陽被自殺」等等，

¹⁶比喻新移民，指控新移民侵占香港資源

¹⁷這種想法顯示了一)人民接受了「資源是有限的」的說法，只有最需要的人才有資格得到，於是人民在競逐社會上最慘的位置，似乎只有這在最慘的位置才可以得到社會的幫忙。二)社會把遷移視為一種個人選擇，決定遷移就因當充分而理性評估移居後的生活，在移居地香港遇到困難和問題就應該以個人能力解決，又或者以返回大陸作為解困方法來為自己作出遷移的決定來負責，這一切與香港社會無關。

¹⁸有「本土國師」之稱的教授陳雲於 2014 年說過：「共產黨不能屠殺香港男人，也不能公然強姦香港女人，就用柔性方法，送大陸陰道來香港，用妻子、情人和妓女的角色，令香港女人的陰道和子宮報廢，除非香港女人願意採取蠻族女人的淫蕩態度，同流合污。共產黨送大陸子宮來香港，用母親的角色駕馭下一代香港人的血統、語言和家教，並控制香港男人。」(資料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wan.chin.75/posts/10152457036502225>)

可是對於中國的發展我是陌生的。不少香港市民對於中共的恐懼與日俱增，如同電影「哈裡波特」中，巫師們對於佛地魔的巨大恐懼，甚至不用講出「佛地魔」這三個字，只要講「那個人」便足於勾起他們無名的恐懼和不安，不同的是在香港只要講出一些事件，例如：「國民教育」、「八三一方案」、「特首選舉」等等就足以勾起抗共的無意識反應以及對「赤化」的忐忑不安。在台灣讀碩士的這段時間，在一次次的課堂和同儕間的討論中，我才注意到自己也有著這種近乎是無意識又或許是制約式的恐懼和不安，而每當討論任何跟中國相關的事件，我只能用印象式般的淺薄認識來「自圓其說」；台灣學術圈當時正興起「重新認識中國」的風潮，愈是翻開這些文章、研究，讓我更加肯定自己對中國認知的匱乏。

在台灣求學生涯讓我開始思考如何把中國香港的跨境婚姻放置於一個更廣闊的視野去探索。正如 Sassen 的主張，遷移不只是個人的動機和行為，是經濟過程與地緣政治將兩國的遷移管道打通在前，個人的遷移行為在後；此論文的其中一個焦點在於剖析兩地經濟如何打造遷移的管道，以及香港人口政策的落實對於中港婚姻的影響。

第三節問題意識

中港婚姻的研究非常豐富，主題有在香港的生活困難和社會歧視(洪雪蓮，1999；何雪松，2006；Law and Le，2006；Newendorp，2008；彭澤生 2010；Ho et al.，2014)、新移民女性的能動性(Constable，2002；洪雪蓮、馮國堅，2006)和主體建構(黃宗儀，2008；黃洪 2013)，更早期的研究會著重於移民對香港的影響(邵一鳴，1997；郭志儀 1997，王蒼柏，2007，黃洪，2013)，近來會有研究分析中港婚姻的人口特徵(Ma et al.，2010；Pong et al.，2014)。當中有不少以新移民女性為主體的質性研究(薛澤華，2001；曹疏影、鄧小樺，2008；陳國賁等，2008；陳國賁，2011)，以展示新移民女性在香港生活的面貌，這些研究的焦點集中於移入地--香港的融入經驗，對於移民在移出地的種種經驗卻鮮少被提起，移民猶如沒有過去的人；又或者說，移入地對移民的過去種種根本沒有興趣。事實上，遷移不只是個人的動機和行為，是經濟過程與地緣政治將兩國的遷移管道打通在前，個人的遷移行為在後(Sassen，2006；王克先譯)，當探究內地移民遷移的新趨勢，定必要把兩地的體制、轉變等因素和遷移行為一起分析，也就是說需要把鉅觀的政經制度和微觀的個人經驗併置在一起探究。

再者，這些研究以基層的香港男性內地女性為研究對象，上述第二節提及的一些較新型態的中港婚姻仍未有相關的研究。有人口統計研究根據雙方的年齡，教育水準、職業聲望(occupational prestige)以及收入的差異把基層的香港丈夫內地妻子定義為「中國傳統的婚配模式」(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assortative mating) (Ma et al, 2010)，也就是男性應該娶學歷和職業比自己低的女性。不過，中港夫妻之間的互動，比如說家務分工、親密關係的營造，以及婚姻觀鮮少被提及。中港婚姻出現了高學歷婚姻配對，以及香港妻子內地丈夫的配對，那麼他們在背景和互動方面又有什麼改變？

在探究中港婚姻的種種轉變之前，不得不先提出一個疑問：何以當中港兩地單身率持續上升，以及兩地社會差距收窄的同時，中港婚姻仍然成為香港婚姻的主要模式之一？

壹、中港婚姻何以持續發生？

不少研究都有提及中國多次戰爭、政治局勢不穩定，造成了內地移民潮(例如：30年代中日戰爭、二次大戰日本佔領香港結束後、國共戰爭、1962年內地連續3年農作物失收、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香港人口由1931年的87萬躍升到1985年的550萬，香港人口大幅度增長，除了因為戰後的嬰兒潮造成，還受內地移民人口影響(趙永佳、呂大樂，1997)。梁漢柱等人(2004)指中國內地和香港居民結婚從未間斷，由於香港移民控管的收緊，加上非法偷渡的路途艱險，60至80年代的非法移民以男性為主，爾後他們陸續在香港取得居留權。Pong等人(2014)引用Lin & Ma(2008)的研究數據：90年代前，30至34歲的香港男性和女性的性別比例是130:100；推測這時期的非法大陸移民潮引起香港男女性別失衡的婚姻擠壓。「香港性別失衡引致本地婚姻擠壓」的說法遍地出現在不少香港移民研究：

這批內地移民的加入，改變了香港社會性別平衡，當時適婚男性比適婚女性多。而內地的男性移民處於社會劣勢，被擠出婚姻市場，他們難以在香港娶到妻子，只能回到內地老家娶妻。而受移民政策的限制，港人內地配偶在結婚後不能馬上遷居香港，只能等候單程證的批准(羅小鋒，2008)。

這些研究呈現了 90 年代及之前的中港婚姻一個面貌以及背景脈絡。不過，兩地邊境管控愈加嚴密，此後也未有出現大批的(非法)移民潮，那何以中港婚姻持續到現今？而性別失衡之說過份聚焦於男女比例，以及反映了異性戀霸權意識，事實上，兩人結婚有眾多影響因素，例如：外表、興趣、社經地位等，即使有一比一的男女比例也不等於全部男女都可以配對起來。

最近的官方和非官方的研究都有採用了一個說法¹⁹：「隨著香港回歸，中港兩地人口不斷雙向流動，大大增加了港人接觸非本地異性的機會…但近年港人北上工作愈見平常，內地人來港的途徑亦大大增加，跨境結婚人士的背景趨向多樣化」(香港集思會，2013)。梁振英在公開場合一再表示，高比例的中港婚姻象徵了中港融合的深厚程度。以上論述肯定了經濟和文化體系對於個人移動以及中港兩地人民締結婚姻的影響，然而並未能說明社會和經濟體系究竟發生了怎樣的改變，造成持續、大量的中港婚姻以及中港婚姻中產化的趨勢。

有不少研究指出國家角色對於人口流動甚有影響，以日本為例，Ito (2005，轉自 William，2010)的研究顯示在 1975 年以後，日本的跨國婚姻才以日本男性和外國女性為主要的婚姻配對模式(之前則相反)。由於日本的移民條例非常嚴格，技術工人和專業人士的工作簽證很難取得，相反，短期的表演工作者簽證相對容易取得，不少菲律賓配偶初時以此方式進入日本從而認識了她們的日本丈夫。也就是說國家透過移民制度篩選什麼人可以進入本國，什麼人不可以，同時也影響了當地人和非本國人的跨國婚姻配對模式。

Friedman(2014)在中國惠東的研究，證實了國家權力與私密的個人關係之間存在緊密的紐帶，官方政府除了在人口政策之外，更利用群眾運動、宣傳歌曲、市場激勵等治理手段，建立一種理想的現代婚姻觀念，把個人的婚姻實踐與理想中國公民觀念相連在一起，同時助長了自由戀愛的趨勢。Friedman 的研究揭露了婚姻實踐看似是由個人的意願所決定，其實個人的意識形態早已結合了國家灌輸的意識形態。在中港婚姻的現象背後，政經體制、移民制度和意識形態等多種結構性因素，如何對個人婚姻行為產生了影響？

¹⁹策略發展委員會 2014 年撰寫了一份名為「香港與中央/內地的關係」的文件，講及中港婚姻部分直接引用了香港集思會此份報告，資料來源：
http://www.cpu.gov.hk/doc/sc/commission_strategic_development/csd_1_2014c.pdf

貳、變動中的國際位置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不少人認為在父權社會的婚姻市場中，男性的社經地位必須優於女性（蕭昭娟，2000；蔡雅玉，2001），當富裕國家中低收入低社經地位男性被本地婚姻市場排擠，他們轉移投入更貧窮落後地區的婚姻市場反而成為了優勢對象，促成了跨國的上嫁婚姻。Constable(2003)則認為「全球上嫁婚配」只是「空間上的上嫁婚配」(spatially hypergamy)，從落後地區嫁去較發展國家的女性，由於他們的伴侶在當地是基層勞動人民，婚後的生活不一定有所提升，反而更常出現社經地位向下流通(downward mobility)的情況。

中國大陸在實施戶口制度，以至冷戰時期，人口流動幾乎微乎其微，而婚姻成為中國女性遷移的主要因素。不少研究描繪了國內女性婚姻移民人口流動的趨勢也呈現出由較為落後的貧窮農村流向經濟較發達、都市化的城市。Fan & Huang(1998)整理了多份數據，指出 1985 年至 1990 年期間，跨省女性婚姻移民主要由較貧窮的中、西區域流向東邊區域，包括河北、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和廣東這 6 個主要省份。李艷春(2013)認為婚姻是改變農村女性命運的一種經濟策略，使得女性向沿海富裕發達省份邁進，李艷春的研究既肯定了經濟因素對婚姻遷移的影響，也肯定了農村女性在多種困境下的能動性。這些研究描繪了中國內地女性婚姻移民人口流動的趨勢，除了強調了經濟的誘因，內地女性婚姻遷移的趨勢也就說明了（空間上）的「上嫁」婚姻在中國近二十年持續發生。Newendorp(2008)在研究中提及，中港婚姻也是全球上嫁婚配的一種型態。有關於是否「上嫁」，Constable(2003)已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此提出「上嫁下娶」的重點在於：一)強調借助婚姻提升個人地位的期待仍然普遍並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於婚姻的選擇；二)提出疑問：跨國婚姻中，移出和移入地兩個地方在社會和經濟發展的確存在明顯差距，如果這個差距愈來愈縮小，對跨國／跨境婚姻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大陸學者耿羽(2011)提出兩地經濟的差距縮少對跨境婚姻的數量造成影響：耿觀察了福建東南沿海的 H 村落中年輕女性村民的海外婚姻狀況，30 年間有 29 位女性村民嫁去海外，嫁去亞洲(香港、台灣、新加坡、日本)的有 25 位，而 1986 至 2000 年間嫁去海外的女性明顯比近幾年的要多。耿認為 H 村經歷改革開放，2000 年以後的經濟水準有明顯的提升，H 村的男性村民娶外省／市女性有所

增加，而嫁去海外的年輕女性村民減少，2000 年至 2010 年間，已經沒有此村女性村民嫁去香港和新加坡。也就是說，當原本較落後地區的經濟提升上來，嫁去海外女性會有所減少。(經濟誘因不是跨國／跨境婚姻的唯一因素，不過，的確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經濟差距愈來愈接近，中國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過，整體中港婚姻的數量雖然並沒有減少，所以中國內地的經濟提升對中港婚姻沒有影響嗎？事實上，第二節講到港夫陸妻的數量在 2006 年開始下降，而港妻陸夫的數量在最近十年持續增加，也就是說，中國內地(尤其城市)和香港經濟差距的縮小，農村和城市基層女性嫁去香港的驅動力的確下降；而有更多香港女性嫁去內地，這反而說明了有部分內地男性(或其家庭)在改革開放時期得到較多的好處，他們的經濟能力已經和香港男性齊驅並駕，不過從整體婚姻數量上仍屬於小數的一部分。而近年的新來港家庭夫妻背景呈同質化趨勢，也就更可以說明近年來中國內地和香港的經濟差距縮小了，而到香港定居的內地女性比起 2005 年之前的女性無論在學歷、社經地位較為優勢。當中港男女的社經背景差距縮小了，是否代表了「上嫁下娶」的觀念對兩地人民的影響力減少了呢？在現實的中港婚姻實踐中，會愈來愈少「上嫁下娶」的配對嗎？中港男女的權力關係和議價資源會有什麼改變呢？

第二章文獻回顧與理論架構

第一節全球城市的階級主義移民制度

高學歷內地人才不只流向中國的大城市，在香港「吸才」的計劃下，放寬的移民制度把人才流導入香港，以提升香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曾熾芬(2004)分析了台灣的白／藍領的移入制度，認為台灣以經濟理性為考量，讓階級篩選成為移民政策的發展主軸，對不同的階級身份給予差別待遇。香港和台灣一樣，特別優待來自世界體系的優勢國家階級，海外、內地人才和企業家不但可以透過專設的就業及就學計劃(可參考表2-1及2-2)，用快捷的簽證入境和得到長期居港身份，甚至可帶同配偶及未滿18歲的未婚受養子女到港生活(除了經就學計劃到香港，其他海外及內地就業計劃的受養人都可以在香港就業)，這些計劃的申請人及受養人只要連續居港滿七年即可申請永久公民身份。相反，來自世界體系邊陲位置國家的外籍家庭傭工和勞工(外勞)就被排除了居留，以及不能申請受養人來港。

同是和香港居民締結婚姻，基層的內地婚姻移民必須經單程證的管道到香港團聚，他們至少等候四年或以上的時間才取得單程證。未取得單程證之前，基層大陸婚姻移民只能以短期探親簽證到香港，在港期間不能參與任何課程或有薪工作。相反，締結中港婚姻的高學歷內地人才通常經由「吸才」計劃，通過簡單便捷的移入管道在香港定居。香港特區政府在提升競爭力之下，為高學歷人才大開便利之門，形成了階級主義的移民篩選機制。香港移民制度對於高學歷人才的慾望不受民間的種族主義影響，內地和海外人才同樣是可慾(desired)的經濟移民，而大陸基層婚姻移民則是不可慾(undesired)的婚姻移民，以至於階級、種族和性別的因素交纏在一起，大陸基層配偶在香港遭受多重的壓迫。

表 2- 1：香港各項就業計劃簡介

計劃名稱1	海外	內地	其他
	一般就業政策(專業人士)* 一般就業政策(企業家)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	外籍家庭傭工#
特別(資格)要求	擁有大學學位 已獲聘用	擁有大學學位 已獲聘用	僱主的家庭入息必須不少於每月港幣15,000元，或僱主須擁有款額相若的資產，足以在整個合約期內僱用該名傭工。
審核所需時間	四星期	四星期	四至六個星期
隨同來港的受養人申請@	可以	可以	不可以
計劃名稱2	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勞工*
特別(資格)要求	符合兩套計分制度的其中一套最低分數要求		1.僱主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僱用該名申請人，提供住宿，負擔生活費和在合約終止後送返工人回原居地的費用 2.僱主遞交申請並得到勞工署批准 3.僱主必須一筆過繳付輸入勞工的徵款，金額則按每名勞工港幣四百元乘以留港工作月數（不能超過24個月）來計算
審核所需時間	未有提供		六星期
隨同來港的受養人申請@	可以		不可以
計劃名稱3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特別(資格)要求	留港：畢業半年內申請，申請時無需已獲聘用 回港：畢業後半年申請，申請時已獲聘用		
審核所需時間	兩星期		
隨同來港的受養人申請@	可以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²⁰(2016)，作者自行製作

²⁰香港入境處：<http://www.immd.gov.hk/hkt/services/index.html>

表 2- 2：香港就學計劃簡介

	計劃名稱	海外	內地
		就學*	
就學	特別(資格)要求	小學、中學及大專以上課程	受認可大專以上課程
	審核所需時間	六星期	六星期
	隨同來港的受養人申請@	可以	可以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2016)，作者自行製作

美國經濟學家Saskia Sassen(1991)認為富裕國家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工業資本外移後，轉為金融業、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高度專業服務、跨國公司總部、高科技產業出現，因此產生對先進技術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同時，為了維持跨國企業總部的日常運作，也需要大量廉價的服務業部門來支撐各項庶務工作。2014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超過21.2兆億港幣(約2,740.27億美金)，在聯合國排名38²¹，本地人均收入是30.16萬港幣。根據香港統計年刊(2012)，單是服務業就佔了香港GDP的93%²²；而服務業當中，最近10年以「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及保險」三個範疇的生產總值最高²³，超過整個服務業的一半，而勞動人口也主要集中在這三個範疇。去工業化令香港的產業結構發生轉變，對於勞動人口的技能需求和職業結構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輔助專業人員」和「專業人員」的大幅度增長²⁴，而「工藝及有關人員」和「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從業人數減幅都超過60%²⁵。以上行業的從業人員比例的轉變可以反映出：香港經歷去工業化轉向全球城市發展時期，

²¹ 同年，前三名分別是日本(4.60 兆億美金)、中國(10.43 兆億美金)、和美國(17.34 兆億美金)。資料來自於維基百科--各國國內生產總值列表 (國際匯率)：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_(%E5%9B%BD%E9%99%85%E6%B1%87%E7%8E%87))

²² 同年，製造業只剩 1.5%，漁農業只有 0.1%。

²³ 2012 年，「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生產總值佔了 GDP 23.5%，「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佔 16.8%，「金融及保險」佔 15.9%。

²⁴ 「輔助專業人員」從 1991 年的 28 萬人在 23 年間增加到 74 萬人，「專業人員」從 1991 年的 9.9 萬人在 23 年間增加到 26.9 萬人，兩者的就業人口比例增長接近 100%。

²⁵ 「工藝及有關人員」從 1991 年的 39.8 萬人減至 2013 年 25.8 萬人，「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從 1991 年的 36.5 萬人減至 2013 年 18.2 萬人。

產業結構重整，明顯地對重工業、製造業的技術工人需求大幅下跌(由於社會基本配套需求和房地產發展興旺，建築工人成為工藝人員項目的主要就業人口)；香港轉向發展專業行業，無論是高科技、個人服務護理、或者貿易金融都需要有輔助人員協助、支援、配合其工作，「輔助專業人員」的需求因此大大擴張；而「經理及行政人員」受私人機構數量擴張影響，人數增長約有12萬左右，維持在9.2%到12%。

Sassen (2015)更指全球城市發展持續產生了兩極化(polarization)的社會結構：1)在勞動者方面，全球城市出現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以及底層服務業勞工(多是外來移民)；2)在經濟部門方面，產生了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香港產業以服務業為，參考香港統計年刊(2014)的資料可以得知，「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員」²⁶和「非技術人員」²⁷的低階工人從90年代開始分別有二十幾萬勞動人口的增長，可見這兩項職位在本地勞動市場占據重要地位。加上在資本自由化的席捲下，這些工作更趨向彈性化、低薪化，以「非技術人員」平均薪金為例，2001年時為\$5,300，2011年5月香港最低工資保障立法後，同年的薪水只有\$5,000；而女性非技術工的低薪化非常嚴重，這10年間都是維持在\$3,500至\$3,800左右。新來港人士在港主要從事低技術的工作，較多人從事服務及銷售人員(38.1%)和非技術人員(27.3%)，從事這兩項工作職位的比例均比全港比例17.5%、13.3%都要高；還有，新來港人士比本地人有更高的比例從事在「住宿及膳食服務業」(24.3%)。人才計劃和單程證猶如一個輸入內地移民雙管道系統，分別把人才輸送去兩極化的生產部門：1)產生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和2)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讓低階的庶務和服務工作應付專業人才的再生產需要，而高端專業人才則支撐香港主要經濟部門。

第二節中港婚姻的轉向

遷移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migration)是當代遷移的一個特徵，近25年來女性移民人口比例維持在49%²⁸左右，雖然2015年全球女性移民人口比例輕微下跌

²⁶1991年有35.9萬(13.2%)增加到2013年63.1萬(16.9%)。

²⁷1991年有50.3萬(18.5%)增加到2013年有74.7萬(20.1%)³⁶

²⁸據國際勞工組織(ILO)1996年的發佈的一份報告《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Trends in Total Migrant Stock: The 2005 Revision》顯示，在二十世紀70年代，亞洲女性只占亞洲跨國勞務輸出總數的15%，到二

了 1%，不過女性遷移人口在 25 年間增加了 4000 萬左右。遷移人口當中，除了大批從事 3D²⁹工作的跨國勞動工人(migrant workers)，當中也有不少婚姻移民(marriage migrants)。廿世紀便出現了由仲介媒合的跨國婚姻，「郵購新娘」(mail-order brides)的現象出現在歐美、北美、日本(Glodava and Onizuka, 1994)。80、90 年代亞洲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出現了大量的跨國婚姻現象，不少東南亞和中國女性嫁到台灣、日本、和南韓(佐藤隆夫, 1989; Ishii, 1996; 夏曉鵬, 2002; 藍佩嘉, 2014); 而中國大陸也出現了大量跨省市、跨城鄉的婚姻(Fan and Huang, 1998; 丁金宏等, 1999; 李艷春, 2013; 胡瑩和李樹苗, 2013)。

壹、國際分工位置的影響

跨國(跨境)婚姻的研究中，有大量探究跨國婚姻的因素。早期的研究曾一度廣泛使用「推拉理論」(Push and Pull Theory)來分析遷移的現象，Bogue(1969)認為人口流動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條件，移出地不利的生活條件是推力，而移入地有利於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拉力，人口流動就由這兩股力量前拉後推所決定，跨國人口流動很多時是基於第三世界國家的人民受到「母國」的貧窮因素驅使流動到高薪的國家。為什麼仍然有低度發展國家的女性留在母國呢？「推拉理論」實際上只是歸納了人口流動的現象，卻不足以說明構成流動的複雜狀況。Bonacich&Cheng(1984)指出「推拉理論」欠缺宏觀分析架構，他們結合了世界體系的視野³⁰，把國際遷移視為資本主義發展邏輯下的產物，並且發展了一個移民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的理論架構。夏曉鵬(2002)採用了此架構分析台灣男性與東南亞女性聯婚的現象，指出「商品化跨國婚姻」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息息相關：台灣為了都市化、工業化，採取了「以農養工」的扭曲發展模式，受排擠的農、漁村子弟在台灣本地婚姻市場價值下滑，無法在本地找到老婆；另一方面，東南亞地區由於資本國際化造成了農村破產、失業等問題，出國打工成為當地人的出

十世紀 80 年代，該比例上升到 25%，到二十世紀 90 年代，跨國務工的亞洲女性已達 180 萬，基本上與跨國務工的男性持平，在有的國家甚至已經超過男性。如在菲律賓，跨國務工的女性占出國務工人數的 60%，印尼女性占印尼跨國務工人數的 2/3。斯里蘭卡國外遷移的人口，婦女比例高達 84%。

²⁹ 3D 工作包括 dirty(髒)、difficult(困難)、dangerous(危險)等特性的工作。

³⁰ 世界體系理論預設了近代資本主義源自於資本永不止休地擴張，華勒斯坦指出國家之間不平等地發展，形成核心、邊陲、半邊陲的國際分工關係，落後國家的豐富資源和過剩勞力被半邊陲和核心國家利用，半邊陲和核心國家逐漸壟斷資本和技術，令商品利潤極大化，原始資本得以持續積累。

路；對女性而言，婚姻是另一個脫離困境的出路。兩地被邊緣化的男女用跨國聯婚的方式生存，解決了婚姻困難同時又為農村家庭提供無酬勞動力，而跨國婚姻亦回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夏曉鵬的研究有著重要的貢獻，一是指出资本主義下，這些跨國婚姻的國家間存在著不平等的發展，以至於核心／半邊陲國家比起半邊陲／邊陲國家有著更優勢的國際分工位置，而**國際位置的優勢為核心和半邊陲國家的男子帶來了結婚優勢**，讓他們可以在半邊陲／邊陲國家找到結婚對象。也就是說，跨國婚姻涉及了占據世界體系中兩個不同位置的國家，並且國家之間的位置是階層化的，各國在世界體系的分工位置象徵了國家的發展程度、財富、社會保障、生活水準等等。跨國婚姻的配對主要是低度發展國家的女性和高度發展國家的男性，何以較少會有低度發展國家的男性和高度發展國家的女性聯婚呢？換句話說，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何以只流到了男性一邊呢？這正正和「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有關，不少人認為在婚姻市場中，男性的社經地位必須優於女性（蕭昭娟，2000；蔡雅玉，2001），而當女性個人條件比男性優勝的情況下，反而窒礙了婚姻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和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發揮了互補的功能，得以彌補男性國民個人條件不足的缺失。

然而，國際分工位置不會僵固不變，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各國的分工位置亦有所改變。二十世紀前，中國在國際分工上仍然是邊陲國家的位置，香港半邊陲的分工位置彌補了香港男性個人條件不足，讓這些香港基層男性可以在內地農村找到妻子，香港丈夫內地妻子被視為(空間的)上嫁下娶的婚姻模式。由於世界體系的分工一直在變動，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持續強勁，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內地和香港的國際位置正在變動中，一時之間難以辨別誰高誰低，在一個尚未明朗的格局下，中港婚姻數量卻持續穩定，而婚姻配對模式和締結中港婚姻的階層出現多元化的趨勢。可見伴隨著兩地國際位置的變動，中港婚姻也正在起著變化。「上嫁下娶」的婚姻配對是否有所改變？中港婚姻究竟仍然是「上嫁下娶」，還是已經靜靜地出現了「下嫁上娶」的新趨勢？

貳、「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和實踐

華人社會的研究發現，男性傾向選擇社會經濟地位中等或低於自己的女性，女性傾向選擇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形成一種「上嫁下娶」的現象(Croll 1981;

Tu 2007)；而在階層化的世界體系中的跨國流動是一種「空間上嫁」(spatial hypergamy)的策略(Constable,2003)，通常是先進國家男性與後進國家女性形成的跨國婚姻。「上嫁婚姻」的概念在很多華人社會仍然有著不可忽略影響，對選取伴侶有著規範的作用。Ma 等人(2010)的研究，採用了 1998 年至 2005 年香港本地夫妻以及香港夫內地妻的人口特徵作比對，認為香港男性傾向「中國傳統的婚配模式」(The traditional Chinese notion of assortative mating)，包括丈夫比妻子年長，擁有較高教育水準、職業聲望(occupational prestige)以及收入。個人特質較優勢的香港男性會跟香港女性結婚，而個人特質較劣勢的香港男性難以找到香港女性結婚，他們會利用兩地的社會差距³¹機制(mechanism of societal disparity)來尋求內地女性結婚以符合「中國傳統的婚配模式」。這個人口學研究反映了當時的婚姻配對趨勢³²，也反映了「上嫁下娶」的觀念在中港兩地的影響和實踐，在以上時期，香港的國際位置分工的確可以彌補香港基層男性個人條件的不足。Newendorp(2008)觀察二十一世紀初之前的中港婚姻，看到中國內地女性嫁給香港男性進入了資本主義經濟，得到第一世界科技、資訊、溝通，增加了政治權利和社會運動的參與機會；而居住於內地時，內地妻子得到香港丈夫的經濟支持，得到舒適生活環境和更容易得到本地商品，其社會地位有所改變；Newendorp 認為當時的中港婚姻是「全球上嫁婚配」的一種型態。Newendorp「全球上嫁」的說法不局限於個人社經地位的提升，她更著眼於移出地和移入地兩個社會環境的改變，包括了移民女性在香港生活的便利度和舒適度，以及可觸及的社會資源然和政治參與權利。

二十一世紀初，中港兩地的經濟差距以及國際分工位置，香港仍然處於較優勢的位置，二十一世紀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強勢，在國際間的影響力份外顯眼，逐漸邁向國際分工位置的核心。中國人民的經濟水平已提升，內地配偶的職業有服務人員，也有專業人士、管理階層，中港婚姻是否仍然是「上嫁下娶」的配對？

³¹ 作者文章中略略提過社會差距泛指兩地不同的經濟發展狀況 (92-93 頁)，並沒有清楚說明如何不同。

³² 不過，從數據歸納出成人口特徵無法推敲出造成這些特徵的原因，例如兩地經濟、文化制度、出入境管理等制度上的差異對跨境成姻的影響。欠缺成因的分析，很容易把婚姻配對的現況簡化為某些群體的特質造成刻板印象，例如香港人比內地人優越，娶香港妻的香港男性比娶內地妻的香港男性優秀。事實上，並非娶內地妻的香港男性就是個人特質較劣勢，一份民族誌指出，2000 年前後有更多香港出生受高等教育的年輕、白領男性會在內地工作和約會中，主動找尋年輕內地女性作為妻子，主要是基於他們認為內地女性更願意扮演傳統妻子的角色：服從丈夫，任勞任怨照顧丈夫和家庭，以及作為兒童照顧者(Li Wai ki Viki,2001)。

或者說，中港男女的配對出現了怎樣的變化？

參、「下嫁上娶」的跨國婚姻

跨國婚姻的研究主要圍繞在高度發展國家男性和低度發展中國家女性，而中港婚姻的研究對象至今也聚焦於香港男性內地女性一類的婚姻配對(洪雪蓮，1999；Newendorp，2008；Ma et al.,2010；Pong et al., 2014；Ho et al.，2014)。相反，有關高度發展國家的女性和低度發展國家男性的研究少之又少，以下將借用日本的例子作為參考。

根據日本移民法令，惟有和日本公民結婚，無證移工才可以得到居留證件。因此，日本女性和來自較低度發展國家的男性的結婚會被政府和公眾強烈地懷疑其結婚動機。Yamanaka(2009)在 2005 年至 2007 年間找了日本東海區的五對日本女性(公民)和尼泊爾男性(非公民)的夫妻作訪問。Yamanaka 的研究聚焦於尼泊爾丈夫在婚後面對工作、戶籍制度和文化上的歧視，以及他們的對應方式。簡單來說，婚姻讓這些尼泊爾男性合法地在日本居留和工作，不過，他們的就業狀況未有因此而有太多的改善，而移民的身份令這些受訪者處於經濟衰退中的日本勞動市場更邊緣的位置。同是來自亞洲較低度發展國家的男、女移民在移入國的社經地位都出現了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的狀態；不平等的移民制度對於移工(非技術移民)有很多不友善對待，不過，相較起來，女性移民在移入國的勞動狀態處於更邊緣更嚴峻的零散化狀態。

這些日本妻子尼泊爾丈夫當中，其中四對夫妻是在日本工作和休閒時認識的，另外一對夫妻在太平洋島嶼工作時由同事介紹而認識。這些夫妻的個人背景差距並不明顯，例如他們在年齡差異較少(多數年齡差距只有 1 年左右)；至於職業和經濟方面，尼泊爾丈夫在母國有些是專業人士，有些原生家庭背景不錯，只是到了日本只能成為事藍領工人；而婚後從事工作的日本妻子，除了其中一位是自僱設計師，其他三位都是文職人員³³；全職家庭主婦只有一人。兩位日本妻子表示家人非常反對他們的婚姻，一個是基於伴侶來自落後國家，另一個是媽媽懷疑尼泊爾伴侶的意圖只是為了換取日本居留身份。來自國際分工邊緣位置的尼泊爾男性和國際分工核心位置的日本女性結婚，沿用 Newendorp 的分析來看，尼泊爾男性躋身於高度發展的國家，社會環境和個人取得有所改善。不過，在於日本女

³³ 一位在父親工廠工作、一位和老公在同一工廠當文職、還有一位在慈善團體工作。

性家人立場來說，日本女性嫁給了比藍領工人條件更不足的藍領移工(儘管這些尼泊爾男性在母國的社經地位優越)，這無疑是「下嫁上娶」。

Yamanaka 認為相較於日本丈夫和亞洲妻子的組合³⁴，日本妻子尼泊爾丈夫的婚姻並不那麼傳統，而且婚姻決定也並不那麼被動。在 Yamanaka 的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家庭分工方面，日本妻子尼泊爾丈夫的分工有別於日本丈夫和亞洲妻子的「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日本妻子在婚後仍然投入工作。不過，此研究無法得知他們在家務分工、夫妻互動、權力關係又是如何的呢？這些方面可以讓我們更具體地去了解高度發展國家女性和低度發展國家男性的婚姻狀況，以及探究跨國婚姻中「上嫁下娶」的變化，非常值得去探究。

肆、當代婚姻的實際需求

婚姻，從資產階級的特權普及化到工人階級，不只是具有經濟交換性質和私有財產的傳承；在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婚姻家庭更承載著情感支持和照顧的功能。甯應斌(2012)指無產階級化使人除了家庭之外一無所有，加上受到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影響，工人階級也把人生的意義和成就放在家庭，把家庭生活當作實踐個人價值。資本主義殘酷競爭下，工人被資本家不斷壓榨，伴隨著戀愛婚嫁與浪漫愛情的興起，家庭成為人們逃避殘酷世界的私人領域，在這個「避難所」可以得到情感依偎以抵消工作上的壓力和建立個人的認同。這也就可以理解何以縱然已有不少研究批判婚姻家庭體制，然而總是「被衝向婚姻聖壇的人群淹沒了」(Love, 2008:53；楊雅婷譯)。工業化改變了生產模式，將資產階級的家庭意識型態形塑成現代家庭的觀念，自由戀愛和資本主義的盛行，益發放大了婚姻家庭的情感功能。

婚姻除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避難所」，同時兼負了實際的用途：作為負責個人生養死葬的照顧和經濟單位。全球城市(global city)在工業資本外移後，轉為金融業、服務業主導的產業結構，專業中產階級大為擴張，衍生對清潔家務和照顧外包的需要，進而輸入移民女性來填補這個勞動缺口(Sassen, 1988)。2012年超過10%的香港家庭有聘請外籍家傭，2013年香港有32萬外籍家傭工為本地家庭

³⁴日本男人及家庭傾向尋找接受父權婚姻文化的女性當老婆、媳婦，他們家庭分工清晰，男性負責賺錢養家、女性負責家庭再生產(Sazuki 2005,2009)。日本丈夫比亞洲妻子平均大十年，在公民權、文化、輩份上都均享有優勢。

提供家庭照護服務，其中98.4%為女性。有研究指中產階級可以借由僱用移工來解決家庭的照顧需要，底層家庭則透過跨國聯婚，由移民女性來處理家庭再生產和生產的雙重擔子(藍佩嘉，2014；Hsia，2015)。黃洪(2013)認為新移民女性到香港並不是單純為了一家團聚，更重要的是照顧和在經濟上幫助年老失業、半失業或已退休的丈夫，由「新移民」供養「舊移民」。也就是說，結婚成家帶來了公共效益，填補了資方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和國家公共照顧的空隙，對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社會是有利的。

中國大陸走向自由市場，整體經濟水平提升上來，不過，同時引發了市民對於未來生活保障的焦慮。2009年左右，上海人民公園出現了一個相親角，由白髮父母為自己白領中產子女相親的現象，引起了社會關注。孫沛東在她的著作《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2014)詳細地探究了當中的因由，其中提到一胎政策(One Child Policy)和國家經濟制度改革，增加了父母對於自己和子女未來生活的擔憂，對將來可能會出現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恐懼，擔憂和恐懼促使這些父母在婚姻市場上尋求「上嫁婚姻」，為自己和子女未來尋得一份可能更可靠有保障的人生保險。簡單來說，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自由市場的二十幾年中，原先有國家托底的教育、醫療、住房逐漸轉而自由市場提供，原本國家承擔的財政負擔由個人和家庭承接，未來生活的安全感和確定性再次回歸到家庭和親密關係，國家經濟轉向激發年長一輩替子女覓求「上嫁婚姻」的慾望。結婚在華人社會象徵進入人生一個穩定的狀態，而「穩定」是需要物質條件來支撐，沒有了國家的支援，婚姻家庭被寄予代替或者超越國家保障的厚望。中國內地父母的焦慮顯示了自由經濟的發展，國家福利的退場，反而更激發了人民對於結婚成家的迫切需要，人們只能寄望家庭是一個可以支撐個人生養死葬的經濟單位。在如此背景下，縱然家庭的照顧承擔加重了，不過在艱難生活中，帶著幸福生活象徵的婚姻被再度的推崇，誓要單身的人固然比90年代增加了，可是想結婚但結不了的人也比比皆是。其中男方的經濟能力成為了關鍵的因素，而香港的國際市場分工位置在內地婚姻市場為不同階層的香港男性帶來了不同程度的優勢，甚至已經沒有幫助。

伍、中國年青人親密關係的轉變

Farrer(2014)的研究發現，自由經濟鼓勵了個人消費的自由選擇以及對滿足

慾望(性作為個人慾望的其中一種)的強調，中國城市有愈來愈多年青人的性行為與婚姻脫鉤，婚前性行為不但引起國家和父母的焦慮，令國家在政策層面作出多番介入，試圖以國家的力量導正「健康」的婚內性觀念。由於現在的性行為不一定和婚姻關係有關，以及個人的自主性增加了戀愛關係中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年青人會刻意在戀愛關係努力向對方展示對關係的承諾以圖消除關係中的不確定性，婚姻成為了維持親密關係的一個策略。Farrer 認為年青人對承諾的強調正正顯示了國家和父母的影響，令年青人對婚姻的重視未曾消退。也就是說，在國家和父母的角力下，婚姻仍然是中國年青人未能放下的人生任務，只是說年青人的性行為和親密關係有更多元的選擇和模式。

第三節變動局勢中的中港夫妻的性別分工

壹、「上嫁下娶」的家庭分工

在「(全球)上嫁下娶」的婚姻關係中，「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模式仍是常見的分工模式(Yamanaka, 2009; Ma et al. 2010)。移民女性一般都是家務事的負責人，而一些移民研究也呈現了移民女性在移入地工作的經驗(王宏仁, 2001; 趙彥寧, 2004); 不過，無論移民女性有沒有投入到移入地的勞動市場，她們一般是家務勞動的主要負責人，而男性則是家庭經濟的主要提供者。王宏仁、田晶瑩(2006)研究何以台灣男性會娶越南女性，認為台灣社會仍然受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影響著，台灣男性認為「男人要當家」作為家庭主要的經濟提供者，理想的妻子就是如越南女性「依賴、不能自主、物質需求低」。當台灣女性無法符合傳統性別文化的想像，加上台灣男性社經地位比台灣女性弱勢，台灣男性透過跨國婚姻來實踐「男人當家」和傳統「權力—順從」的兩性關係，再製出「男性氣魄」(masculinity)的文化。此種性別角色的說法也出現在 Li(2002)的研究，Li 探究香港男性何以主動尋找內地女性作為妻子，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女性經濟能力提升，香港男性的經濟提升不如女性，香港男性轉移尋找內地女性為妻，一是認為內地女性更香港女性更願意扮演傳統妻子的角色：服從丈夫，任勞任怨照顧丈夫和家庭，以及作為兒童照顧者；另外，中港婚姻中，由於內地妻子經濟上依賴香港丈夫，香港丈夫因而占據關係中更優勢的位置，可以要求內地妻子服從丈夫的要求而調整其婚姻生活。

黃、田和 Li 的研究除了顯示了上述的跨國／跨境婚姻呈現「上嫁下娶」的婚姻配對；這些婚姻中，個人經濟能力對於跨國／中港夫妻的權力關係甚有影響：作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提供者便擁有愈大的決定權和成為關係中的主導者；相反，經濟從屬的一方要配合另一方的要求和期待，「服從丈夫、照顧家庭」是其中一些被認為好妻子的條件；明顯地，依賴家庭經濟的移民女性被賦予了「主內」的角色和分工。相對資源／權力理論(relative resources approach)假設了家庭中未能從勞力市場中貢獻資源的人較為弱勢，必須以家務工作作為替代報酬，才能分享物質的資源，例如收入與消費(Spitze,1986；Ross,1987，引自蔡明璋，2002)。該理論認為：夫妻會根據雙方所佔有的資源而在婚姻中進行議價(Manser and Brown, 1980; Mcelroy and Horney, 1981)，家務勞動的分工便是家庭中男女權力角力的結果。移民女性必然是家務的負責人者？

貳、家務分工的轉變

二十一世紀初，中港婚姻仍然是「上嫁下娶」的婚姻配對，出現「男主外，女主內」的角色分工，香港男性作為「養家」的承擔者，有更大的議價力減少承擔家務勞動。隨著國際分工位置的變動，內地女性的經濟能力大有提升，相對來說，香港男性的經濟狀況未有太大改善，如此的變化下，中港婚姻「上嫁下娶」的配對不但也出現了變數，連中港夫妻間的家務分工也出現了改變，其中高學歷中港夫妻間更常出現共同分擔家務的狀況，李美玲等人(2000)的研究認為，假若夫妻雙方持有大學學歷或者其中一方具有性別平權意識都會正面提高了丈夫參與家務勞動。

相對資源／權力論似乎隱藏了一個假設：沒有人願意主動做家務勞動，承擔較多家務勞動的一位在家庭中的權力必然較低。2013年香港的全職「家庭主夫」人數增加了三倍，人數接近1萬4千人，而同時從事工作的家庭主夫中，有不少從事專業工作³⁵，他們受工作彈性化的影響而改變了工作的模式。在此舉出「家庭主夫」的例子，一是想要帶工作模式的轉變；二是希望可以指出相對資源／權力論，沒有因應現代社會中親密關係的轉變而有更適切的調整。Jamieson(2002)在《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一書中，特別強調親密關係的「實踐」層

³⁵爽通識：「食軟飯」食出性別定型 (蘋果新聞，2013年6月27日)，資料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726/18350195>

面，也就是對伴侶的關懷、照顧與分享的實際行動。如果以 Jamieson 的親密關係觀點來看家務勞動的分工，主動承擔家務勞動可以是關係中其中一方營造／維持親密感的一個行動。蔡明璋(2002)的研究發現，對於參與更多家務勞動的男性以及參與較少量家務勞動的女性兩個研究對象群來說，親密關係是促成家務分工平等的因素，其中支援女性配偶自主工作的價值觀更是一個重要的性別意識。

佟新、劉愛玉(2015)專門分析促成中國內地夫妻合作型家務勞動的因素時，表示除了 1)夫妻的教育程度差距和女性經濟獨立程度都會影響丈夫在家務勞動的參與外(例如：夫妻教育程度相約、妻子學歷高於丈夫，或者夫妻間的經濟更平等)，2)妻子會要求、接納、享受丈夫的家務勞動，也有效促進夫妻共同合作做家務；3)家務勞動具備情感功能，對配偶的情感投入直接作用於夫妻合作型家務勞動模式的產生：男女雙方都會以分擔家務勞動的方式表達對配偶的情感，男性尤其會在孩子六歲之前(家庭正是家務繁忙的週期)，用參與家務勞動的方式表達對妻子的情感支持。不過，由於受限於性別角色的期待，男性用分擔家務表達對配偶的情感會被過分放大，而女性用同樣的方式卻被合理化。

在變動的局勢中，中港家庭權力關係會有怎樣的改變？家務分工除了顯示了兩地夫妻間的權力關係，會否有更多的面向，例如上述 Jamieson 認為作為營造／維持親密感的一個行動，又或者是情感支持的一種方式？

第三章研究目的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中港婚姻研究豐厚，本研究希望從鉅觀和微觀的視角進行分析，研究目的有兩個：

- 一、檢視中港兩地的經濟融合計劃如何使到中港婚姻持續成為香港婚姻的主要模式之一。

研究問題：

- I. 90年代以後，中國內地和香港經濟狀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
- II. 推行了怎樣的經濟融合計劃？
- III. 這些計劃及相關措施對中港婚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 二、了解在世界體系的分工變動中，對於「上嫁下娶」的中港婚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研究問題：

- I. 「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和婚姻實踐仍然存在嗎？
- II. 中港男女在婚姻關係中的議價資源為何？並且對性別分工、家務分工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第二節研究範圍時間、對象

不同時期的社會環境對於中港婚姻的促成有所影響，加上已有不少研究針對2000年前的中港婚姻，而此研究針對中港兩地在落實 CEPA 加速經濟融合的同時對兩地人民親密關係的影響，故此研究把時期聚焦於2003年至2015年期間締結的中港婚姻。

此研究的對象為締結中港婚姻的兩地人民，香港丈夫內地妻子為主要的配對模式，另外，香港妻子內地丈夫的數量與日俱增，故是此研究特別納入此類型的中港婚姻。從內地移居到香港的人數甚多，回歸後每年維持在四至五萬人，所以在辨析「香港人」和「內地人」身份時會出現複雜的情況，有不少持有「香港永久身份」的香港公民是在幼年、青少年、成年不同的時期來到香港的。身份既由主觀因素又有客觀因素交織而成，故難以簡單地去劃分。有研究會採用出生地即

「香港出生」、「內地出生」來分辨，這種方式傾向天生決定論，好處在於簡單易辨別。不過，香港是一個滿佈移民的地方，對於內地出生在香港接受教育和成長的人來說，他們的認同和內地出生接受教育和成長的人來說，就有不一樣的可能。所以，在劃分是否中港婚姻時會參考以下的原則：1)結婚時，一方持有中國內地的戶籍，另一方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2)在港的內地移民，15歲前移居香港並在港接受教育當作「香港」身份。3)清晰地表達個人身份認同。

是次研究，分成「香港丈夫內地妻子」和「香港妻子內地丈夫」的兩種配對方式，共有 17 位受訪者，他們主要在 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出生。在「香港丈夫內地妻子」的配對中，有 2 位受訪香港男性，9 位受訪內地女性，當中 5 位女性以持有單程證方式來港居留，其餘 4 位以就學、工作簽證來港居留，其中有 3 位已取得永久身份。「香港妻子和內地丈夫」的配對中，有 5 位受訪香港女性，其中 2 位已經移居北京，其餘 3 位仍在港居住；另外，2 位受訪內地男性中，有 1 位已申請了單程證仍在等候審批中。

第三節方法選取及步驟

由於本研究要探索中港兩地在實行經濟融合對親密關係的影響，包括兩地人民認識的管道、兩人互動、對婚姻的想像等，故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以深度訪談作為搜集資料的方式，並輔以次級資料和文獻資料整理分析佐證。為了在有限的訪談時間保持受訪者的參與性，本人先準備了一份訪談提綱，根據研究問題而作出了提問，而此提綱作為一種提示，根據訪談的情況對訪談程式和內容進行靈活的調整，以免過於規範化的形式阻礙了受訪者的參與。

本人曾在非政府組織工作，跟進基層家庭幼兒照顧的需求，當時已認識不少新移民女性和其他組織新移民女性的團體。這些新移民女性屬於比較常見的類型，他們的丈夫很多是移民或者移民二代，在香港從事基層工作，通過內地親屬網絡而認識內地妻子，當中也有少數在深圳工作、休閒時認識的。故此，本人通過這些團體協助，與 6 位內地移民女性在這些團體的活動室進行訪談。由於部分受訪者與我在工作時已認識，故訪談期間只需簡單熱身已經熟絡地聊起來。不過，也基於已建立的關係，受訪者認為訪談員很熟悉她們的家庭狀況，會出現含糊帶過，比如說：「你知道的」、「怎麼會不知道」、「XXX，你也見過他的」，訪談員的追問會讓受訪者感到奇怪。也就是說，訪談者基於以前工作已建立的關係，很順利

地進入到田野，得到受訪者的信任，卻同時因為這種便利，同時混淆了工作人員和訪談者的身份。

為了找到已有文獻中比較看不到的類型，像是香港妻子和持就學／工作簽證來港的內地妻子這兩種類別，一方面我採用了滾雪球的方式，在人際網絡拓展搜尋；另一方面，我在 Facebook 找了幾個內地人在港生活的群組，表明了此次研究的目的，希望可以在他們平臺招募受訪者，結果都不獲回覆。同時，我也觀察了數個內地盛行的網絡平臺，例如百度貼吧和微博，以「香港妻」、「嫁到大陸的香港女生」、「娶香港老婆」等關鍵字搜尋和發貼，只有找到相關的移民條例；有個別的帳戶回覆有認識的人娶香港老婆／香港女人嫁去大陸，再深入詢問也是不獲回覆。另外，研究者發現有不少「成年子女到港生活」和「內地妻」的群組，互相分享單程證申請、領證、在香港辦身份證的注意細項，也會把到港生活、工作、讀書困難等等的狀況分享，相對來說，「內地成年子女」和「內地妻」的這兩個組群最為常見，在網絡世界也較為容易找到「同路人」互相支持，而「香港妻」的人數明顯較少，也有可能她們掌握較多的資源，在應對生活困難上有較多的能力處理，所以在網絡和實際生活較少遇見。相反，年幼時移居到香港並在香港長大的年輕移民人數較多，因此我也較容易在香港的人際網絡中用滾雪球的方式找到。

最後，通過滾雪球的方式訪談了四位持就學／工作簽證來港的內地女性和他們其中 1 位的香港丈夫；還有，5 位香港女性和 2 位內地丈夫。由於有多位受訪者經常不在香港，我們只好使用非直接的方式來做訪問：其中有四位使用 Whatsapp 和微訊來進行訪談；有一位只同意透過電郵用問卷方式進行，受限於單方面的溝通，使用問卷的搜取到的資料非常有限，只能作為參考而不會用作分析。透過面對面的訪談，我們安排在方便受訪者活動的地區，盡量安排在安靜、安全的環境中進行，每次訪談從 90 分鐘到 180 分鐘不等，之後如有需要會再用電話聯絡跟進。至於使用電話軟件來進行訪談的，雖然可以解決地理的問題，不過，無法觀察對方的身體語言只能更依賴對話，訪談者只好盡量把細節談清楚。每位的受訪次數從一次到四次不等，每次時間由 40 分鐘至 120 分鐘不等。由於「香港妻子內地丈夫」這個群組比較零散，這六位相關的受訪者均表示不認識類似婚姻狀況的朋友，難以透過他們的網絡繼續找尋相同類別的受訪者。

第四節訪談對象介紹

表 3- 1：內地女性受訪資料

內地女性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年齡	學歷	出生地	認識渠道	結婚時間	取得單程證時間 /其他居留證件	工作經驗
1	黃槿	2015年12月18日	面談	37歲	高中(國內)	廣東省肇慶市	阿姨介紹	2010年11月	2015年10月	文員、服務生
2	木荷	1/2/2015 15/1/2016	面談	48歲	小學(國內)	廣東省江門市	朋友介紹	2010年12月	2015年7月	農民、車衣女工
3	龍柏	2016年2月1日	面談	33歲	高中(國內)	廣東省清遠市	長輩介紹	2010年12月	2015年7月	銷售員、美容師
4	白千層	2016年1月28日	面談	33歲	護理專科(國內)	廣東省江門市	網絡社交平台	2010年9月	14年7月	護士、汽車保險銷售員 保健員(香港)
5	鳳凰木	2016年1月31日	面談	29歲	高中(國內)	四川省自貢市	朋友介紹	2010年1月	2014年年底	工廠工人、銷售員、化妝師 (香港)雜務、侍應
6	油桐	2016年8月2日	電話軟體	30歲	大學(國內) 碩士(香港)	浙江省杭州市	學校認識	2016年4月	就學、探親簽證	銀行翻譯
7	傘樹	2016年10月1日	面談	35歲	大學(國內) 碩士(英國及香港) 博士(香港)	上海市	朋友婚禮上	2010年	就學簽證(已是永久居民)	自由撰稿人 (香港)大學講師
8	桂花	2016年10月5日	面談	30歲	大學(國內) 碩士(香港)	廣西省柳州市	學系交流團	2013年	工作簽證	(香港)社工
9	山茶	2016年11月23日	面談	35歲	大學(英國) 碩士(香港)	遼寧	舊同事介紹	2013年	就業、工作簽證 (已是永久居留)	(香港)核數師、編輯、市場推廣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表 3- 2：內地男性受訪資料

內地男性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年齡	學歷	出生地	認識渠道	結婚時間	取得單程證時間 /其他居留證件	工作經驗
1	馬尾松	2016年1月5日	面談	32歲	專科(國內)	河南省	國內旅行認識	2010年8月	申請中	淘寶電商、攝影、 酒店餐飲服務生
2	梧桐	13、15、 21/12/2015	電話軟體	40歲	中學(國內)	廣東省清遠市	朋友介紹	2013年1月24日	沒有申請	領隊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表 3- 3：香港女性受訪資料

香港女性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年齡	學歷	出生地	香港定居	認識渠道	結婚時間	工作經驗
1	茉莉	2015年12月16日	面談	33歲	碩士(香港)	香港	/	國內旅行認識	2010年8月	(香港)HR、活動工作人員、社工
2	蒲桃	2015年12月22日	面談	33歲	中學(香港)	廣東省汕頭市	99年	朋友介紹	2014年8月	(香港)時裝銷售員、酒樓侍應、部長
3	紅戒球	2016年6月16日	電話軟體	26歲	中學(香港) 酒店管理證書	香港	/	工作的CAFÉ認識	2014年	(澳洲)CAFÉ接待
4	桔梗	2016年7月9日	電話軟體	28歲	中學(香港)	深圳	98年	國內旅行朋友介紹	2011年	(香港)物理治療助理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表 3- 4：香港男性受訪資料

香港男性										
		訪談日期	訪談方式	年齡	學歷	出生地	認識渠道	結婚時間時間	工作經驗	
1	銀柴	2016年1月31日	面談	50歲	中學(香港)	香港	朋友介紹	2010年1月	(國內)品質檢驗主管	
2	落羽松	2015年12月23日	面談	30歲	大學(香港)	香港	學校認識	2016年4月	(香港)護士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上述列出受訪者的訪談和簡介背景，以下根據婚姻、經濟、學歷、定居地等特點分成 4 類(表 3-5)，以方便分析之用。首先，以姻婚配對的類型分成 1)香港男性內地女性和 2)香港女性內地男性兩大分類，每項分類根據其特性再作劃分。

表 3- 5：不同類型的中港婚姻配對

香港男性內地女性	
基層中港婚姻	高學歷中港婚姻
黃槿、木荷、龍柏、白千層、鳳凰木	油桐、傘樹、桂花、山茶

香港女性內地男性	
目前定居香港	目前定居內地
茉莉、桔梗、木棉	蒲桃、紅戒球、銀樺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第五節反思及限制

每次的訪談對於作為訪談者的我來說，都有新的啟發，讓我看到同一個年代的人，如何用「移動」為自己的生命畫上精彩的風景。不得不承認訪談者和受訪者的權力關係是不平等，尤其當訪談者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訪談者過多表明立場會引導受訪者在訪談中傾向類似立場。為了減少權力的懸殊，我會向受訪者表明移民身份，讓對方知道在社會位置上，我跟她都是移民。作為同齡的移民女性，我們拉近了彼此的距離，除了更樂於分享，受訪者表示對我的經驗和想法有興趣，我會在訪談後面部分作適量的自我披露。我也發現有些時候，我的移民背景會讓有些受訪者產生移情作用，她們會期待小孩可以在教育方面得到更多的發展。

Kvale(1996)說訪談者有如旅人，藉由共遊與對話讓原住民講述其生活世界的故事。訪談過程，不只帶來新的知識，也對旅人(研究者)產生轉化的效果。在研究者在過程中發現並反省自己國度裡本來視為理所當然的價值與風俗，因而導致新的自我理解。對於 Kvale 以上所說的，訪談者甚有同感。在訪問來港就學／工作的內地女性之前，我對於中港婚姻的想像非常狹隘，以為內地女性伴侶都會申請單程證來香港家庭團聚，有一次，當我聽到一位來港就學的內地女性告訴我不想申請單程證並跟我解釋當中的原因，我才突然意識到俗話的「嫁雞隨雞」可能是一個性別因素讓內地女性都會移居到香港和丈夫團聚，可是，不見得必須要用單程證來港，使用何種方式來港居留可能更多來自於階級因素，擁有的資本愈豐富，來港方式的選擇愈多元。於是，我再找了幾位高學歷、以就學／工作簽證來港定居的內地女性做訪談，確定了上述的猜測也更豐富了不同的移民經驗。

對於應該如何理解、詮釋、解讀受訪者的經驗和想法，我在分析的時候顯得有點手足無措，因為我很擔心身為學術研究者的身份，會把一些理念的觀點套在他們的身上，而很可能他們從來也未有過如此的想法。又或者我對於婚姻、家庭、性別的既定立場在訪談和分析時窒礙了我對受訪者經驗的理解。我嘗試透過來回閱讀逐字稿重回訪談時的脈絡，以嘗試減少個人過於主觀的詮釋。

在資料搜集方面，由於受訪者是通過研究者的人際網絡去尋找，可能造成受訪者的同質性比較高，像是有幾位受訪者的職業都是社工、護士一類的專業人士；此外，「香港妻子」這一類別的受訪者不好尋找，以致於有些類型(例如北上工作的香港妻子)在此次研究實在無法涵括在內。不過，正正因為很難找到她們，截

至目前尚未有相關研究，所以十分值得再去探索此一類型的受訪者，以利於豐富研究。

第四章經濟帶動的中港婚姻和移民制度轉變

中國和香港的關係長遠以來，複雜、詭異、多變。毛時期中國把香港視為邪惡的資本主義殖民地，改革開放之時鄧小平又將香港視為中國未來城市的典範，回歸之後以接管香港證明中國有能力與世界經濟接軌(駱穎佳，2016)。這當中見證了自由主義在中國和香港的發展，也反照出中國在世界體系的位置攀升，以及香港經濟後來對內地市場的過度依賴。Arif Dirlik(1993)認為，鄧小平企圖採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建立社會主義中國，也就是資本主義是「手段」，社會主義才是「目的」。如此思想之下，香港既是一個資本主義示範城市，同時，也是「全球國族資本主義空間」(global national capitalist space)(駱穎佳，2016)，香港資本家為內地市場帶來了大批的資金，海外的基金也透過香港進駐到內地，內地大量廉價勞動力支撐內地成為「世界工廠」，GDP 大幅上升之餘，工人被不同資本家剝削。回歸後，中國一方面強調香港的經濟成就，另一方面沿用英國殖民方式把香港人概括為「經濟動物」(羅永生，2014)，企圖以發展經濟掩蓋管治衝突。

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香港和中國內地的角色出現了轉變。90 年代內地轉型出口加工業，香港是中國內地主要的海外資金來源，同時也是中國和國際市場的貿易橋樑，避免了內地市場全面自由化。而二十一世紀之後，香港市場著眼於如何吸引內地資金和消費，被視為扶持香港經濟的大靠山，而《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Mainland and Hong Kong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以下簡稱 CEPA 便是促進中港融合的經濟計劃之一，當中不少部分針對內地／香港如何吸引對方資金和擴大兩地消費市場。

在此先就 CEPA 作簡單介紹，尤其和中港婚姻有所關連的部分將會在本章的第二、三節以及第七章詳細分析。2003 年 6 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中央政府簽署了 CEPA，香港特別行政區工業貿易署的官方網站清楚地列出落實 CEPA 的目標以及對於中國和香港的影響：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是內地與香港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CEPA》涵蓋三大範疇，分別為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貿易投資便利化。《CEPA》加強了兩地貨物和服務貿易關係，促進兩地

貿易及投資便利化，對加快兩地經貿融合，及促進兩地經貿長遠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

雖然有學者指 CEPA 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起了正面的幫助(吳崇伯, 2007; 王煜, 2014), 不過同時, 也為兩地社會和人民加劇了中港矛盾, 其經濟成效被過於誇大。CEPA 後, 對香港貨物貿易方面未有明顯的幫助, 2004 年及以後製造業的生產總值和就業人口都在持續萎縮, 即使內地提供零關稅也能有效增加本地貨物製造和輸出。相反, 落實 CEPA 之後, 服務貿易有明顯增幅。服務貿易協議規定 18 個服務行業³⁶獲得放寬準入, 香港服務提供者以優惠條件進入內地市場, 也就是說, 過去內地服務市場的準入門檻對香港大部分服務業的公司來說都屬過高, 而 CEPA 的落實降低了香港公司準入門檻, 使得香港的中小企業更容易進入內地服務業市場, 並且享有多項優惠³⁷。根據《香港統計年刊 2014》, 落實 CEPA 之後, 香港輸出到中國內地的服務金額於 2004 年有 2 成多的比例(超過 1,000 億港幣), 到了 2013 年已上升到 4 成左右(即 3,171.49 億港幣)。整體的服務輸出量來看, 運輸、旅遊、金融是主要的類型; 2013 年, 三者加起來已超過整個服務輸出量的八成, 這三項服務在多年來都有持續增加(除了金融海嘯的 2008 年和 2009 年有所下降)。

參考《內地與香港經濟合作概覽》, 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 雙方同意在 10 個範圍加強合作, 在香港創造了 4,400 個職位, 在內地創造了 40,600 個職位。除了金融、影視業方面(例如: 香港有 15 家銀行在內地設立了分行、辦事處等, 資產合計佔了外資銀行資產總額 37.2%, 其他專業服務在內地的發展十分有限, 例如, 2009 年至 2013 年向香港會計師事務所發的臨時執業許可 110 批次, 惠及香港的專業人次有 3500 多次; 230 名香港居民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其中有 90 名在內地執業; 另外, 有 1490 名香港專業人士獲得內地短期執業資格等。不難發現, CEPA 的落實(尤其在服務貿易方面), 促進了香港服務業北上拓展, 增加港人跨境工作的機會。

雖然香港社會經常出現反對中港融合的聲音, 可是, 中港融合已成為香港特

³⁶括會計、廣告、視聽、銀行、會議展覽、分銷、貨物運輸代理、保險、法律、物流、管理顧問、醫療及牙醫、建築及房地產、證券、倉儲、運輸、旅遊及電訊。

³⁷優惠的形式包括允許獨資經營、減少持股限制、降低股本的要求、降低地域及服務範圍限制等。

別行政區特首的政績指標，梁振英在公開場合毫不避諱地一再表示，中港婚姻象徵了中港融合程度的深厚：「有三分之一於香港登記註冊結婚的人，是香港人與內地人結婚，中港融合其實早已發展得很快，只是並非很多香港人和內地人留意到」³⁸。接下來，第一節會追溯 90 年代以後兩地經濟的轉變，以及每次的經濟結構轉變導致中港婚姻產生了怎樣的新類型(此部分的重點在於分析新類型如何產生及其特徵，並不能代表新類型就是當時期的主要配對模式；由於現時官方、學術對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婚姻研究及數據嚴重欠缺，基於對研究可靠度的考慮，此類型的配對無法併置在此部分一起分析)。第二節會細緻地探究香港在回歸後，在保持全球城市的位置之時，如何因應兩地經濟策略，調整不同階級的移民限制，提升香港競爭力。第三節會繼續探索，同是來自內地的移民女性，她們同樣和香港男性締結婚姻，在簽證申請、限制以及夫妻間的差異為何。

第一節兩地經濟發展和中港婚姻的變化

壹、90 年代前：首波大型中港婚姻潮

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和澳門同屬特別行政區，採取「一國兩制」的管治方式。有別於其他中國城市，香港和澳門的邊界管理受著不一樣的監控，雖然同屬一個國家，可是並非擁有中國戶籍的人口都可以在這兩個地方自由進出和取得居住權。香港現時對內地人口的移入管制沿於殖民時期的邊界管理政策。殖民地時代早期，香港的邊界管控並不嚴密，內地人民可以自由出入及在港居留，香港人口大幅度增長，除了因為戰後的嬰兒潮造成，還受內地移民人口影響(趙永佳、呂大樂，1997)。30 年代至 70 年代，因應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大饑荒、文革等事件，引發了多次的移民潮，大批內地人口湧入又移出香港，香港人口由 1931 年的 87 萬躍升到 1985 年的 550 萬。1950 年代，韓戰開戰不久，香港的失業率持續，殖民政府和中國政府協商後，香港移民政策設立配額制度(quota system)，規定須持有內地當局發出的通行程³⁹之中國公民才可以在港居留。從此，取得通行程成為了合法移民的途徑，不過當時仍有不少人偷渡到港，殖民政府用身份證區分合法居民和非法移民；也就是說在五十年代之前，沒有居港權問題，沒有香

³⁸ 「稱中港婚姻證明兩地飛快融合」(蘋果日報，2015 年 3 月 26 日)，資料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326/19090433>

³⁹ 即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俗稱：單程證)的前身。

港人與非香港人之分野，也沒有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之分(谷淑美，2001)。

內地政局動盪，非法移民人數持續增加，香港於 1980 年取消了抵壘政策⁴⁰，通行證更成為內地人士移民到香港的主要途徑並沿用至今。而 80 年代開始，中國內地和香港兩地人民結婚數量增加。主要由於 1970 至 1980 年代期間有接近 40 萬(包括合法和非法)內地移民到港，當中主要是低教育水準的年輕男性，由於當時適婚男性比適婚女性多，加上內地的男性移民處於香港社會劣勢，難以在香港娶妻。不過，他們和內地親人有密切的聯繫，加上香港居留的吸引因素，移民男性回到內地農村娶妻成為當時的風潮(羅小鋒，2008)。殖民政府當時沒有授予這些內地配偶居留權，她們在結婚後不能馬上移居香港。直至 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香港政府才開始加快處理他們的申請(Pong et al, 2014)，加上單程證等候時間漫長⁴¹，導致 90 年代香港開始出現了內地配偶及子女到港與丈夫團聚潮。而 Pong 等學者認為這一波的中港婚姻屬於同族通婚(又或者稱作內婚)(endogamous marriages)。不過，Li(2001)的研究表示 2000 年前後，回內地娶妻的香港男性族群出現了改變，相比早前的內地藍領移民男性，有更多香港出生的高學歷年輕白領男生主動尋找內地妻子。

貳、1990 年至 2010 年：經濟轉型跨境工作湧現

如果說首波大規模的中港婚姻是由不穩政局引發的移民潮捲動的，那麼 90 年代之後，讓這股風潮持續捲動的除了是中港兩地人民難以劃清的家屬網絡外，與中國內地的改革開放導致兩地人民互動大幅增加有莫大關係。香港工業的一個特色是以小型廠家為主，以密集式勞動生產，透過國際買家和出入口貿易公司取得外國廠家、百貨公司、批發、零售訂單，扣連著國際市場，成為國際性外判的一個環節(commercial international subcontracting)(趙永佳、呂大樂，1997)。70 年代，香港工業生產成本逐漸提升(包括工資和租金)，對密集式勞動生產的廠家影響最大。不過，源源不絕的內地移民成為了本地資本家好用的廉價勞動力，製造業得以繼續在港生產，延後了香港工業的衰退。

直到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沿海「經濟特區」提供投資優惠⁴²。張少強和崔志

⁴⁰ 1974 年至 1980 實施，只要由中國大陸偷渡到香港市區(界限街以南)即得到香港居民的身份。

⁴¹ 90 年代初的申請等候時間幾乎超過 10 年，去到 2000 年申請等候時間縮短至 6 年左右。

⁴² 深圳的蛇口被指定用於工業發展，1982 年 1 月已簽訂了 1 千份外國人到深圳投資的合同，投資額約 15.7 億美元，香港投資者占了 91%，海外華人占了 5.5%，外國投資者占 3.5%(Y.C. Yao,

輝(2015)描述香港由工業年代轉為後工業時期，香港工業和工人流移到「經濟特區」：80年代港商開始將生產工作轉移到內地工廠處理，把資金、技術、產業的知識帶到了中國市場。90年代更出現大量工廠北移、大批工人失業的狀況，部分男性工人跟隨生產線北移到內地沿海「經濟特區」工作，負責監督和教導內地基層的工人。珠江三角的代工廠採取高彈性的運作方式，經歷97年亞洲金融風暴打擊，資金快速撤資和關廠，「經濟特區」的製造業大受打擊，2000年時跨境工作人口從事製造業委縮至37.3%。

企業家將整個生產工序遷移往中國內地或鄰近經濟地區，在香港的公司則只保留其他非生產的功能，例如市場銷售、訂單處理、材料採購、設計、產品發展、品質控制、包裝及後勤服務等。雖然這些香港公司會為中國內地生產提供技術支援服務，在本港的營運性質已由製造業轉為貿易業，即是由生產商轉為服務供應商。及後，北上的公司愈來愈多從事服務業，2005年有32.3%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到了2010年，比例上升至43.5%，不到四成從事製造業(表4-1)。2005年期間是香港人北上工作的高峰期，而1990至2005年間，北上工作的人口從事的主要行業從製造業及後已逐漸轉為服務業，當中尤其以出口貿易及批發興盛，北上工作的香港人多年來主要擔任「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

表4-1：1995年至2010年在內地工作從事的主要行業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製造業	55.0%	37.3%	47.4%	39.5%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酒店業	29.4%	44.5%	32.3%	43.5%

資料來源：《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香港統計處，1997、2001、2005、2010、2011)

從90年代開始，北上工作的人口主要以男性為主，並多數由香港公司派遣到內地工作。1995年，12萬北上人口中86.2%為男性(表4-2)，有超過55%任職

1983)；深圳1981年的工業所得是1978年的5倍。

於製造業⁴³。到 2010 年，北上人口增加到 17 萬，男性人口比例雖然下降了 10% 左右，不過，北上工作男性人口數量卻增加了 2 萬多。當中有超過 5 成在 90 年代已經有北上工作的經驗。至於經常工作地點方面，接近 9 成為廣東省，深圳和東莞為省內最為經常工作的地點，而上海和北京為廣東省以外經常工作的地點。

表 4- 2：1995 年至 2010 年跨境工作人口資料

	1995年	2000年	2005年	2010年
人口	12萬	18萬	23萬	17萬
男性比例	86.2%	82.3%	75.8%	76.6%
平均年齡	未有提供	41歲	42歲	47歲
平均月入	未有提供	HK\$18,000	HK\$16,000	HK\$20,000

資料來源：《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香港統計處，1997、2001、2005、2010、2011)

中國沿海經濟特區在二十一世紀出現勞動力短缺和勞動成本上漲，依賴密集勞動力生產的工廠再度遷移到內陸地區尋求廉價勞動力。而現時留在深圳、東莞的製造業主要是高科技製造業，不少女工已轉移投入到沿海城市服務業。加上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繼續向全球城市方向發展；第三產業不斷膨脹，當地的國際金融服務(特別是金融、保險、房地產、銀行、會計和市場方面的服務)蓬勃發展；而國際性企業、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跨國集團等總部開始進駐這些城市。正如 Sassen(1988)所言，每次經濟結構重整都會導致缺工，尤其在去工業化轉向全球化城市，對先進技術和管理人才的需求大，更釋放了大量的低薪工作，出現了收入兩極化(income polarization)的情形。可以想像，在勞動者方面，也會出現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以及底層服務業勞工的兩極化。

另一方面，2003 年中國內地與香港簽訂了首項自由貿易協議--CEPA，2010 年，再簽訂了《粵港合作框架協議》⁴⁴(Framework Agreement on Hong

⁴³ 內地製造業已累積了技術，自然就減少了對香港技術工人的需求；到了 2010 年，只剩 39.5% 左右。

⁴⁴ 落實和明確粵港兩地合作，打造世界級經濟區，更首次清楚羅列粵港雙方的分工和互補，有：支持和鼓勵香港的保險業機構在廣東省開業；容許香港的金融機構（包括銀行）在廣東省開辦村鎮銀行和小額貸款公司等。協議的目標，包括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揮香港服

Kong/Guangdong Cooperation)，兩地經濟融合，互動更頻繁，從製造業擴展至商業及個人服務業(張少強、崔志輝，2015)；跨境工作的人口比起早年北上工作的工人**擁有較高學歷、薪金及專業等**，當中仍以男性為主，而女性比例逐漸提升(2011年時女性比例約有23.4%左右)，當中超過4成人持有專上學歷，而小學以下學歷的比例不到6%。

中港男女背景轉變

90年代開始，中國經濟發展得以由重工業調整成以出口導向型的輕工業，靠的就是吸納農村勞動力投入勞動密集式產業，變成世界工廠。外資進入珠江三角洲設廠需要大量勞動力，有超過一半女性聚集在廣東省，出現移民工女性化現象(譚深，1997)。1990年代至2010年，香港一些行業如製造業、服務、銷售、和專業需要派遣工人北上跨境工作，當中以男性為主。他們在工作、消遣時與內地人民互動，有些因而結識了其伴侶。也就是說，伴隨中國出口導向型的輕工業發展，促使了大量的農村女性和為數不少的香港男性去到經濟特區工作，造就了兩者認識交往。這與Siu(2008)的研究相符，他發現內地妻子不再是來自貧窮農村的女性，反而很多都是來自於城市並且有工廠工作經驗。

Ma(2010)等人採用了1998年至2005年香港婚姻登記的資料，比對中港婚姻和香港婚姻。在他們的資料中，中港婚姻中香港丈夫有23.68%擔任「經理及行政人員」、「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也就是最多北上工作男性擔任的職位)，其他多數從事是藍領工作⁴⁵；而內地妻子從事耕種、捕漁的比例不到1%，從事文書工作有11.57%，而有超過六成的內地妻子從事的職業為「其他」⁴⁶。這些數據顯示了1990年代至2005年的中港婚姻，多數中港婚姻的男性從事藍領工作，不過，也有少數中層管理者和專業人士，可見2005年前登記的中港婚姻，多數是基層人民的結合；而經濟特區發展加工型的工業帶動了兩地男女不同階層工人的相遇。Ma等人指比起韓國、日本、新加坡三國的跨國婚姻，中港婚姻更傾向於傳統配對的方式，指的是在年齡、學歷、職業聲望和收入四方面，妻子都比丈夫小和低，

務業和廣東製造業優勢，促進區域人、貨、資訊、資金等要素往來，構建區域環境和生態保護體系等。細項。

⁴⁵ 服務工作及銷售員有13.0%、技術工人共有15.11%，非技術工人有16.66%等。

⁴⁶ 有可能香港統計調查的職業分類並不適用於內地的職業分類，以致於有超過62%的內地女性職業被歸類為「沒有/其他/不明」的類別，從事「經理及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員及輔助專業人員」合共有11.8%。

中港夫妻在這四方面比起香港夫妻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更為明顯。

Pong 等人(2014)研究採用了 1991 至 2011 年人口統計數據，指內地妻的學歷普遍提升了，尤其高學歷內地妻子和香港丈夫在年齡和學歷方面的差距都比較小。參考入境事務處資料，2003 年後，來港定居的內地女性中學畢業的比例已超過 7 成，大專學歷的數量則從不到一成，上升到接近兩成；內地女性來港前任職「專業人士及行政人員」的數量維持在 1,000 多至 2000 名左右。一是由於深圳等城市在金融服務方面的發展，人力需求出現兩極化；二是中國內地的教育普及化，不過，內地教育體制發展仍然落後於香港，以致於普遍來說，香港丈夫的學歷仍然較內地妻子高。以下將會以受訪者香港男性銀柴和內地女性白千層的歷程，更具體地展現 2005 年之後北上跨境工作的香港男性和內地女性如何在內地經濟改革的機遇相識相知。

跨境工作的相遇：銀柴和鳳凰木

香港男性銀柴和內地基層女性鳳凰木便是在深圳工作期間，在一次朋友消閒聚會互相認識。銀柴出生在 60 年代中，他中學的一個暑假在香港一家皮工廠做學徒，為的就是買一雙球鞋，師傅教他如何塗膠水、如何裁剪。銀柴憑著學徒經驗，從 85 年開始已經到深圳工廠做驗貨：

我 1985、86 年上去的，當時還是做學徒檢驗皮手袋、皮具，那時深圳很落後，羅湖橋以前只是一條木橋，哪有現在這麼漂亮，沒有的士站，沒有水泥地，一地都是土。鄧小平 80 年代開放中國，他說『先富沿海，後富內陸』，深圳輕工業 OK 了，又有電子業進來了，就把輕工業塑膠、電鍍的推上惠州、東莞，現在到深圳幾乎找不到塑膠廠的，只有大的電子廠。

銀柴的年輕時期正好見證了內地改革開放，香港男性憑著製造經驗，在香港輕工業沒落的時期，搭上了開往深圳經濟特區製造業的火車，銀柴從 5 千多港幣的薪水做起(已經是當時辦公室文員 3 倍的薪水)，10 年左右他已經進升到主管(supervisor)的位置，月薪已經有 2 萬多。就在回歸中國前，社會瀰漫動盪不安的氣氛，他跟隨家人移民到加拿大，取得公民身份。在加拿大做了多年的非技術工人，銀柴打算回來香港可以找回自己喜歡的行業，加上當時 40 歲有了結婚的念頭，就在 2006 年從加拿大回流到香港。銀柴憑著(80 年代)深圳工作的經驗，加

上他又會英文、國語，隨即找到一份產品質控制(QC)助理經理(Assistant Manger)工作月薪 3 萬左右，需要不時往返深圳工廠。聘請銀柴的是一家美資公司，在深圳設廠專門替國際品牌加工生產，當時同類型的工廠在深圳已所剩無幾，畢竟在深圳的生產成本已經提升了不少。銀柴很快感受到工作前景已不如 97 回歸前，當時在內地開廠的老闆很願意用高薪挖角其他香港有經驗的技術管工，現在薪水水準已不如從前，連工人也變得比 80、90 年代不「聽話」、不「勤勞」。這其實反映了缺工潮和 2008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2004 年全國已實施最低工資，經濟特區為了留住資金，沒有嚴格管控最低工資落實，工人長期被壓低工資，而深圳生活成本卻持續高升；加上二線城市近年工作機會增加，造成工人返鄉後留縣工作，再到深圳等廣東工廠區工作的民工已大幅減少，工廠出現長期缺工的狀況。2008 年 1 月 1 日起，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正式施行，諸如資遣費、經濟補償費、轉嫁保證金等費用，當時有媒體估計每名員工的勞動成本將增加三成以上。加上同年有金融危機的打擊，不少工廠相繼倒閉。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的復甦相當緩慢，銀柴的美資公司受外環經濟影響，作出大量裁員的決定，銀柴成為了其中被裁的一員。

如銀柴所願，他在內地工作的第二年認識了現在的伴侶鳳凰木。鳳凰木出生於四川的一個農村，媽媽在鎮上開了間雜貨店賣日用品，鳳凰木跟著媽媽自小在鎮上生活、上學，很少回到鄉下。2005 年 18 歲的鳳凰木高中畢業後，馬上跟朋友一起到深圳工廠打工，可是時間長薪水低，鳳凰木熬過了一年後決定找其他工作，後來在一個新樓盤找到銷售建築材料的工作。深圳房地產從 2004 年開始上升，2006 年新建商品房銷售價格總水準比上年上升 11.8%，其後國家才出手嚴打房價，樓房的買賣為當地政府帶來了不少的收益。鳳凰木很喜歡銷售這份工作，由於提成以團隊來算，店裡的同事一起分，大家很團結也會分工合作，不會有競爭的氣氛。鳳凰木底薪有 1 千 5 人民幣加上提成，一個月最少有 3、4 千，比起她在工廠輕鬆多了。

銀柴和鳳凰木是在朋友聚會去唱歌喝酒認識的，經過共同朋友的介紹，銀柴主動向鳳凰木拿電話號碼，工餘時間約會，銀柴強調「我們在深圳拍拖 3 年才結婚的，不是那些騙人的」。拍拖時期開始，銀柴在福田⁴⁷租了 2 房 2 廳的單位，長

⁴⁷被喻為深圳的中環，鄰近福田口岸，社區、交通設施齊備，不少大型的樓盤住戶都是香港人。

期留在深圳和鳳凰木一起住活，直至銀柴在 2012 年被公司裁掉(當時他們已結婚 2 年)，銀柴只好隻身回到香港做保全，多重生活改變和壓力之下，銀柴翌年情緒暴發被鬱診斷為憂症。

銀柴和鳳凰木的經歷只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部分狀況。王志凱、史晉川(2011)的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中國的經濟差距表現在區域間。中國分為東、中、西三大經濟區域，改革開放為東部經濟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三大區域間的經濟差距更為明顯。不過，隨著生產成本上升以及受外環經濟影響，以出口加工業為主的沿海地區，外資的投放增長放慢，到 2011 年為止，東部地區製造業的總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為 52,456 億元人民幣，雖然依舊高於中西部地區的 50,256 億元人民幣，但是中西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成長率非常快。2005-2010 年的五年間，中西部地區製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了 4.8 倍，而同期東部地區只有 2.6 倍。2010 年之後更出現東部沿海製造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的趨勢，由於內陸地區新增了大量的工作機會，這些民工不必再遠走他鄉，可以選擇留在家鄉工作。西部本地農民工人數由 2008 年 8,501 萬人上升至 2012 年的 9,925 萬人，同一時段，農民工在東、中、西部省內務工的百分比也是持續上升，遠離家鄉到東部務工的省外民工更減少至 16.3%。國內的產業轉移，令到中港家庭銀柴和鳳凰木經歷家庭巨大的轉變，銀柴自此失去工作，不能再成為家庭的生計支持者，而鳳凰木只能在香港從事零散非技術的兼職工作，為家庭多賺一點收入。

參、2010 年及後：中港婚姻高學歷、中產化

如果說，中港婚姻多數的途徑在於親友網絡、內地工作和消閑娛樂，那麼，CEPA 以後，香港放寬內地人才來港工作和升學的申請限制便促成了香港成為一個新的場域，讓中港婚姻的男女在此締結緣份。從 2003 年起，兩地政府積極落實 CEPA 計劃，推出多項專才、投資計劃，每年發出的名額約有一萬五千名左右。從 2005 學年起，香港政府放寬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的入境政策，大陸學生可來港就讀全日制副學士、學士以及兼讀修課式研究生課程，2008 學年開始更放寬至短期課程。2010 年開始，大陸學生簽證每年已突破 1 萬名，2014 年更超過 19,000 名⁴⁸。由 2008 年開始實行的「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發出的名額由 2009 年的 3124 個，增加至 2014 年的 10,375 個。內地人才在港生活、工作，

⁴⁸發出非內地學生簽證數目：2010 年 6,532 個；2014 年，10,047 個。

並且和本地伴侶認識、結婚，他們無論在學歷、工作、收入，以至社經地位和其他的基層內地女性非常不同。由於這些背景也讓她們可以應付香港生活的挑戰，因而未有引起相關的關注，目前有關的資料非常有限。在此先介紹一對年青高學歷的香港男生和內地女生，透過他們的經驗更加了解兩地的狀況。

高學歷中港夫妻

香港醫護人手長期徘徊在崩壞的邊緣，落羽松在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在一間公立醫院的急診內科病房做護士，一天二十幾小時的工作除了中間可以休息 2、3 個小時，其餘時間都要站著。短短的兩年，落羽松的身體多處勞損，除了筋腱發炎拐著走路，腰部發炎更是痛得連彎腰繫鞋帶也做不到，落羽松當時有三萬多的月薪，卻覺得如同在戰地醫院用生命支撐著工作，「那份薪水，我寧願只拿一半，不做這個」。有感薪水豐厚卻對個人健康造成太大損害，落羽松萌生轉病房的念頭並在 2011 年開始就讀理工大學的精神健康護理學碩士學位⁴⁹。進修時期，落羽松每星期上課 1 至 2 天，其餘時間則在精神科進行有薪的實習；而他的老婆油桐就是在學校圖書館認識。

油桐戶籍在杭州，2009 年到香港升學。杭州被評為二線發達城市，地區生產總值達 10,050 億人民幣，人均 GDP 接近 14 萬，當地主要產業是第三產業，佔了 GDP 的 58.2%，而高新科技產業佔全市經濟的五分之一。油桐是家中獨生女，在杭州出生和長大，大學時到重慶讀書，畢業後原本打算到美國升學讀碩士，考了一些指定的考試作為申請之用。大學修讀語言系的她 TOFEL 成績幾乎滿分，不過，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成績一般，考慮到收她的美國學校不是心儀的學校，加上香港也有大學要收她，而且畢竟香港升學的費用比美國便宜，油桐就在 2009 年到香港升學。同年，和油桐一樣持學生簽證到香港升學的內地居民有 8,650 位⁵⁰。然而香港並不是油桐升學的梦想之地，生活上有很多不習慣，其中居住空間是最大的壓抑來源，不過油桐覺得既然已經人在異地，就盡量去習慣。油桐大部分時間留在學校，尤其最後半年寫畢業論文更甚。一天，油桐如常

⁴⁹註冊護士分為普通科和精神科，而精神科的註冊護士數量少之又少，以 2015 年為例，精神科的註冊護士只有 2,499 位，而當時普通科的註冊護士則有 35,160 位。為了提升精神科註冊護士的數量，凡是擁有普通科註冊護士資格或該科畢業人士可以因應其資格狀況，豁免精神科護士課程的部分學分；而醫管局和理工大學更合辦「轉讀課程」，讓普通科護士修畢十八個月課程後，可註冊為精神科護士。

⁵⁰隨著香港政府多次修改政策放寬非本地學生入境安排，持學生簽證來港升學的內地居民人數持續上升，2014 年的數量更達到高峰有 19,606 名，而 2015 年回落到 18,528 名。資料來源：香港入境事務處年報

到學校圖書館做作業，落羽松坐在旁邊並主動用普通話跟油桐聊天。落羽松第一眼就覺得油桐長得好看，而且無論氣質和穿著跟香港女生很不一樣，加上理工大學的內地生不少，落羽松便主動用普通話跟油桐聊天。油桐覺得落羽松說的普通話雖然沒有很標準，可是算是不錯，以為落羽松是來自廣東省或者福建省，第一次的碰面根本不知道落羽松是香港人。在油桐畢業前的半年，兩人偶爾出去喝喝咖啡、看看電影，更多時候待在圖書館寫論文，當時也沒有想過兩人關係會發展到婚姻生子。

2011年油桐畢業後，在香港找工作也面試了幾次，她很猶豫在香港--一個以金融為重的城市，是否可以找到和自己專業相關的工作，於是她回到了老家杭州，並在一家銀行的國際業務部當翻譯，當有外賓來訪，或者要出國拜訪，油桐就到場翻譯，又或者翻譯文件，其餘時間就做銀行業務。自始油桐和落羽松開始了遙距離的戀愛，除了用 Whatsapp、Wechat 每天聯繫，落羽松會搭飛機到杭州，每次短聚兩、三天。隨著感情愈來愈深厚，落羽松往返香港杭州從兩、三個月一次增加到一個月一次。2016年4月兩人分別在香港和杭州辦婚禮，結束了這些喜慶活動，油桐和落羽松分別回到自己的崗位如常工作，繼續用手機軟體聯繫。三個月後油桐懷孕，打算到香港生產，和其他的內地新娘不一樣，油桐並不急著申請單程證，一方面是不想放棄國內的戶籍，二是覺得以工作簽證來港更為方便(第二節詳述)。隨著全球化，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明顯受到較少的阻礙，來自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女性比起改革開放前的內地女性來說，有更多移動的機會來追求人生目標，而在流移的過程得而認識了未來的伴侶。

第二節將嘗試作詳細分析，香港回歸後，在努力挽救香港經濟的時候如何透過放寬移入限制招徠內地人才在港落地生根，在這一波以人才提升香港競爭力的經濟計劃同時，令中港夫妻趨向高學歷和中產化。

肆、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城鄉差距

城鎮化既是指標反映人口居住狀況和國家發展程度，也是中國一項重要政策規範了城市和農村的發展方向。從七五規劃至十三五規劃⁵¹都有提及城鎮化，《國

⁵¹中國的「五年計劃」是政府制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規劃，體現政府的發展戰略和宏觀思路，對重大建設項目、生產力分佈、資源配置和經濟結構的比例關係等制定規劃，明確發展目標。中共從 1953 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其間出現 1963 年至 1965 年中斷五年計劃的經濟調整期；七五規劃期是 1986 至 1990 年，城鎮化的策略在於「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

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更指城鎮化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巨大轉型，它將使中國由「農耕社會、鄉土中國」向「工業社會、城市中國」轉變。由中國國務院發佈的《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當中提及「城鎮化率」每提高一個百分點，會帶來1300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國家人口計生委科學技術研究所所長馬旭⁵²估計會這些新增人口會創造新增消費1700 億左右。李強等(2012)認為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都市的話，由於都市人口急增而產生就業等各種問題，因此必須防止大都市人口的過度集中。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後，城鎮化的策略在於擴展中小城市，而嚴格控管大城市擴張，近來更是邁向城市群發展。不過，中央政策落實到地方政府的執行出現巨大差異。

過往的城鎮化是一種土地的城鎮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鎮化，農民雖然離鄉進入城市就業與生活，但他們在勞動報酬、子女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等，並不能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會，戶籍制度是城鎮化其中一個阻礙。兩億多進城的農民工實現了職業轉換、地域轉移，但沒有實現身份的轉變，遂稱之為「半城鎮化」。新型城鎮化的提出，目的於針對處理「半城鎮化」，通過「農民市民化」，引導農民工在不同區域和不同規模的城市實現其身份的徹底轉換，成為真正的市民。不過，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目前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3.7%⁵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只有36%左右。

資源流入城市 農民工的生活

經濟開放加上城鎮化，大量的農村人口流入沿海大城市，資源也集中到這些城市。廣東省一些農村長期被忽略發展滯後，當地人民的生活水準和城市相差甚遠。受訪者木荷1968年出生於江門的一條小村，多年來村落的現代化進展緩慢，到2010年才全面落實五通：通水、通電、通路、通電視、通電話。當地住房材料仍以土木為主，全村共擁有汽車4輛和摩托車11輛。此村的產業以農業耕種為主，

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十三五則是 2016 至 2020 年，城鎮化的策略在於「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以城市綜合承載能力為支撐、以體制機制創新為保障」等。資料來源 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0/10/101004_timeline_fiveyearplan.shtml，以及新華網 2016 全國兩會專題：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lh/2016-03/05/c_1118243318.htm

⁵²於 2013 年 3 月 6 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發言，可參考「馬旭：希望“農民工”一詞成為歷史」(中國人大網，2013 年 3 月 27 日)：

http://www.npc.gov.cn/npc/zgrdzz/2013-03/27/content_1790368.htm

⁵³1949 年前後，中國大陸的城鎮化率只有 10.64%，到 1978 年上升為 17.92%，2011 年首次超過 50%。

全村1200戶有9成住戶因為農業耕種收入太少要外出打工。木荷從小就到農地幫忙種田，家裡分得4畝多的田，有些是別人去打工不種了，就給他們一起種。「6點起床，如果割禾就要5點起床，吃了早餐就去拔草割禾了。反正，種田就是辛苦，有時做到晚上7、8點」。鄉下沒有燈，月亮陪伴著木荷在農地工作。有時吃不完的蔬菜，木荷會跟著媽媽拿去菜市場賣，換回兩、三元的現金。

直到1982年，15歲的木荷跟著村裡的其他女生，到附近的製衣廠工作，「之前沒有新衣服穿，如果有機會就一定要找車衣服的地方去做，所以，有人說『XX廠找人車衣服，你去不去？』我馬上跟人家去了，做到現在，我都沒有轉過其他行業」。木荷從剪線頭開始做，有空就請教師傅，比其他人更勤勞地練習，很快就開始坐到生產線上；每當家裡農作物收割時期，木荷會請假回去幫忙。

工廠生產羽絨衣，出口到日本和澳洲。木荷剛到工廠的時候仍然是國有企業，月薪只有二十塊，不過，吃飯便宜，偶然會派發日用品，也會有甜湯，還會有醫療津貼；之後，工廠轉為民營，薪水以件數來算，其他的津貼和福利(包括醫療和托兒所等)都取消了。整個廠房有7、8層樓，每層有不同的生產線，約2000個工人。廠方為了節省成本，以前有組長、主任巡視生產線，後來都用監視器取締了。雖然，民營時期薪水有所提升，不過，直到2009年離職前，木荷的薪水只有4、5百塊左右，不到最低工資金額。像木荷一樣的農民工，讓江門得以有南國紡織城之稱，在改革開放時期，是全國最大的紡織服裝生產基地之一，現在仍然有部份工廠在繼續生產。2015年，江門仍以第二產業為主要產業，當中工業⁵⁴占全市GDP 45.7%，第一產業只占7.8%(廣東統計年鑒，2016)。

木荷在製衣廠工作了二十幾年，生活沒有太大的改變。其他兄弟姊妹都結婚了，她一直沒想過婚事繼續往返於工廠和土地工作。直到2008年父母都過世了，木荷大受打擊心情難受覺得剩下自己一個孤伶伶。同年，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隔壁村在70年代偷渡到香港的老公。2009年，她們有了結婚的打算後，木荷就離職搬去江門市準備結婚。

木荷的經驗反映了廣東早一代的農民工離開農地，去到出口導向的工廠打工的狀況，她的青春年華正正就是在車衣間和土地徘徊盪漾。在改革開放時期出生的年青一代，又是經歷了怎樣的一個中國經濟？上述講到外資在2000年之後才

⁵⁴主要以五金不鏽鋼、食品、造紙、集裝箱、化纖紡織、鋼材、電器、摩托車八大支柱為產業。

從東部慢慢轉移到中西部，以下來看看內陸年輕人的經歷。

流盪於城鄉間的年輕工人

河南一直是中國的農業大省，為其他省份提供糧食，產量僅次於黑龍江。河南省多年來以農村人口為主，在城鎮化的帶動下，農村和城市人口差距收窄。2014年，農村人口有 5171 萬，城市人口有 4265 萬。不過，在經濟方面，城市和農村的差距非常大，以消費水平為例，同年農村居民人均只有 7,439 元人民幣，而城市居民已達到 20,111 元人民幣。縱然河南的 GDP 年年在提升⁵⁵，不過，城市居民和農民的貧富差距也是與日俱增。改革開放後，第二產業一直是河南的主要產業，一是河南有豐富的礦物，衍生了很多開採、加工作業，二是河南是大型拖拉機和重型載重汽車的主要生產基地。

馬尾松 1984 年出生於河南的一個農村，小時候爸爸跑到鄭州做包工頭，從小的暑假馬尾松就去工地玩，看到建築工地上的農民工從早上天沒亮就上工，沒有週末沒有休息地工作，收入卻不高，他見證著農民工的辛苦勞動和感受著城鄉發展的差異。農民工的出現和中國推動自由市場、融合到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參與國際分工有關。中國在 1996 年開始對外開放農產品市場，2001 年加入 WTO 之後，農產品市場亦更加開放，成為農產品關稅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造成本國農產品濟銷，卻又繼續進口外國農產品的狀況。國家用農業換取進入國際自由貿易的入場券，為了保持市場的競爭力，國家放寬戶籍的限制，讓農民進城打工，卻又繼續維持城市和農村兩種體制(黃德北，2006)。低微的收入無法應付城市的生活成本，農民工的生產和再生產只能分離，只能在城市打工，在農村生活和繁衍。潘毅、盧暉臨、張慧鵬(2011)把農民工這樣的狀態，稱為「半無產階級」，並指出這樣的狀態有利於資本最大化積累。

2006 年，因為沒想到要做什麼工作，22 歲的馬尾松畢業後當了半年的搬砂工人。石英砂廠是爸爸後來回到小縣城開的，馬尾松的職責就是搬石英砂，每袋有一百斤，五袋放在一個車子：

那個車子上有五百斤，剛開始我那個車子動也不敢動，根本就推不動。後來幾個月，推了那小車就跑了，那回鍛鍊了體魄，我覺得男人就是很有力

⁵⁵ 2016 年最高人均 GDP 的城市鄭州，其人均 GDP 約 7 萬多，其他城市的人均 GDP 約在 2 至 4 萬左右。

量，這個對人的信心來說是也很大幫助，所以男人這麼有力量我覺得對你的信心、克服困難的勇氣都有增加。

馬尾松幹了半年體力勞動覺得很開心，勞動鍛鍊了馬尾松的身體，也磨練了克服困難的信心和勇氣。正如上述提及，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差距大，工作機會當然也不例外，在馬尾松住的小縣城，長年人才外流，當地政府為了留住本地人才，提出在外讀書的大學生回到縣城不用考試直接安排在當地政府機關單位工作的安排，馬尾松的家人非常希望馬尾松可以留在家鄉成為公務員。

我就不想，因為一輩子在那待著就是一輩子的事，既然當成公務員了，你還想辭職，家裡肯定不同意。至少我不知道自己想幹什麼，但是我知道自己不想幹什麼，所以就死不同意，反正那半年家裡關係弄得特別不好。

2007年，過完了年，馬尾松為了不想成為公務員，轉碾跑去了西藏找工作；之後再去了北京，在一家國際五星酒店做餐飲工作；之後，又跟朋友自資合辦了攝影公司。馬尾松試過幾次在網絡上找志同道合的網友，一起騎自行車遊歷中國。馬尾松在一次旅途上，和老婆茉莉在貴州苗族村寨的一家青年旅館認識，之後，透過書信、網絡聯繫，半年後茉莉瞞著家人到了馬尾松的河南老家辦喜酒，後來才在香港辦註冊，茉莉的家人和朋友一直很反對他們結婚。婚後為了方便和茉莉見面，馬尾松又轉到了深圳生活和工作，後來和老婆一起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騎摩托車遊歷中國、印度、尼泊爾等地。然後持探親簽證，時而到香港居住照顧茉莉，家務事由馬尾松一手包辦，馬尾松還會提早起床為茉莉做早餐。2014年，馬尾松開始用淘寶的平台成為電商，他和青海藏人合作，幫忙推銷青藏農產品，為藏人和自己在網絡市場開發賺取生計的可能。以互聯網為創業平台的模式近年備受年輕人歡迎，2013年總理李克強早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隨即全國起了一股創業創新的風潮。

如果說第一代的農民工是為了解決生計的需要到城市找工作，像馬尾松這一代改革開放時期出生的年輕人，開放市場和城鎮化讓一些家庭的生活和經濟有所提升，年輕人在城鄉間的流移徘徊更像在理想和生活之間的旋轉起舞。

第二節以全球城市作為亞際競爭出路

1970 至 1990 年代，亞洲四小龍吸納歐美資金，發展起勞動密集型生產的出口加工業，當地經濟高速發展起來。後來，新自由主義的強勢捲動、勞動成本上漲、世界工廠的興起等種種因素交錯，這些地方利用積累的資本重整經濟結構，轉向全球城市模式發展，無不以強化城市競爭力為治理目標。2016 年，一份名為「重新定義全球城市」(Redefining Global Cities)研究報告⁵⁶把香港、新加坡、上海、北京、首爾、莫斯科六大城市評為亞洲重鎮(Asian Anchors)，強調經濟輸出雖然不及「全球巨型都會」(Global Giants)⁵⁷，但肯定了以上亞洲城市在全球化中扮演著實力城市角色，可見面對全球化，香港積極保持全球城市的優勢。

回歸後，香港經歷了多次危機：如 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2003 年非典事件與 23 條立法爭議、2008 年起全球金融危機，面對外在種種挑戰，依賴金融、服務業的香港經濟受到即時的牽連，特區政府急切重建國際都市形象，以鞏固國際間的競爭力。從第一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已不難察覺官方正積極製造「世界級都會」(world-class city)、「亞洲國際都會」(Asia's world city)等的論述。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在 1999 年度施政報告中的發言，便清晰可見⁵⁸特區政府把香港定位於「中國重點城市」及「亞洲國際都會」的雙重角色。2000 年開始，特區政府在香港、內地和國際間推動「香港品牌計畫」⁵⁹，企圖把香港定位於亞洲最國際化的全球城市之餘，想像香港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向全球起飛的「龍首」(藍逸之，2013)。及後，特區政府透過各項經濟計劃積極靠攏中國市場。藍認為這時期的特區政府明確地表現出國家主導的全球城市競爭意圖，以圖對應後亞洲金融危機時代更激烈的亞太城際競爭變局，並謀拉攏中國大陸市場來鞏固全球城市

⁵⁶上網日期：2016 年 11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16/09/metro_20160928_gcitypes.pdf

⁵⁷包括美國紐約、洛杉磯、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日本東京以及大阪-神戶地區。

⁵⁸董建華(1999:12)主張：「香港將來不但是中國主要城市，更可成為亞洲首要國際都會，享有類似美洲的紐約和歐洲的倫敦那樣的重要地位……和這兩大城市相比，香港已相當程度上具備了很多類似的基礎條件，例如，我們是國際金融中心，也是旅遊勝地。在貿易和運輸方面，我們在國際處於領先的地位……香港作為世界級都會，將和紐約、倫敦一樣，在全球一體化的經濟中，發揮重要的樞紐功能，成為跨國集團總部的集結地，為廣大地區服務。」

⁵⁹香港品牌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用以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英文：Asia's World City)的品牌，計劃由香港政府新聞處負責統籌及管理，2001 年，全球財富論壇在香港舉行，香港品牌藉此時機向世界公布，藉著宣傳香港品牌的形象標誌飛龍形象和「亞洲國際都會」品牌主題句子。新品牌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個飛龍標誌。政府宣傳稱此飛龍標誌象徵香港是東西文化薈萃之地，這條飛龍已經用來廣泛地在各類國際場合宣傳香港。(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五周年大事紀要 http://www.info.gov.hk/info/sar5/content_c.htm，2016 年 11 月 15 日下載)

地位。

策略發展委員會⁶⁰用了兩年時間訪問了 180 位官、政、商界代表和學者的意見，為香港未來三十年發展制定了一份名為：《香港長遠發展大綱》⁶¹(下稱：發展大綱)(2000)，強調把香港訂位於「中國重點城市」及「亞洲國際都會」的雙重角色，通過落實四大策略：強化與內地聯繫、維持香港競爭力、提升生活質素，及確立本身的特色及形象來發展七大行業以達至雙角色定位。在此特別引用 2000 年這份發展大綱是由於期後不同屆別的特區政府施政，在經濟發展方面採取的論調與發展大綱非常相似，也就是說，這份發展大綱對於 2000 年至今的香港經濟甚有影響，不但隨即實行「香港品牌計畫」、陸續放寬移民條件吸引海外專才、落實經濟融合計劃，借助中國市場在競爭激烈的世界市場中鞏固「世界級都會」的位置。

壹、競逐人才提升競爭力：專才移民計劃的放寬

發展大綱再三強調，要提升香港競爭力在於保持自由及開放的經濟體系，以及維持高質素人力資源，發展大綱建議：一)培育本地人民；二)引入海外和國內技術人員和專才。此後，人口政策的四份報告書(2003、2007、2012、2015)都因應如何維持高質素人力資源作出建議並有相關部門執行措施。維持香港競爭力，守住國際金融中心位置在於吸納內地專才的說法在香港人口政策(2003，頁 vii、39、55)和施政佈告多次提及(2007，頁 27-28)。由此可見，人口政策把海外和內地人才看成是全球競爭力的致勝之道，(海外和內地)人才愈多，香港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愈強。為了向公眾說明吸引海外人才的重要性，第一份人口政策(2003)中，便引用了數據以顯示聘請一位海外人才可以創造本地 2.7 個新職位，以及平均每人為聘請機構帶來 30 萬港元收入(頁 55)，以證明吸納海外人才可為香港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及後，特區政府陸續推出吸納技術人才和資本的移民計劃。不過，直接吸納人才的計劃成效不彰，例如「優秀人才入境計劃」⁶²的每年名額

⁶⁰一九九八年成立，旨在從宏觀、前瞻的角度探討香港長遠發展路向的諮詢機構。策發會由行政長官出任主席，其成員計有三位當然委員(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及三十二位非官方委員。行政長官可以邀請不同背景人士加入策發會，和政府一起探討香港長遠和整體發展的重大課題。(資料來源：中央政策組網頁)

⁶¹上網日期 2016 年 10 月 10 日，取自於 <http://www.cpu.gov.hk/tc/home/index.html>

⁶²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優才計劃)，旨在吸引全球(包括內地)的高技術人才或優才來港定居，藉以提升香港在經濟方面的競爭力。申請人無須在來港前獲得本地僱主聘用，並可攜同配偶及 18 歲

有 1,000 個，從 2006 年實施以來，人數一直不到限額的一半。「輸入內地人才計劃」⁶³於 2003 年七月推出，這是一項不設配額限制並以就業為本的計劃。每年經此計劃來港的內地人才一直有所增加，從 2003 年的 1,350 個增加到 2014 年 9,313 個，人才長久以來集中在「學術研究和教育」和「藝術／文化」這兩個行業。直接吸納海外和內地人才的計劃收效並未如官方期待的樂觀，相反，非本地學生和非本地生留港就業的數量在實行相關措施下明顯地增加。

貳、更有經濟潛力的人才：非本地學生

政府逐步放寬非本地學生來港就讀的入境政策，1999 年先是開放就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2005 年開放至全日制專上課程(即全日制副學士、學士以及兼讀修課式研究生課程)，2008 年放寬至短期課程以及推出「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⁶⁴；並將受資助課程的內地生比例由 10% 提升至 20%，根據教資處的資料，從 2006 年開始，每年約有超過 1,000 名新增非本地學生入讀大專資助課程，直至 2014 年該學年的非本地學生已有 15,151 名，同時，本地的資助學額未有任何增幅。在推行以上措施之前，入讀大專資助課程的非本地學生人數徘徊在 1,239 名(1996 年)至 3,204 名(2004 年)左右。在教育產業化⁶⁵的目標下，坊間開辦了大量專上自資課程，愈來愈多本地和非本地學生就讀於學費較昂貴的自資課程。

特區政府對海外人才的重視，不但在於可以提升香港競爭力，海外人才對於香港的經濟也有即時的貢獻。行政長官曾蔭權在〈2007 年至 2008 年施政報告〉表示教育是優化人口質素的關鍵，一方面，從 2008 年度開始推行十二年免費教育以優化本地人口教育水準；另一方面，推出連串措施旨在打造香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⁶⁶，吸引非本地生就讀高等院校，並挽留在港就業。同年，更推出「非本

以下未婚及受養的子女來港。截至 2011 為止獲分配的 2 094 個名額當中，接近八成的成功申請人來自內地，超過七成年齡介乎 25 至 39 歲；超過八成為大學畢業生，大多擁有碩士學位或兩個學士學位。(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⁶³ 此計劃旨在吸引具有認可資歷的內地人才和專才來港工作，申請人必須具備香港缺乏或無法即時提供的所需技能、知識或經驗。申請人須已確實獲得聘用，而從事的工作須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任。此外，薪酬福利亦須與當時本港專才的市場薪酬福利大致相同。(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⁶⁴ 應屆非本地畢業生如有意申請留港工作，無須在提出申請時已覓得工作。他們只須符合一般的入境規定，便可留港 12 個月，而不受其他逗留條件限制。(資料來源：入境事務處)

⁶⁵ 由第二屆行政長官曾蔭權於 2007 年提出。

⁶⁶ 行政長官曾蔭權(2007)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年施政報告》中作出如下建議：(1) 設 10 億港元獎學金予本地及非本地生；(2) 增建留學生宿舍；(3) 倍增非本地生比例，在 2008-2009 年度，由現時的 10% 提升至 20%；(4) 容許非本地生修讀本地院校的短期課程；(5) 非本生

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下稱：留港就業)，方便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找工作。2009年發出的留港就業簽證數量有3,367個，到了2014年度發出超過10,000個(表4-3)。來港學生中，主要以內地學生為主⁶⁷，近年的比例已超過了所有非本地學生的65%。吸引非本地生留港就讀就業成為了香港補充海外人才的重要管道，同時，也支撐了教育產業化的經濟策略。近年不少課程主動到內地各大城市宣傳及招生，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內地人才(財)對於香港經濟得益有直接(生產)和間接的幫助(間接)。

表4-3：2009年至2014年度香港每年核發的學生簽證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簽證數量

已發出的簽證／入境許可證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學生簽證	內地居民	8 650	10 129	12 913	16 401	19 067	19 606
	非內地居民	5 823	6 532	7 401	7 872	8 860	9 619
根據「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		3 367	3 976	5 258	6 756	8 704	10 375

(資料來源：香港入境處)

升學到哪裡：內地女性的考慮

國際學生的流動呈現出高度集中於東亞(主要是中國內地、香港、韓國)前往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英國、德國與法國)的路徑，東亞學生到這些地方留學，除了是高教品質比母國優勝，還有的是為了提升(在經濟全球化被視為重要資本的)英語能力(Brooks & Water, 2013；轉引自張育嘉, 2015)。縱然香港政府標榜香港有3所大學躋身世界50最佳大學，不過比起歐美的大學，號召力略遜一籌。內地學生來港的原因是各種理性考量下的選擇：

其實它不是我一心想來的地方，我本來是準備去美國的，當時是考得上美國那邊的入學考試，因為我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的分數不是很好，不能申請到美國特別好的學校，剛好香港理工大學給我 offer，所以我就想想看，我也不想跑那麼遠，畢竟開支也會大很多，所以當時就想算了就過來了，到香港就捨遠求近吧。(油桐)

可於校內兼職、參與實習和在校外從事暑期工作；及(6)非本地生可在畢業後留在香港一年找工作。

⁶⁷ 2009年：海外學生有5,823名，內地學生有8,650名；2014年：海外學生有9,619名，內地學生有19,606名

其中一個原因便是香港升學的費用比歐美的便宜，大學的國際排名對於內地學生來說，吸引力仍然不足：

我去英國讀碩士是因為我們 department 在全英國排名第五，當時覺得在排名好的學校畢業一定會找到工作。我在英國讀書認識了一個香港男生，跟他拍拖一年多，後來去香港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想分開兩地，分開兩地會結束關係，所以我做了一個很重要的決定就是去香港讀書，無論如何也要去香港讀書。（傘樹）

還有，香港作為亞洲的國際城市，尤其在全球金融風暴之前，無論是國際位置、居住條件、移入的門檻，對部分海外學生來說是有吸引力的：

我覺得香港是一個比較 international city，multi-culture 也不錯，而且，我以前在英國讀書，會想找一個 modern city 去試試，看看有多快，看看有多 challenging。當時是 2005 年，已經 10 多年前，我在考慮亞洲三個地方：新加坡、日本、香港。新加坡經濟沒有香港厲害，加上爸爸覺得新加坡太熱了，叫我不要去。我申請日本的時候，要求日語要有二級，我不想讀日文就算了，所以就來了香港。其實我 purpose 也是香港。（山茶）

一心要到港進修的還有桂花：

我的大學有社工系，final year 我就旁聽了一年，我看到很多 reference 都是來自香港，所以當時想與其用二手資料，不如去一手的去學習，所以我就跑去了申請。結果錄取了我，還有 scholarship，因為我當時成績不好，GPA 不高，分數比我高的人有很多。因為到香港讀書的成本很高，如果學費 free 了，我只要處理生活費就減輕家裡很多負擔。（桂花）

社工這一類的專業，強調實踐性更高於英文能力，加上香港社工的發展比內地悠久，的確有比較強的號召力。而 2007 年之後設立的十億獎學金，作為吸引外地

生來港的確發揮了作用，減少外地生來港升學的阻力。傘樹和山茶是 2005 年來港入讀碩士課程，桂花和油桐則是 2009 年來港入讀碩士課程，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和科技大學辦的研究院研究課程一直都是全港內地生收生人數最多的課程，當年和桂花一起在中文大學就讀研究課程的內地生便有 997 名，來自其他地區的學生人數加起來不到 40 人。在港就學，開啟了內地學生人生的新一頁，油桐和桂花表示當時同課程的香港學生不多，而且內地學生和香港學生日常沒有交織。然而，她們都在當時的碩士生涯中認識了現在的伴侶。2009 年至 2011 年，就在桂花和油桐在港就學時期，自由行政策更開放至「一簽多行」，深圳居民可以一星期多次往返深圳和香港；雙非⁶⁸孕婦人數持續增加；香港網絡開始使用「蝗蟲」⁶⁹貶抑來自中國大陸的遊客、新移民及非法偷運水貨者；2011 年開始陸續出現反蝗的行動，像是由香港懷孕女性發起的「反對內地懷孕來港產子」示威⁷⁰，一群年輕網民自發在香港街頭向內地遊客唱一首名為《蝗蟲天下》的歌⁷¹，2014 年有網民組織「反赤化·反殖民」示威行動⁷²。幾位高學歷女性雖然並未有親身經歷以上行動，不過都能感受到社會上反「蝗」氣氛沸沸揚揚，也成為了她們申請香港公民身份的一個考慮因素(將在第三節講述)。

參、官方對家庭團聚移民的曖昧立場

專才移民外，持單程證來港團聚的內地新移民更是香港主要的人口增長來源，官方對於新移民的態度和民間意見截然不同。在政治和民生的影響下，內地新移民被妖魔化成「中共同化香港的工具」、「蠶食香港福利的蝗蟲」，近年更有不少團體和個人要求香港政府收回單程證審批權，篩選「合適的」內地移民，甚至取消單程證制度。香港官方在人口政策及其他報告多次重申家庭團聚的權利，另外再三表明持單程證來港新移民補充了人口，減緩了香港的人口老化，是「寶貴

⁶⁸ 父母均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資料來自：立法會文件，2013 年 5 月 28 日，2015 年 10 月 18 日下載。<http://www.legco.gov.hk/yr12-13/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0528cb4-679-3-c.pdf>

⁶⁹ 指控新移民、內地遊客侵占香港資源

⁷⁰ 〈港媽憤怒鳥：內地媽係蝗蟲！〉(蘋果動新聞，2011 年 8 月 28 日)，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hAi9pzh6Eo>

⁷¹ 〈究竟誰在香港唱「蝗蟲歌」？〉(鳳凰網，2012 年 2 月 8 日)，資料來源：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02/08/12378027_0.shtml

⁷² 〈廣東道百人遊行斥內地客搶港資源網民建制組織開火「驅蝗」爆罵戰〉(蘋果動新聞，2014 年 2 月 17 日)，資料來源：<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0217/18628136>

的人力」(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2015, 頁22)。不過, 多年來, 官方對內地移民的立場並不一致, 對於家庭團聚的權利肯定也是前後矛盾。在多宗居港權案件的立場上, 例如對於港人內地所生子女來港定居的申請界線, 香港政府一直嚴密把守甚至主動要求人大委員會對基本法作出解釋⁷³, 推翻終審法院對港人內地子女申請來港資格的裁定⁷⁴, 官方呈交給立法會的一份文件⁷⁵表示, 「167萬新移民為香港所帶來鉅大衝擊, 由於他們多屬低學歷和低收入, 所以極有可能會加重政府負擔、拖慢香港發展以知識型經濟為本的轉型和令香港的生活質素倒退」。可見, 「家庭團聚的權利」只是官方的說詞, 香港政府對新移民的態度建基於香港經濟發展的考慮; 基於政治現實, 香港特區政府更從來沒有向中央爭奪單程證審批權的意圖。

人口政策指稱「新移民的背景尤其是他們的年齡及教育水準, 會對本港的勞動人口產生深遠影響」(2012, 頁33), 香港官方雖然沒有明言是怎樣的影響, 可是, 卻在人口政策一再重複新移民普遍取得中學學歷, 難以投入本地勞動市場, 為了協助新移民融入香港社會, 官方會提供就業培訓課程, 提升其工作技能。官方婉轉地陳述了單程證新移民學歷普通, 暗示並不是「世界級都會」慾求的高技術人才, 不過卻沒有拒絕單程證移民來港, 正如Sassen(1988)所言, 全球城市的發展既需要專業人才, 也需要大量廉價的服務業部門來支撐各項庶務工作, 新移民便是全球城市中補充廉價人力的直接來源, 官方透過專門培訓低學歷人士的技能課程, 把新移民培訓成好用的廉價勞動力。人才計劃和單程證猶如一個輸入內地移民雙管道系統, 分別把移民輸送去兩極化的生產部門: 1)產生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和2)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低階的勞工從事庶務和服務工作處理、照顧、看護專業人才的再生產需要, 而專業人才應付支撐香港主要經濟部門, 例如「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及保險」⁷⁶。

⁷³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 在出生時父或母都未成為香港居民的人士沒有居港權, 香港政府認為此解釋使有權來香港的人數減至 20 萬, 此數字比起未釋法前的估計第一代港人在中國所生子女(69.2 萬)遠遠為少。

⁷⁴法院裁定的其中一個重點: 各申訴人在出生時其父母是否已得到香港永久居民資格, 與及各申訴人是否已經成年, 與其永久居民資格無關

⁷⁵〈終審法院對居留權事宜的裁決: 服務評估〉資料來源: 政府新聞處, 一九九九年五月六日

⁷⁶2012年, 「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生產總值佔了 GDP 23.5%, 「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佔 16.8%, 「金融及保險」佔 15.9%, 合共超過全香港 GDP 的一半。

第三節差別待遇的移民制度：內地專才 V.S.家庭團聚

壹、單程證申請流程

同樣來自於中國內地，持單程證來港定居的婚姻移民，以及持就學、工作簽證來港的高學歷人才不但在香港生活遭遇不一樣的經歷，就連在辦理簽證的形式都有不一樣的經驗。單程證是專門認可符合「家庭團聚」資格的內地居民到港定居的證件，根據《中國公民因私事往來香港地區或者澳門地區的暫行管理辦法》第7條的規定，申請人分為五類⁷⁷，中港婚姻一般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移居到港生活，2010年至2015年間，每年約有2萬宗中港婚姻，每年約有2名已婚內地女性持單程證到香港定居⁷⁸。持單程證到港定居的新移民家庭，家庭收入一直低於全港家庭月入中位數，縱然2015年上升到\$10,500港幣，不過仍然不到全港家庭每月收入中位數3萬元的一半(香港統計年刊, 2015)，這些家庭的經濟水平相當低(有關持單程證到港定居的新移民家庭收入詳情，可詳閱第一章第二節貳)。可以說，單程證是基層中港婚姻移民多年來的主要移民管道。

單程證申請採用計分制，各省份的評分標準並不一致，而每一類別的申請人需要的分數和計分方法也有所不同，例如，廣東省的夫妻團聚需要146.1分，分數以分居天數來計算⁷⁹，而分居天數必須從結婚日算起，在廣東申請來港夫妻團聚的等候時間從90年代的十年減少至近年四年時間左右。訪談對象中，有五位的戶籍地在廣東省，一位在四川省，他們等候的時間分別是四到五年；而有一位戶籍地在河南的男性馬尾松，等待時間已超過六年，至今仍未取得單程證。由於單程證獲批日期與結婚日相關，對於希望婚後盡快在香港穩定生活的夫妻來說，這無疑間接地加快了兩人結婚的決定：

我們拍拖快一年了，就想說如果真的去香港生活就早點結婚，加上始終是分開兩地，合適的就不要想太多了免得有什麼變化。(龍柏)

⁷⁷包括：夫妻團聚、來港照顧無依無靠父母、無依無靠老人/兒童來港投靠親屬以及其中特殊情況。

⁷⁸不過已婚內地女性人數近年持續減少，從2012年持單程證到港定居的已婚女性有29,376名，2013年有24,112名，2014年有21,275名，2015年19,764名。其中一個因素是2006-2011年間，整體婚姻數量減少，以致於婚姻移民申請人數整體下降；另外就是有部分已婚內地女性未有申請單程證或經由單程證的管道到港定居。

⁷⁹申請人夫妻分居天數 X 0.1 = 得分。

我覺得以後也是他，不會選別人，那就不要浪費時間拍拖了，快點去登記然後申請他來香港。不然浪費了時間，到時申請他來要多等幾年，將來是自己麻煩。所以我就說，我們先不要拍拖，我們登記(結婚)吧。(桔梗)

以上考慮只有單程證申請者及其配偶曾有提及，至於整個單程證申請時間冗長，準備的文件多樣、申請流程繁複，香港配偶至少要到內地一次陪同配偶領證。毛俊響、杜倩(2014)把單程證申請分為「個人申請」、「材料審批」、「打分排隊」、「公佈名單」和「簽發證件」五個環節⁸⁰。受訪人的經驗反映了各省市處理略有不同，不過等候時間不會少於四年。同時間，多數內地配偶會以三個月的探親簽證來港生活，續證則需要離開香港回到戶籍地加簽。比起繁複的程式，受訪人覺得長期時間的等候更為折人。

貳、就學簽證申請流程

相較起單程證的申請，就學簽證的申請簡單得多，高學歷內地女生受訪者回想起來，過程一點都不覺得困難，他們只需持有有效港澳通行證並附逗留簽注即可到港⁸¹。內地生到港後，將所需資料交給學校的學生辦事處即可代表學生到入境事務處辦理學生簽證(有效期與修讀課程時間相約)，及後延期只需要到在港的中國旅行社繳交費用即可代辦，免卻回戶籍地辦理。桂花畢業後，隨即透過「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就業安排」在香港找到工作，到現在已經在港工作四年多。

內地人才：放棄國內戶籍的考慮

由於香港官方想借用寬鬆的移民制度力爭國際人才，因此讓內地高學歷女性有了更便利定居香港的選擇，她們不用等候冗長的審批期，在港居留七年便可以申請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也就是公民權)，高學歷內地女性提及申請永久身的考慮：

當初可能不知道要放棄上海的戶籍，覺得申請永久身份好呵，因為找工作

⁸⁰ 簡單來說，內地配偶需要帶備齊全的文件，回到戶籍地的公安局申請單程證，需時三個月做資料審批。近年在取得單程證之前，需要進行夫妻個別面談來檢測是否假結婚；收到領取單程證通知信件後，必須去派出所辦理註銷戶籍手續，才能領取單程證，當天必須有香港配偶陪同並一起拍照作紀錄。如果3個月有效期內沒有持單程證前往香港定居，則需要重新申請。

⁸¹ 只要資料齊備，十五個工作天即可完成。

真的方便很多。現在有很多香港公司...我覺得我當時的遭遇是，除非你是非常優秀，它願意幫你辦 work visa，別人聽到要幫你辦 work visa 會覺得麻煩不想辦，因此而不會聘請你。有一個永久身份對我來說有這一個好處，就業的障礙會減少(傘樹)

永久身份的考慮不只是香港公民權帶來了什麼權利，失去了內地居民身份的風險，還有在香港的融入感也是種種糾纏的因素：

不是不想拿香港身份，只是不想失去大陸戶籍，因為不能同時擁有兩個，我是考慮應不應該放棄大陸的。因為家在大陸，將來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去大陸有限制或者你去大陸工作會有不同的 policy，但後來考慮將來要去其他國家旅遊，香港身份是很 free，後來因而申請永久身份。其實做了四、五年工作就想離開香港，fast pace 讓你很難消化，而且，人與人之間的冷漠，我很難接受。如果不是 local 的，會覺得很難，因為大城市的冷漠是很現實的，做了四、五年會開始考慮為什麼要 stay 在這裡？後來又換了一個工作，做著做著就 6 年了，不就是明年可以申請永久了嗎？算了，做好工作再算，所以不知不覺了 7 年了，沒有想過一定要拿永久身份，順其自然走下去。(山茶)

而內地女性桂花一方面認為永久身份和工作簽在找工作上的功能性沒有什麼差別，再來就是，她認為永久身份和個人的身份認同有所衝突：「3 年才做一次續證，我覺得可以 afford 這個 cost。我可能還有一個情義結，我的 identity 真的很清晰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想在戶籍上變成香港人。我不在這長大，我的確是柳州人」。而即使已擁有永久身份的傘樹，在於身份認同上也未能輕易的把自己歸類為香港人：

就算現在很認同香港的某些價值，在香港拿了永久(身份)，有了一個家庭，也不會完完全全覺得自己是一個香港人。我來香港十一年，偶爾會遇到被罵『蝗蟲』，或者買東西因為口音被人罵『阿燦』，其實會不開心。我在想，我當時在這邊讀書，相對於比我更弱勢的新來港婦女的群體，她們肯定比

我受到更多的歧視，一想到就會沒有辦法完全認同這個城市。因為這個城市尤其這幾年感受到中港矛盾，尤其對大陸人的排斥和歧視愈來愈嚴重。因為這件事，沒有辦法完完全全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傘樹提到的中港矛盾或者對大陸人的排斥和歧視，在其他移民女性身上也有感受到或者親身經歷過。木荷買菜被罵「大陸女人」，桂花在社工技能提升的課程，有同工嘲諷大陸人很懂拿資源；朋友言談之間會有對大陸人的負面語言等等。不過，受訪的四位高學歷內地女性都未有感受到朋友和夫家對她們的不友善，傘樹還開玩笑說：「來太久了，他們都忘了我是大陸來的」。

雖然在同一個地方生活是眾多中港婚姻的目標之一，不過，不同的移入制度對不同階層的中港男女產生不同影響。高學歷內地女性可以通過就學、就業簽證定居於香港，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考慮香港居留身份的申請以及更多的移入管道選擇：

我還在跟我老公探討中，他也沒有 push 得很厲害要我申請單程證，所以我覺得沒有很急，可以再考慮。再說，我不覺得我有了香港身份有什麼用處耶，因為如果我在香港工作，它發工作簽我就可以來香港，至於能不能找到工作，問題不大。所以我現在也沒有想好(單程證)排隊的事情，因為一旦單程證申請成功，非得要放棄國內的國籍嘛，說實話以後香港怎樣也不知道，對不對？我不太願意放棄國內身份、國內的戶籍，所以如果不是一个必須的話，我真的不著急。好像目前來看也不是那麼有所謂，一定要申請香港身份，反正小孩是香港身份就 OK 了。（油桐）

油桐的疑慮反映了部份中港婚姻者對於中國和香港的未來發展的關注，這正好說明了香港在 90 年代國際分工的優勢已逐漸失色，而有更多的人民對於居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持續擴展的期待。在前景未明的當下，保持國內戶籍等於保持了未來生活的彈性。香港政府開放管道給內地人才來港，目的就是吸引這些人才留港發展。可是，便利的簽證手續加上香港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因素，反而讓內地人才必須留港的吸引力大打折扣。同是來自內地，人才和家庭團聚的兩個移入制度，非常明確地表達了極力保持全球競爭優勢的香港來說，高學歷人才是它

慾望的人力。

參、階級篩選制度對基層婚姻移民的影響

香港經歷了 90 年代的去工業化，試圖利用積累的資本重整經濟結構，依偎中國內地市場以發展服務、金融業競逐全球城市的位置，吸納海外人才是官方藉以提升香港人口質素和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策略。由於吸納海外和內地人才移民計劃效果未如理想，在教育產業化的經濟政策推動下實施多項配套措施(包括增加學額、提供獎學金、便利的簽證手續)，官方轉以積極吸納非本地學生來港就學留港就業，非本地生又以內地生為主，人數每年遞增。對於香港政府來說，內地生無疑對香港教育產業、國際競爭力都有直接正面的經濟影響力，是可慾(desired)的人口來源。相較之下，持單程證的內地新移民，雖然近年的教育程度已有提升，不過，對香港政府來說，仍然是不達標的人口，未能適應本地的知識型經濟市場，故而借助技能培訓課程，把新移民訓練成支援專業服務的庶務人員，補充好用的廉價勞動力。而這些「不達標」的人口，要經歷繁複、冗長的單程證申請才能到港定居。香港移民制度以經濟理性作為考量，對不同的階級身份給予差別待遇，階級篩選成為移民政策的發展主軸。

在長達數年的等候期間，基層內地女性一方面未取得香港居留身份不能工作，另一方面基於要往來香港內地照顧家庭，難以持續地在內地工作，在經濟方面只能依賴家庭的唯一有酬勞動者—丈夫：

我們不想結了婚還是分開那麼遠，如果我繼續工作，一個月只有幾天假期過來(香港)就不太好。他就說「結了婚不要做，過來吧，我養妳」，「『薪水』又不多，養不起你嗎?!」。他說到做到，反正我結婚這麼久都沒工作過。(黃瑾)

由於受訪的 5 位基層內地女性的丈夫在香港從事非技術、低技術工作，薪水有限，僅以一人的薪水應付家庭開支，生活抓襟見肘：

我沒有要求他什麼，別人說「阿荷，你叫他買戒指給你吧」，我說「不用了，我不重視這些，最重要他工作給我家用」，你說是不是。那時我出來

了(香港)，他也只是給我 3 千塊，3 千塊很少呵，那你還要求他買什麼，反正一起過生活就是了，他給得少就省着用。他有時候知道錢差不多用完，就會問我「還夠不夠用呵」。他猜到的，3 千塊在香港一個月怎麼夠用呵，就多給 3 百塊，他不會給很多，他都很省的。(木荷)

木荷和老公住在分間單位(俗稱：劏房)⁸²，老公是做「三行」⁸³的零散工，日薪三百多港幣，收入不穩定。木荷平常要想辦法用這三千塊應付衣、食、住、行所需。為了省錢，木荷在香港的日子從來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後來老公實在無法承擔分娩費用，木荷懷孕的時候只好一個人回到內地生活，準備生小孩。另一位基層內地女性龍柏和老公、小叔、婆婆、公公同住在公共房屋。老公含羞草是搬運工人，經常加班，工時長收入只有一萬多。含羞草每一個月給爸爸媽媽五千塊生活費，給龍柏一千塊。婆婆負責家裡的採購，龍柏只要負責家裡打掃衛生和照顧小孩。為了減少用錢，龍柏很少逛街，跟老公一起外出才會購買補充物資。龍柏覺得自己幸運，身體壯健很少生病，就算生病了只要吃成藥就可以好過來，不用太花錢。在港的生活除了無聊，還是可以撐過去。

冗長的證件審批過程，讓基層的內地女性無法工作，成為家庭的依賴者。可是，一旦夫妻關係有變化，這些女性就會立即面對經濟困難。含羞草在老婆龍柏拿到香港身份證沒多久就失蹤了：

我去報警說他失蹤，警員說他沒有出入境紀錄，那就還在香港呵。我繼續跟他家人一起住了一年，關係很差。當時我沒有工作在照顧小孩，小孩才剛上學要接送。生活費都是靠我的儲蓄，後來真的捱不住了，我姨媽帶我去申請綜援，然後認識了 XXX(新移民自助組織)。

⁸²根據香港屋宇署的資料，分間單位俗稱「劏房」，一般是指在建築物原先經批准的圖則上顯示的一個樓宇單位，被分間成兩個或以上的獨立房間。「劏」為粵語，意為剖開，劏房，即將住宅單位分割成數個更小的部分，劏房不一定有個人衛浴和廚房。從 2002 年開始，香港房屋供應短缺，未獲編配公共房屋的基層市民不少人只能租住面積細小的劏房。

資料來源：「東方民調：停建居屋樓貴催生劏房」(東方日報，2013 年 6 月 3 日)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30603/00176_099.html

⁸³現代通常以木工、泥水及油漆三個裝修工程中必然的工作部份合稱為三行。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9%E8%A1%8C>

龍柏是當年少數獲得特別酌情處理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⁸⁴(下稱綜援)申請個案，然而，大多數新來港女性都被拒絕於社會福利門外。政府於2004年起收緊申請資格，來港未滿七年申請者只會獲特別酌情考慮，直至終審法院於2013年12月裁定新來港人士居港一年即可申請綜援，申請資格才得以放寬。白千層於2014年中取得香港身份證，被家暴後卻由於不符居港一年的要求而無法得到綜援。單程證制度和照顧家庭的性別化分工，讓基層內地女性在取得香港居留身份之前，必須依賴於家庭。而從屬的位置限制於她們在家庭決策、家務分工、家人關係的種種困境(在第六、七章有詳細的分析)。

第四節基層和高學歷中港夫妻差異

除了移入管道，基層內地女性和高學歷女性有不少差異。認識伴侶的渠道方面，仍有不少基層內男女透過親屬朋友網絡認識對方。如同 Peter Stalker(2002)的分析，移民網絡是其中一個選擇遷移目的地的考慮因素；基於這些網絡，黃槿和龍柏因而與香港伴侶結識。黃槿的姨媽早年嫁去了香港，一直幫鄉下的女生介紹香港男生，希望有更多親戚到香港互相陪伴，黃槿和表妹在姨媽先後的介紹下，認識了現在的配偶。而龍柏的姑婆和姨媽們在 60、70 年代已經偷渡去香港，有一次帶香港朋友回老家玩的時候，龍柏幫忙帶她們去玩，然後認識了老公的父母，公公婆婆一個月之後帶著兒子到內地介紹給龍柏認識。人際網絡是兩地婚姻非常重要的平台，受訪的內地基層女性和香港女性蒲桃都是經過內地朋友的介紹，高學歷女性山茶則是通過舊同事的介紹認識配偶。

隨著全球化，資金和人才的流動明顯受到比較少的阻礙，來自小資產階級家庭的女性有更多移動的機會來追求人生目標，在流移的過程認識了未來的伴侶：油桐、桂花、傘樹、山茶四位內地高學歷女性在香港求學、工作，香港女性紅戒球在澳洲求學，香港女性茉莉和桔梗到國內旅行時認識了她們的伴侶。

國家經濟發展和全球化的影響下，不同階級的兩地男女有著不一樣的資源，例如：人際網絡、移動的限制、科技的使用等等，形成了中港男女認識的不同途

⁸⁴以入息補助方法，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的人士提供安全網，使他們的入息達到一定水平，以應付生活上的基本需要。申請人除了需通過入息及資產審查，也需要符合居港年期，2004年1月1日起，申請人居港年期從1年改為7年，2013年香港終審法院裁定申請人必須在香港居住滿7年的限制違反《香港基本法》，將居港年期從7年再次改為1年。

徑。基層和高學歷中港夫妻在職業、收入、居所、社經地位有著不一樣的狀況(表4-4)，高學歷中港夫妻背景的同質性比較高，他們的學歷都在碩士或以上，並且在香港擁有專業高薪的工作，例如：社工、護士、大專講師、市場營銷、會計等。三對在港居住的高學歷中港夫妻都有自置物業，對居住在寸金尺土的香港人民來說是不少人的夢想，這也反映了個人和家庭經濟能力的優勢(傘樹和桂花表示爸爸媽媽在頭期款方面幫忙了很多，才得以讓他們擁有自置物業)。高學歷中港夫妻掌握的資源相對比較多，以至於面對生活困難的時候，他們更有能力去處理。受訪的基層中港夫妻在年齡、學歷方面都很接近，基層內地女性中只有木荷曾務農，木荷和鳳凰木曾在工廠工作，其餘的都是從事服務業，當中只有白千層的護士工作屬於專業性質，而他們的香港伴侶從事長工時、體力勞動、零散工作，只有銀柴曾任跨境的管理和監督的工作。基層中港夫妻曾與家人同住公共房屋和居住劏房的經驗，之後因婚姻關係有變，龍柏和白千層帶著小孩搬去劏房，鳳凰木和銀柴從深圳搬回香港也是先住在劏房，後來由於銀柴抑鬱症病發失去工作能力，在社工安排下入住公共房屋。

近年內地移民的背景呈現多元的狀況，基層內地女性多是來自相對落後的農鎮，她們中學畢業後會流移到大城市或者經濟特區工作；而高學歷女性有來自大城市和二、三線發達城市，油桐、傘樹、桂花大學時已移到北京、上海、重慶這些大城市讀書，山茶則是大學時期已到海外；然後再到海外或者香港繼續進修和工作，只有油桐一人回到國內(銀行)工作。在香港定居後，黃槿、木荷和龍柏做全職家庭主婦，白千層和鳳凰木只能做餐廳侍應和老人院保健員的零散、兼職工作；而高學歷女性則從事相對高薪和專業的工作。

表 4-4：內地女性和香港配偶背景資料

內地女性資料									
	1	2	3	4	5	6	7	8	9
	黃槿	木荷	龍柏	白千層	鳳凰木	油桐	傘樹	桂花	山茶
年齡	37歲	48歲	33歲	33歲	29歲	31歲	35歲	30歲	35歲
學歷	高中(廣寧)	小學(新會)	高中(清遠)	護理專科(江門) ERB保健員(香港)	高中(四川)	碩士(香港)	博士(香港)	碩士(香港)	碩士(香港)
現居地	公共房屋	劏房	公共房屋	劏房	公共房屋	杭州	自置物業	自置物業	自置物業
出生地	廣東省肇慶市 廣寧縣	廣東省江門市 新會區	廣東省清遠市	廣東省江門市	四川省自貢市	浙江省杭州市	上海市	廣西省柳州市	遼寧
渠道	阿姨介紹	朋友介紹	長輩介紹	網絡社交平台	朋友介紹	大學圖書館認識	朋友婚禮上	學系交流團	朋友介紹
內地工作經驗	服務生、文員	農民、車衣女工	美容產品銷售、美容師、店長	護士、保險從業員	工廠女工、銷售員	銀行翻譯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香港工作經驗	全職家庭主婦	全職家庭主婦	全職家庭主婦	老人院保健員	雜務、侍應	不適用	大學講師	社工	核數師、編輯、市場推廣
香港伴侶資料									
姓名	相思	土蜜樹	合羞草	菩提樹	銀柴	落羽松	蒲葵	羅漢松	吊鐘王
年齡	35歲	50歲	37歲	36歲	50歲	30歲	37歲	29歲	44歲
學歷	中學	小學	中學	中學	中學	碩士	博士	正在修讀碩士課程	碩士
香港工作經驗	點心師傅	三行工人	跟車搬運	建築工人	失業(現在) 產品檢驗主管及 助理經理(跨境工 作)、保全	護士	自由工作者、大 學講師	社工隊長	會計師及財務策 劃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香港女性和內地配偶的背景多元(表 4-5)，以香港女性居住地來區分，現時在港居住的茉莉、桔梗和木棉，她們的職業多數是專業，例如：社工、會計和物理治療助理，及收入也算穩定，相反，她們的伴侶從事私人買賣和僱工計算的工作，收入相對不穩定，其中，茉莉和馬尾松、木棉和梧桐的學歷程度差距較大。到內地居住的三對中港夫妻，相對來說，內地工作的丈夫其收入較高以及在當地擁有自置物業，生活條件相對鬆裕，例如，橡樹在學歷、收入都比紅戒球高，年齡差距也較為明顯。馬尾松和棕櫚都有申請單程證，棕櫚剛剛取得了單程證，並會在 2017 年開始留港生活；而馬尾松仍在等待審批中；樟樹和梧桐未有來港生

活的打算。

表 4-5：香港女性和內地配偶背景資料

香港女性資料						
	1	2	3	4	5	6
	茉莉	蒲桃	紅戒球	桔梗	木棉	銀樺
年齡	33歲	33歲	26歲	28歲	33歲	26歲
學歷	碩士	中學	中學(香港) 酒店管理證書(澳 州)	中學	大學	中學
現居住地	香港租住房	深圳自置物業	北京自置物業	香港公共房屋	香港公共房屋	北京自置物業
認識途徑	貴州旅行認識	梅隴朋友介紹	工場cafe的客戶及朋 友	回國內旅行認識(朋 友的表哥)	同事朋友聚會	聚會上朋友介紹
工作經驗	社工、活動工作 員、文職	時裝銷售員、侍應、 收銀、知客部長、	全職家庭主婦(內 地)、咖啡店接待 (澳洲)	物理治療助理、病 房助理	會計	全職家庭主婦(內 地)、董事長秘書 (內地)、客服務主 任
內地伴侶資料						
姓名	馬尾松	樟樹	橡樹	棕櫚	梧桐	馬尾松
年齡	32歲	34歲	34歲	31歲	40歲	未有透露
現居地	香港、深圳	深圳	北京	惠東、香港	北京	北京
學歷	專科	中學	(澳洲) 中學、大學	中學	中學	未有透露
取得單程證時 間	未取得	不適用	不適用	2016年	不適用	不適用
內地工作經驗	淘寶電商、投資業 務、自資攝影公 司、酒店餐飲服務 生	自資做不同類型買賣 (批發雜貨、液晶轉 售、回收手提電話等 等)	IT工程師(澳洲、內 地)	與家人合資辦鞋批 發	海外旅遊領隊	家族生意董事長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第五節小結

中國經濟逐步走向開放市場，香港作為連接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橋樑，回歸後香港角色變得更為被動和依賴中國市場。中港兩地人民在國家經濟佈局中有了更多互動機會，而每當有新一輪的經濟計劃也影響了中港婚姻的組成和男女背景特徵的改變(表 4-6)。90 年代前，移民制度的建立和移民潮開啟了大規模的中港婚姻，此時夫妻背景有明顯的同質性；1990 年之後，內地經濟開放設立經濟特區和香港的去工業化，促成了一批中港兩地男、女工人流動到深圳工作，增加

了認識和互動的機會。2000 年後內地經濟特區經歷生產成本的上升，資方把廠房陸續轉移到內陸省市，經濟特區再次經濟轉型，第三產業逐漸擴展，香港在內地的業務從製造業轉移為服務業，向內地市場提供專業的服務。2000 年以後的中港婚姻中，有愈來愈多內地女性在居港前的職業從工廠工人轉換成服務生、文員，此時白領、專業、年青香港男性也有所增加。香港吸納內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發展(中國的)全球城市的經濟策略下，2000 年開始不斷放寬內地學生到港升學限制，2008 年開始推行「非本地生留港就業計劃」，也就促成了更多內地高學歷人才留港就業，和本地人開展親密關係落地生根。這些高學歷中港婚姻其社經地位也較 2010 年前的中港夫妻要高，夫妻在學歷、收入、職業、年齡等方面呈現高度同質。

表 4- 6：不同時期的中港婚姻新增類型

	90年代以前	1990年-2010年	2010年之後
新增認識渠道	回鄉娶妻、親友介紹	跨境工作、消閑	香港升學、就業
香港男性	內地移民	跨境工作工人	高學歷
內地女性	農村	工廠工人、服務業工人	高學歷
夫妻背景差異	同質	異質	同質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二十一世紀，亞洲多個城市積極向全球城市模式發展，想要在國際占一席位，香港面對其他亞洲城市的競爭，為了提升其競爭力，積極推行吸納人才計劃，希望藉著寬鬆的人才移入管道提升其國際競爭力。然而眾多人才計劃成效一般，反而內地學生來港就學然後留港工作的增幅最為明顯。不過，由於內地和香港在國際體系的位置仍在變動中，有內地高學歷人才不願意放棄國內戶籍，反而會使用便利的工作簽注留港工作。

內地學生對香港實施教育產業化有直接的經濟投入，他們畢業後，也紛紛投入香港生產總值最高的行業，包括：「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及保險」。如同 Sassen (2015)所言，全球城市發展持續產生了兩極化(polarization)的社會結構，產生了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需要大量廉價的服務業部

門來支撐各項庶務工作，而低薪、零散化的庶務工作則由基層移民女性來承擔。基層內地女性透過家庭團聚的途徑申請單程證到港，受限學歷和工作經驗認可的障礙以及家庭照顧責任，這些移民女性只能在服務業從事零散、兼職工作。人才計劃和單程證猶如一個輸入內地移民的雙管道系統，分別把高學歷女性和基層女性輸送去香港兩極化的生產部門，支持著香港的全球城市發展(圖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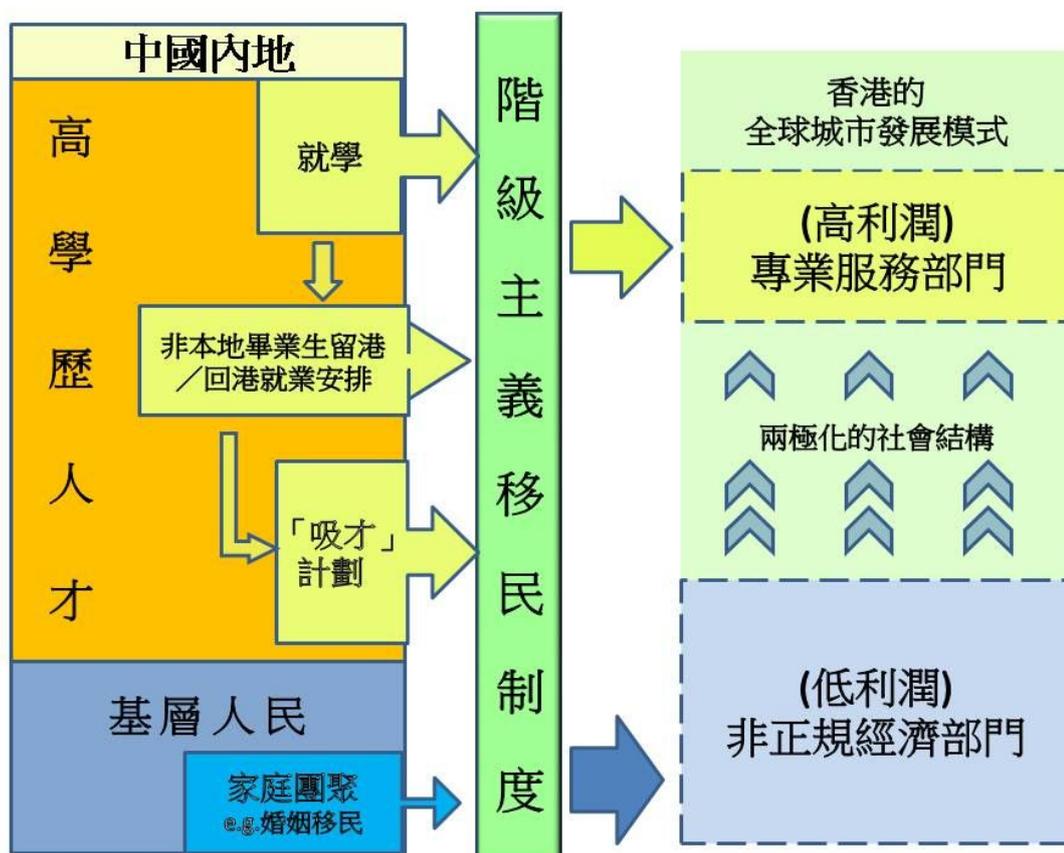


圖 4-1：2000 年後香港移民制度和全球城市經濟的兩極化發展
資料來源：自行製作。

第五章共同生活的追求

第一節中港夫妻定居考慮

單程證輪候時間冗長，以致於中港夫妻奔波於兩地，有基層中港家庭善用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離，彌補薪水不足的困難，幾乎所有的家庭都希望可以盡快一起生活，不用再嚐分離之苦。其中，受訪者會覺得分居兩地讓感情容易起變化，油桐認為「兩人在一個城市也會有問題，兩個相隔在不同地方，什麼都不太一樣」，一起生活是維持穩定關係的一個出路。

對於基層的內地女性來說，從夫居(patrilocal residence)是一個俗習，沒有想要不要去香港：「因為我們上面結婚多數到男方那邊，基本上，我阿妹嫁也是到男方那邊，不會在我們那邊。其實，這只是一個習慣，沒有什麼原因。(黃槿)」到了一個陌生環境定居，伴侶的陪伴無論在情緒上，還是適應上都能夠讓內地配偶感到安心，木荷就有提到，跟老公一起在香港生活，雖然住在劏房，生活艱難，可是起碼有「安全感」，什麼事都有人商量、共同面對。

香港女性茉莉也有提到，婚後會想跟對方一起面對生活事務：

我那時候讀 master 忙得不可開交，白天工作、晚上讀書、星期六日去 placement。當時他不在香港不太有所謂，我 occupy 自己。跟他婚後去了 1 年半的旅行，我們幾乎天天在一起，那時候結婚有 3 年多，就會覺得想在一起，生活上很多事務想一起面對。

建基於「婚姻是兩人共同生活」的想像，茉莉認為一起承擔生活上的種種其實是一種家庭分工：

雖然他在深圳，但是我們隔了一條河，不會每天見到，像是結婚要預訂日期也是我自己去做，他不會幫上忙。結婚完了，跟家人去吃飯也是我找資料。那一刻就會覺得，是呵，我們有很多共同話題，但是當人面對生活壓力，我要工作，我要實習，我還要去預訂結婚日，你身在遠方幫不上忙，我會有這種感覺。而且，再遠一步來說，如果有小孩了，總不能我自己在

我這邊照顧小孩，你在那邊生活，weekend 才一起這樣。(茉莉)

獨自照顧小孩的確讓身為主要照顧者的女性覺得負擔很重，另一位香港女性桔梗覺得，沒有丈夫的幫忙有時自己就好像單親媽媽般辛苦：

照顧小孩，什麼都是自己一個，雖然我媽媽會幫忙，不過有時她也會有抱怨。唉，有時我自己也會後悔，「我自己也不差呵，為什麼會選他？幹嘛現在這麼辛苦？好像單親媽媽一樣」。我會有怨言，不過不會跟他說，免得傷了他。(桔梗)

這些中港家庭期待著一家團聚在同一個地方生活，對於他們來說，這是俗習，是維持穩定關係的方法，也是共同分擔家務和照顧小孩的需要。當今社會強調多元文化，「家庭」(family)形式愈來愈多不同的組成，有異性戀、有同性戀、有單親、有跨代親屬等等，但無論怎樣的組成，似乎都抱持著「共處」的想法；Beck&Beck-Gernsheim(2014)曾經說過，家庭的本質：「家人面對面共處一地生活並直接發生互動」從未被質疑過。雖然「共同生活」是眾多移民家庭抱持的想法，可是，在移民政策上的制訂上，並不見得考慮到「共同生活」的需要，反而發展經濟的需要被置於更重要的位置，形成階級主義的移民篩選制度。

關於婚後到哪裡生活，正如上面提到基層的中港家庭很少考慮這個問題，他們主要是到丈夫的居住地生活。相反，高學歷內地女性和香港女性的中港家庭來說，這些家庭就有比較多的討論：

壹、以小孩利益作為考慮

有了小孩以後，基層和非基層的中港夫妻都會以小孩的利益作為家庭決議的考慮，就居住地來說，蒲桃就講到：「看他爸爸在那邊住呵，他過來香港就在這邊住，要遷就他工作呵，看他工作方便才決定住哪裡。除非小孩要上學了，上學就不遷就他(老公)，就要遷就小孩」。桔梗也有講到：「畢竟小孩在這邊(香港)讀書，沒道理要他去大陸讀書適應大陸生活」。白千層離婚後，獨立照顧小孩，加上他以香港身份居住香港不夠1年無法申請綜援，問到他在港生活窮困有沒有考慮回內地生活，她的回應或許可以用來參考何以眾多中港家庭都希望小孩在香

港讀書：

我去年拿了(香港)身份證也不願意來，那一段時間就是在思考留在內地還是到香港，最終也是選擇來香港，因為兒子在香港讀書。這麼多中港兒童為了一個學位讀書，我有這個條件當然想讓他在香港讀書，因為我怕他長大埋怨我「我明明是在香港出生，可以在香港讀書，為什麼你要我回去讀共產黨，你是否想要我死？」我循著正常路徑讓他去做，以後他懂事也沒有理由埋怨我。在香港做 part-time 按日薪算，辛苦程度差不多，香港有 500 元一天，大陸只有 100 多一天，工作時間一樣呵，或許住屋條件目前會辛苦一點，可是有機會呵，不會一輩子都沒有改變的可能，你可以做著等待機會。有很多條件因素，當然最主要的考慮因素是他(小孩)，當然也有其他優勢，整體福利都好，你在街上看到小孩，不會擔心不牽著他的手，他會被牽走。

對於內地普遍的民眾來說，香港的教育環境整體來說比內地優勝，讓子女在香港讀書是父母可以為子女籌謀的計劃，即使面對困難，繼續在香港生活代表了仍然有提升生活水準的可能，一點點的可能性就足以成為內地配偶白千層待在港生活的動力。相對來說，經濟能力更充裕的紅戒球和丈夫橡樹打算繼續在北京生活，他們計劃讓小孩到國際學校讀書，等橡樹父母不在的時候，就帶著小孩到國外生活。

貳、以家庭收入作為考慮

如果夫妻雙方都是受僱的勞動者，在香港工作的伴侶薪水一般比內地的伴侶要多，維持家庭穩定的高收入成為了內地配偶到港生活其中的一個拉力，「她說：『你去大陸能找 3 萬塊錢一個月的工資嗎？』，我說幹不了，那幹不了就來香港，還是生活吧」(馬尾松)。馬尾松跟香港的朋友商量過，發現香港特別缺建築工人，聽說日薪漲到 2 千元還是缺人，打算到香港後找不到工作可以試著做：

生活逼到你吃不飽飯，你不去做?!主要是我家裡面，我是農村的，我家河南是一個建築業大城，特別是我們縣都是搞建築的，我爸以前是包工頭，

所以我都見慣了，小時候我爸在鄭州包工，我從小暑假就去工地玩，都見慣了，大陸的建築工地可慘，早上天沒亮就上工了，沒個週末沒個休息那收入不是很高呵。香港一天8個小時有週末，工資水平可以跟茉莉差不多，我覺得這怎麼不可以，可以呵！我也不是懶的人、受不了苦的人。而且，這可以賺錢，有了孩子以後，我們倆要是都有3萬塊錢，在香港生活就很輕鬆。

在香港的經濟結構之下，馬尾松和其他基層內地女性一樣，他們無辦法再做之前(內地)相關的工作類型，例如：文員、銷售員、美容師，甚至護士，他們只能轉而從事低技術／非技術、體力勞動的工作，無論薪水、待遇、勞動保障各方面都略為欠缺的工種，而內地基層女性更因單程證冗長的等候期和照顧責任，中斷了工作生涯，退出勞動市場。在提倡知識型經濟、朝向全球金融中心發展的香港，不同階層的內地配偶在港的工作選擇非常不同，有專業技能的傘樹和金融業相關工作經驗的油桐和山茶，相對來說他們的工作生涯不受地點轉換而影響，可以繼續發展其工作生涯。

高學歷內地女性和香港女性的夫妻雙方都在工作，他們也會分析定居地對於雙方工作生涯的影響。油桐在內地銀行擔任翻譯，而丈夫落羽松則在香港的一間公立醫院擔任精神科護士，除了由於落羽松現時的薪水比較高，不過在 CEPA 計劃之下，他的專業資格在內地只能從事短期的工作，明顯地落羽松留在香港的薪水和職業保障比較穩定。再來，由於愈來愈多來自內地的銀行在香港上市和增設分行，油桐現職的公司正有此計劃，因此油桐將來可以透過調職到港工作和定居，又或者以過往的銀行工作經驗在港找工作。

另一位高學歷內地女性和她的伴侶分別在香港的兩所大所大學擔任講師，工作環境的限制和已經建立的人際網絡構成了留在香港工作的重要因素：

我讀書時已發現並不適應大陸的教育系統，因為內地現在有愈來愈多的限制，例如「七不講」，不講普世價值，對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我在香港建立了很多的 network，如果不在香港找工作回去大陸會覺得很浪費，而且父母也能接受我在香港工作。我老公不能回去工作，他過去教什麼好呢？他跟我一樣的問題，價值觀和內地分歧很大。(傘樹)

除了以小孩的利益作為考慮，香港女性紅戒球講到到北京生活是因為橡樹想多陪年事已高的爸媽，紅戒球還有提到了比較少人提及的考慮：「香港生活壓力大呵，我們在香港的話很難維持現在的生活水準，不可以老公一個人負責家裡的收入，我在家帶小孩。在香港很難做到，要爸爸媽媽都出來工作才行。」橡樹在北京一家衛星公司擔任工程師，有一套自住的房子和一台小轎車，不用經常加班，假日時候橡樹和紅戒球會一起去看球賽。家裡顧了家務工處理家事，好讓紅戒球專心照顧小孩。如果橡樹在香港領同樣的薪水，在香港的生活水準，包括居住環境、性別分工、以及休閒消費都會出現轉變。

第二節 基層家庭的困難

中港男女受限於兩套居留制度，在雙方正式移居到同一地方長期生活之前，他們需要分居兩地又或者奔波於兩地之間來維持關係。高學歷內地女性在港就學就業期間，可以使用就學和工作簽證在香港長期逗留，她們和伴侶一般不會出現分居兩地的情況(沒有留港工作的則需要分居兩地，油桐的情況便是)；而定居內地的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中港夫妻也無需經歷分居兩地；一般是基層中港婚姻和定居香港的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中港夫妻便需要透過各種簽證往返兩地來維持關係。基層中港家庭只能透過「家庭團聚」計劃申請單程證，而單程證申請手續多年來未有放寬，仍然需要等候多年。中港融合的經濟計劃實行間，內地到香港的各種短期簽證的申請相對放寬，美其名方便內地配偶到香港，實際上拓展旅遊業；加上公共服務把內地配偶列為「非符合資格人士」，迫使基層中港家庭的生產和再生產分離來維持生活。

壹、短期簽證的影響

香港早期的長途電話服務以及愈趨發達的通訊科技均協助了兩地男女維繫關係，黃槿就講到：「我們大多用電話聊天，他說打電話很便宜，多數是他打給我，因為我打去香港給他很貴，他用 IDD 打來大陸才 1 毫半 1 分鐘」，茉莉和馬尾松，油桐和落羽松就比較常用手機軟體聯繫，不但可以透過文字、聲音、和影像多種形式，而且製造同步的生活感，「我差不多 10 點左右回家，11 點多才到家，大家都會爭取時間在網絡上聊幾句」。中港男女有時會相約休假時到廣州、深圳這些大城市約會，也會到對方的居住地探望對方。香港居民到內地的出入境

限制一直比較寬鬆，黃槿、龍柏、木荷、白千層的伴侶以及落羽松、桔梗、蒲桃、茉莉都會在假日的時候到內地探望對方；在推行「自由行」之後，內地到港短期逗留的簽證愈來愈方便，逗留時間也有所延長。

從 80 年代開始到 2003 年初，(非公務)內地居民如果要到香港(或者澳門)和親屬好友見面，只能以參加旅行團的方式經過深圳口岸到香港，並且需持有由地方公安局發出的《往來港澳通行證》(下稱通行證)，而這些港澳旅行團有配額限制。受訪的內地女性龍柏和黃槿，她們早年都有經此方式到港探親。受 1997 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3 年的 SARS 影響，香港整體經濟和旅遊業大受打擊、失業率上升，加上市民對特區政府管治不滿，引發了 2003 年 7 月 1 日 50 萬人的遊行示威。當時的特區政府和中央以復興經濟的手段來回應管治危機，於同年簽署 CEPA 協議，並隨即於 7 月 28 日實施「港澳個人遊」(又稱自由行)，準許內地居民以個人身份透過簡單的簽注⁸⁵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以逗留一週。這可以說是回歸中國後，放寬內地居民出入香港的一個重要措施，對於兩地人民關係的影響甚為重大。自由行第一期的指定城市是廣東省的 4 個城市⁸⁶，到 2007 年 1 月 1 日，全國開放城市已達 49 個，遍及中南、華東、華北、東北、西南地區。2009 年 4 月 1 日起，深圳戶籍居民可以申請一年多行簽注，即一年內可以無限制往返香港，每次逗留不多於一星期；及後在香港社會強烈要求下，2015 年 4 月又改為「一周一行」。中國內地的遊客數量伴隨訪港簽注的政策變更而有所轉變：中國內地的訪客人數在 2003 年全年只有 846.72 萬，到了 2014 年全年的訪客人次 4,724.77 萬，而改成一周一行後，2015 年全年的訪客人次略為下降到 4,584.23 萬左右。

實施自由行，減低了內地居民來港限制，除了推廣香港旅遊業，增加內地人在港消費。同時，中港婚姻的註冊地也從內地轉移到香港。2003 年之前，在港註冊的中港婚姻數量不到 8 千宗，而落實自由行的同年，在港註冊的中港婚姻數量已超過 1 萬宗，及後一直增加，至 2008 年的高峰期更是超過了 2 萬 1 千宗；而香港男性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書」到大陸註冊的數量則從 2002 年的 1 萬多宗逐年下降，到 2014 年只有 3 千 3 百多個申請「無結婚紀錄證明書」。此次研究

⁸⁵簽注分為三個月一次、三個月二次、一年一次、一年二次

⁸⁶包括：東莞、中山、江門、佛山，同年陸續開放的城市有廣州、深圳、珠海、惠州、上海、北京。

的受訪者中，只有 3 位在內地辦理婚姻註冊手續，其餘都在香港註冊。

內地配偶在婚前會以自由行的方式來港逛街、觀光、探訪香港伴侶和親戚，婚後基層內地配偶需要至少四年輪候單程證的時間才可以到港定居。與此同時，這些內地配偶會持探親簽注(俗稱雙程證)到港居留。然而，內地男性因持續在內地工作，他們比起內地女性來港的次數較少，而香港妻子會在假期時到內地與丈夫團聚。已請辭的內地女性以雙程證到港與丈夫共同生活，平常操持家務、照顧家庭，在居留限期前或者簽注到期前需要返回戶籍地辦理續期簽注，然後再到香港生活，一般需時兩星期左右。雙程證分成：三個月一次往返⁸⁷、三個月多次往返、(以及 2009 年 12 月推出的)一年多次往返⁸⁸。由於持雙程證在港居留期間不能就業、就學，內地配偶日常就是操持家務和等待老公回家，加上對社區還未熟悉，對於他們來說，在港的日常生活會感到無聊、無趣，幾位內地女性都有說到續證回內地的期間看到家人、朋友更感開心，黃瑾就有說到：「始終在大陸長大，同學都在那邊。續證回自己家，跟朋友見面、聊天，回去家鄉會比較開心」。回內地短期生活成了內地女性喘氣的空間，有受訪者因而選擇三個月的簽注，龍柏就有講到：「在這裡悶了三個月還不快走，我可以辦一年(簽注)也不辦，就只辦三個月(簽注)，回去兩星期看看父母，去玩一下，多開心」。

貳、公共服務的排擠

基層內地女性在婚後仍然居住於內地，直到取得單程證或者孩子在港上學，他們才會移居香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減少開支。銀柴 2006 年從加拿大回流到香港，隨即找到一份產品質量控制(QC)主管工作，需要長期在深圳工作。銀柴婚前在深圳租了一套房子和鳳凰木一起生活，小孩也在深圳出生，2012 年，銀柴被辭退後隨即回港找工作，而鳳凰木和小孩就繼續留在深圳，直至小孩上幼稚園才一起到香港生活。而木荷在婚後曾持雙程證到港和丈夫一起居住於劏房，直至懷孕後基於生育的照料困難和在港產子費用昂貴，只好回到內地生活，也是直到小孩上幼稚園才正式到港生活。

早於 2003 年，醫院管理局(以下簡稱醫管局)根據 2003 年公佈的「人口政策

⁸⁷逗留不能超過 14 天

⁸⁸香港入境條例規定持中國探親簽注旅客逗留期不能超過三個月，所以三個月多次往返和一年內多次往返的簽注都必須連續居住 90 天必須回內地一次，不過可以即日往來。

專責小組報告」，規定只有在香港住滿七年的永久居民才有資格享用公共醫療服務，而港人內地配偶從此成為「非符合資格人士」，他們每日的公立住院費用，從原本與當地居民（或「符合資格人士」）相同的 100 元港幣提升到 3,300 元，也就是從 2003 年開始，持雙程證或居港不滿七年的內地配偶在港產子動輒要上萬元。2005 年起香港政府以「確保本港孕婦可在公立醫院獲得妥善的服務」之說，將公立醫院非符合資格產婦的產科服務費用提高至 2 萬港幣，強調以實行收回成本的原則所實施的收費標準，2007 年再次上調費用，3 萬 9 港幣為預約價、4 萬 8 港幣為非預約價，以達至「減低非符合資格人士產婦不接受產前檢查的誘因」。2012 年實施的零雙非計劃，所有「非符合資格人士」不能使用公立醫院產科服務，港人內地配偶只能轉而在收費更昂貴的私家醫院分娩。

鳳凰木和銀柴的小孩在 2010 年年底出生，當時雖然可以在公立醫院分娩，可是費用最少也要 3 萬 9 港幣，於是白千層和銀柴決定在深圳生小孩。雖然他們沒有深圳的戶籍，不過比起香港的收費，的確是差很多：「我們其實經濟能力有限，在香港這邊生要幾萬塊，沒有這個能力，我從入院到出院 3 天，所有東西用了 2 千多塊人民幣，如果在香港生，還要開刀的話就更貴了」。銀柴接著說：「我朋友老婆要開刀，還要去香港覆診，檢查、車費，因為香港收費很貴，所有加在一起，朋友生小孩用了 8 萬」。

縱使香港人內地配偶所生的小孩具有香港公民身份並且可以補充香港的人口，不過，內地配偶在人口政策的劃分下，被歸類為公共醫療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需要繳付特別昂貴的分娩費用，現時的劃分制度變相把經濟能力有限的基層中港家庭排除在香港公共醫療服務之外。有內地配偶和婆家因為留港分娩的問題而有所衝突：

他家人知道我懷孕了，就叫我回大陸生，說不想我在香港生，因為比較貴，要用 5 萬塊。「反正能申請過來香港，你兒子小，申請 2 年就來香港了，不要在香港生」。「小孩在香港讀書，當然想要有香港的出生紙證明，不然讀書什麼都低人一等」，我就這樣說。他家人為了省那幾萬塊就叫我回去，他家人講了不好的話，就說「如果你堅持要在這裡生，我就不認你兒子，不認他做孫子，不認你做媳婦」，他這麼過分，為了幾萬塊就這樣，真的很吝嗇。他們什麼也不理，公公在我生的前一天回鄉下逃避，婆婆醫院也

不來，我回家飯也沒有一口吃的，連坐月子也沒有照顧我，他們連孫子也不抱。（白千層）

白千層再三堅持，終於在 2011 年年底在香港生小孩，可是回家以後沒有人願意幫忙照顧自己和小孩，她只好帶著出生沒多久的小孩回到內地，在爸爸媽媽的協助和照顧下生活了半年才再去香港。的確，產後的照顧對於家庭支援薄弱的基層中港家庭來說，無疑是另一種困難：

我也想來香港生呵，一是費用很高，二是老公工作不能照顧我們，反正小孩也遲早到香港。我老公工作不穩定，他到大陸給我很少錢，現在大陸消費都很高，只能省著用，我女兒 7、8 個月我都在餵母乳，我老公沒有買奶粉來我就繼續餵母乳。（木荷）

由於官方沒有中港家庭來港定居前的數據，在此以民政事務總署的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數據作為參考，2007 年至 2012 年期間(也就是公立分娩費用調整之後)，新來港家庭的入息中位數維持在 6 千多至 8 千港幣，也就是說新來港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收入是低於 6 千多至 8 千港幣，而此研究的內地女性受訪者(除高學歷女性外)的家庭每月收入從 9 千到 3 萬左右，即是屬於中港家庭中經濟比較中上的一群，不過相較於當時全港月入中位數 1 萬 7 千至 2 萬港幣來說，這些中港家庭在香港生活並不充裕。來港定居前，中港夫妻分居兩地生活(以至於在內地分娩)其實是一種應對薪水不足的策略。如同劉梅君(2000)的研究所言，台灣的外勞得以「廉價」，是基於生產和再生產的分離，生產發生在外勞輸入國，再生產則發生在輸出國。外勞在台給付的只是基本薪資的水準沒有包括再生產的成本，在外勞政策的協助下排除了外勞在台灣再生產的可能性，台灣的外勞得以「廉價」。正正兩地的生活消費指數有差距，借助分居兩地，老公在香港從事經濟勞動，老婆在內地生育、照顧小孩和自己，這些收入一般的中港家庭借助隔離生產和再生產得以維持生活。而香港公共服務用居住年期把使用者劃分成「符合／非符合資格人士」，無疑在社會制度上增加了中港家庭在港的再生產成本，間接促使中港夫妻的生產與再生產分離。當這些家庭來港定居後，再生產的部分必須在港發生，其時的經濟狀況也就更加窘迫。相反，高學歷中港夫妻可以承擔昂貴的生產費用，

就算油桐也是公共服務的「非符合資格人士」，也無阻她在港生育。香港女性是公共服務的「符合資格人士」，則可以選擇使用公共／私人分娩服務。這些社經地位教高的中港家庭在生育和居留方式上有更多的選擇。

第三節小結

婚後以夫家為軸的習俗仍常見於華人社會，中港婚姻也如是。只是說，基於中港兩地的社會差距，包括薪資水平、個人自由、和教育系統的質素，在港工作的自主性和薪酬水平一般比內地高，而且香港政府視國內人才為提升香港在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重要資源，以寬鬆的移入制度吸引內地高學歷（女性）留港工作，在俗習、生涯發展、共同生活想像以及孩子最佳利益等多個因素交織下，眾多香港丈夫內地妻子的配對模式的中港婚姻，最終把香港作為定居地。而香港妻子內地老公的配對中，有部分的內地配偶經濟能力比香港妻子優勝，「自然地」這些中港家庭會隨夫定居於內地或者海外；相較之下，在香港妻子收入比較高和穩定的中港家庭，如果按照習俗妻子放棄工作到丈夫居住地生活，這些家庭就很有可能面對社會位置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的狀況，加上家庭中擁有較高經濟獨立能力的成員相擁有較多的決議力，內地男性配偶也會申請單程證，到香港定居。簡言之，中港家庭的定居地是基於理性的經濟考慮，在物質生活、小孩教育和習俗中取得平衡，基層中港家庭由於通常是香港男性作為主要的經濟承擔者，「嫁雞隨雞」的習俗因而簡化為理所當然的原因，而內地男性配偶到港定居凸顯了兩地婚姻定居地的多重考慮。家庭成員共處一地生活的想像到現在仍未被打破，基於這種想像，中港夫妻在婚後嘗試用各種方法一起生活。基層中港家庭資源匱乏，只能以家庭團聚的途徑申請單程證到港生活，當中嚴格的家庭團聚移民制度和公共服務系統對基層家庭的排擠，加重了他們共同生活的困難。

身處在變動的世界體系，中國的整體經濟的確大有提升，並向核心位置邁進。中港兩地的經濟結構已轉向服務、金融業，相較起來，香港的工資水平仍然比內地高，加上香港的教育和公共資源比起農鎮的水平要高，顧及孩子利益的前提下，基層中港夫妻傾向在香港定居，也就形成隨夫居的現象。高學歷的內地女性，由於具備專業的資格，不但可以在港工作，更可以在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任職，而油桐內地銀行工作的經驗可以轉換成在港找銀行工作的優勢，反映了香港對內地市場的重視；相反，即使落實了 CEPA，內地市場只是對香港專業局部開放，

像從事護理專業的落羽松在 CEPA 有限度的開放合作下，落羽松就無法在內地長期持續就業。內地定居的中港夫妻反映了香港優勢正在減退，一方面隨著內地在國際分工的提升，各國對於中國遊客的出入境限制減低，內地資產階級可以直接到國外，對內地人民來說，香港不再是唯一的西方現代化社會的象徵；再者，中國現代化讓一些大城市(例如北京、深圳)的現代化程度躍升上來，由於兩地資本主義的擴張程度有差，內地大城市的資產階級的工資和消費水平仍然有差距，加上家庭的支援，年輕的小資產階級更傾向留在內地大城市生活。

第六章中港婚姻的面貌

跨國婚姻研究在分析成因時，不少指出與移出地的貧窮有關，夏曉鵬(2002)的分析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發展下，跨國婚姻國家中存在不平等的發展，對於兩國處於邊緣位置的人民來說，以婚姻作為出路。夏曉鵬的研究中，「外籍新娘」都提到母國生活困境是決定遠嫁台灣的重要原因，經濟因素的確是促成跨國婚姻的重要因素。然而，當兩國的經濟差距縮小了、國際分工的位置亦有所改變，經濟因素的驅動力變得不明顯。趙彥寧(2004)比較了不同階段的「大陸配偶」跨境結婚的動機，相對於(40歲以上)最早到台灣的「大陸老娘」，「大陸小娘」跨境結婚的動機更為多元，並非純然基於經濟目的，現代性想像力反而是重要的原動力。

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現代化對個人的婚姻和家庭觀念產生了影響，幾乎所有的訪談人沒有直接提及經濟因素對於結婚的影響，他們提及更多的是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人走下去。然而，愛和情感以外，婚姻需要物質條件支撐，以下來看看意識型態和經濟因素如何交纏在一起，對兩地 80 年代出生的人們在結婚成家產生的影響。

第一節結婚的考慮

壹、「結婚」的緊箍咒

中國自 1950 年代實施婚姻法，城市和農村的年輕人有更大的自主度安排自己的婚姻(Yan 2003)，戀愛婚姻(love marriage)在這幾十年間更成為了中國城市的理想婚姻模式(Zhang & Sun 2014)。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現代化對個人的婚姻和家庭觀念產生了影響，如同 Farrer(2014)的研究，愈來愈多中國年輕人的親密關係是與婚姻脫鉤，引起了國家和父母的焦慮。國家和父母在不同層面向年輕人多返灌輸「正確」的婚姻觀，「要結婚」的意識形態更加牢固的捆綁著中國社會。

婚姻，對於中國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來說，仍然是人生一個無法抗拒的目標和壓力，不少受訪者中經歷過社會和家人一再對他們發出結婚的提醒：

一、到／過了適婚年齡：

●父母和家人提醒：是時候結婚了

家裡的姨媽姐姐會問「年紀差不多了，你結婚了嗎？要考慮一下喇！」我當時27歲，在農村27歲還不結婚是很大問題的，在香港37歲不結婚也沒所謂。（白千層）

●同輩都結婚了：

反正已經拍拖1年了，也是時候，當時我24歲了，我的同學都18歲結婚，他們小孩現在已經中學了，有些甚至是高中了，我當時是晚婚了。（龍柏）

●自己覺得是結婚的時候：

就算她快30歲了，她完全沒有逼婚。對她們那邊（內地）來說，她算是大年紀了。我想可能是我自己心態，覺得她是合適的對象，便想結婚了。「三十而立」，可能是快三十歲突然心態轉了，就結吧。（落羽松）

受訪者家人的關心、同輩的已婚狀態、甚至自我意識，都提醒著受訪者到結婚的年齡了，要結婚了。有研究指在中、西方社會，婚姻對個人而言，仍承襲著過去的傳統規範，被視為每個人生命週期(life cycle)必經的重要階段(趙淑珠，2003)。香港一個研究考察了家庭價值觀的改變，認為香港保留了不少傳統的家庭價值，例如：大部分受訪者同意家庭十分重要，也贊同婚姻比獨身、同居理想，而且並不抗拒生兒育女，而現時香港的晚婚、不婚現象與經濟因素有關，結婚成家養小孩的成本愈來愈高，導致有人被迫「單身」、「晚婚」（趙永佳、丁國輝、尹寶珊，2014）。從受訪者的回應可以看到這群70、80年代出生的各基層的中港男女都受著「要結婚」的俗習所規範。

結不結婚絕對不是個人的生活選擇，就連國家也把單身男性視為國家安全的威脅，而為了處理這個國安威脅，2007年中國官方婦權組織「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婦聯）把二十七歲以上單身女性定義為「剩女」，官方更把「剩女」納入官方詞彙，官方媒體大肆推廣「剩女」一詞，污名未婚的高學歷女性⁸⁹，更有「女德」課程在全國興起，鼓勵奉行傳統價值觀、克盡妻責；有教導女德的導

⁸⁹有網絡媒體把「剩女」的特徵歸納為「高學歷、高收入、性格偏執」甚至「智商太高」。

師說：「女性要以習近平夫人彭麗媛為榜樣，她會做麵條、會烙大餅，可以自己騎自行車去買蔬菜」，習近平才得以專心事業(方鳳美, 2015)。洪理達(2015)認為，剩女運動目的在於規勸高學歷的女性不要太晚結婚生子，因為中共產黨需要這群人來繁育「優質」的孩子。為了中國可以繼續壯大，不單止要減少單身率，高學歷女性更要發揮生兒育女的功能，優質化中國人口質素。

當受訪的基層和高學歷內地女性的同輩在結婚時候，他們正在經歷在外流移就學就業的狀況。內地的勞動力遷移從經濟改革開放便持續發生，根據《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2000年中國流動人口有1.4億左右，到2012年更突破了2.3億人，每六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移動人口《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白千層、龍柏、黃槿、鳳凰木畢業後，都曾經在這段時期從家鄉流移到經濟更發達的大城市廣州和深圳尋找工作的機會。Jampaklay(2006)的研究發現在泰國的流動人口有婚姻延遲的狀況，如同孫浦東(2012)在研究中國的婚姻進入現代性困境，發現人口流動和開放的性觀念對於人們進入婚姻是有阻礙的作用。

包辦婚姻(arranged marriage)在當代被視為落後、傳統，而在強調婚姻自由、個人意志的年代，父母和親屬以軟性和恐嚇方式再三提醒年輕人要進入人生下一階段「結婚」，受訪者們並沒有十分抗拒婚姻，在社會氛圍和家庭系統的提醒下，他們一邊堅持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結婚對象，一邊繼續工作、進修，婚姻成為一件未完成的人生任務。

二、親密關係要和婚姻掛鉤

我們當時對結婚沒有太大的慾望，不會特別想要結婚，可是因為他家人和我家人日夜嘮叨，我們終於在2014年結婚，是因為家人的緣故才會結婚。他爸爸媽媽期待他結婚生小孩。我爸媽的想法仍然覺得結了婚才会有保障，我想他們的意思是有一個身份，其實我也不明白他們說的保障是什麼。可是，他們仍然覺得一個女孩跟男人回北京，在他們眼中，結了婚聽起來會比較好聽，女兒同居會覺得面子不太好。(紅戒球)

對於結婚還是同居，兩代人的態度是明顯不一樣的，雖然，愈來愈多青年接受同居，不過，中央政策組(2012)根據統計處的數據估算，香港同居住戶的比例只有

1.7%，也就是說同居未在香港成為主導的關係模式⁹⁰。婚姻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繁衍下一代，先結婚、再生小孩仍然是多數人的人生腳本。紅戒球父母的反應並不罕見，除了顯示出同居和未婚懷孕仍然承受著污名，還反映了親密關係和婚姻仍然緊密捆綁在一起，性和生育只能被允許在婚姻之內發生，如果發生了性行為卻沒有結婚的話，對於女生來說，會損害名聲。如同 Farrer(2014)的研究，愈來愈多中國年輕人的親密關係是與婚姻脫鉤的，引發了父母的焦慮，其中個人自主 (autonomy) 的實踐讓戀愛關係充滿了不確定性，父母擔心年輕人在一起卻不一定會結婚，對於子女未來生活的保障和家族的傳承都會造成影響。

傘樹在港就學時和伴侶蒲葵同居，對於父母來說其實不好接受，然而，一方面傘樹遠離了原生家庭，父母無法直接介入來阻止。二是，父親用了一個能夠說服自己的經濟因素：「香港房租貴，同居比較省」，接受了女兒的同居安排。儘管個人主義對於年輕一代甚有影響，可是在決定結婚生小孩方面，考慮的不止是兩個人意願。訪談者結婚的決定有時可能是和父母輩的觀念較勁之後的緩衝回應：把同居轉化為結婚的前一階段，而非關係的最終模式。何以父母覺得結婚才是保障呢？以下我們來看看，國家的經濟轉向如何再次喚起父母對子女未婚的擔心。

三、未來生活保障的擔憂

他們(父母)在我 25 歲的時候就開始擔心，無論哪一個男朋友，他們覺得只要肯結婚就好了，令我蠻費解，我這麼重要的一個人，你可以隨隨便便就給其他人了？！你可能有聽說，在大陸尤其 one child generation 的家長是很希望自己的兒女可以早點成家，雖然我父母也支持我出去(出國)，可是同時也是相對保守。(傘樹)

山茶自從過了三十歲，父母一直在偷偷地替女兒物色和篩選結婚對象，避免加重山茶的結婚壓力，「他們給我介紹了 3 個男生，其實我覺得他們之前已經見過了，覺得 OK 才會讓我看看，他們已經幫忙做了很多功夫」。父母替子女物色婚姻對象的行為一直都有發生，不過，近年卻出現了誇張的情況。2009 年左右，上海人民公園出現了一個相親角，由白髮父母為自己白領中產子女相親的現象，引起

⁹⁰ 這可能與經濟因素有關，租房的開支太大，以致年青男女很想同居，卻只有少數人可以實行，其他人只能繼續與家人同住。

了社會關注。正如孫沛東(2014)所言，一孩政策(One Child Policy)和國家經濟制度改革，讓中產父母對於自己和子女未來生活的擔憂，對將來可能會出現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充滿恐懼，擔憂和恐懼促使這些父母在婚姻市場上尋求「上嫁婚姻」，為自己和子女未來取得一份可能更可靠有保障的人生保險。生活保障是實際的結婚因素，國家經濟轉向再次喚起人民對婚姻關係中物質基礎的重視，這不單單發生在中產家庭，基層家庭亦如是。中國農鎮長期以來在經濟和社會保障各方面都未能和城市看齊，生產和再生產也多是家庭和個人承擔，而城鄉的差距，令農村女性追求的不單單是「上嫁婚姻」，更是「空間上嫁的婚姻」留在城市過生活。香港奉行自由經濟多年，只有殘補式(residue)的社會福利，照顧和生養小孩等的再生產勞動力從來都是由個人和家庭承擔，加上近年住房價格節節攀升，勞動薪資未有跟隨物價上漲的幅度提升，對於不少年輕人來說，結婚生子是金錢代價極高的人生任務。

結婚在華人社會象徵進入人生一個穩定的狀態，而「穩定」需要物質條件支撐。市場自由化的社會，父母急切地替子女著急結婚一事，同時也反映了父母對於子女及自己未來生活的擔憂。家人(尤其父母)透過問候、關心、建議向這些年輕一代提醒適婚時機到了，他們同時表達了對子女進入穩定狀態的期待。要結婚的想法對不同的年輕男女造成不同程度的壓力，然而，家屬系統和受訪者的關係愈緊密，反覆的提醒也就更合理化了結婚的必須性。

貳、作為維持關係的一種策略

分開異地...可能兩人都有這顆心吧，就是可能覺得想放又不捨得放，那就努力一下喔，這樣子喔。可能，呵...因為中間也有很多分分合合，肯定呵，畢竟異地嘛，男女朋友吵架很正常呵，所以就覺得如果這麼捨不得的話為什麼不努力嘗試一下呢?!所以就嘗試一下再說，否則要換了，不然要怎麼辦?所以可能是這原因吧，其實如果真的願意放下，這事就不會有不捨。(油桐)

「戀愛—婚姻—家庭」似乎是一個連續體，可是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社會，戀愛關係充滿的不確定性關係，不必然可以順利過渡到下一階段，如果無法從戀愛過渡到婚姻或者家庭，面對分手是很常見的畫面，也就是說，戀愛、結婚充滿了不確定性，可是又必須走下去，婚姻仍然是不少年輕人要完成的人生任務。正如

Giddens(周素鳳譯, 2001)所言, 現代社會的親密關係需要反思性和積極維持／打造。分居兩地, 感情不穩, 正如桔梗所講「如果我們因為不結婚分手了, 我會捨不得, 我是喜歡他的」, 再三思考下, 結婚成為突破關係瓶頸的一個方法、手段, 婚姻可能是一場賭博, 不過, 為著未來的幸福還是可以放手一搏。

結婚要把握好時機, 糊里糊塗就趕緊結, 別拖太長, 太長風險太多了, 同學談戀愛5、6年, 7、8年都沒走到一起。拖太長激情就淡了, 然後你覺得沒意思, 人嘛都想要點刺激, 結婚以後你就無形地有個責任。不想談戀愛, 我們就散伙吧、分手吧, 離婚對中國人來說心裡還是疙瘩著。關鍵你一旦結了婚以後, 你們倆個人的心就是連在一起, 有矛盾你們倆都會努力去解決, 有矛盾我們就幹著來唄, 但是談戀愛的時候, 我不屬於你, 你不屬於我。我不提倡什麼試婚, 我覺得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那試試不合意咱們就分手, 那就不是抱著解決問題的態度來的, 哪有結了婚是沒有矛盾的, 所以就是說遇到問題不要怕, 要解決就行了。(馬尾松)

馬尾松指出了戀愛關係與婚姻關係都是潛藏著不確定性和挑戰, 差別在於面對困難, 兩個獨立的自由個體在沒有承諾和責任支撐的戀愛關係會更容易放棄關係逃避處理困難。婚姻仿似為親密關係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 不過, 穩定是建基於兩個獨立的個體願意放棄個人部分的自由和自主來與對方協商協調。

參、作為長期共同生活的前提

雖然同屬一國, 不過, 內地和香港、澳門在法制、行政、以至於公民身份仍然是由兩套不同制度處理。內地居民要在香港不受限制逗留, 一般會透過以家庭團聚為目的的單程證到香港長期生活, 連續在港生活七年便可以成為公民, 而其他簽證如旅遊、工作、就學簽證, 則會有長短不一的逗留時期限制。中港婚姻夫妻現時主要由內地一方在婚後移居香港共同生活, 一是性別的因素, 另外的評估因素有家庭收入、小孩教育等因素, 有關這些因素如何互相影響, 以至於中港夫妻的其中一方作出遷移的決定會在第七章分析。

兩地男女想要一起生活, 現在主要以「夫妻團聚」為由申請單程證移居香港。單程證申請採用計分制, 分數以婚後分居天數來計算, 近年在廣東申請來港夫妻

團聚的一般需要等候至少四年時間。「我們拍拖快一年了，想說如果真的去香港生活就早點結婚」，像龍柏的這種想法很普遍，對於他們來說，愈晚結婚，便會延遲夫妻一起生活的日子，單程證審批時間雖然大有改善(90年代普遍要等十年或以上)，可是也有等上幾年，既然制度上已經沒有辦法加快審批，中港男女只能把結婚時間往前提：「我覺得以後也是他，不會選別人，那就不要浪費時間拍拖了，快點去登記然後申請他來香港。不然浪費了時間，到時申請他來要多等幾年，將來是自己麻煩。所以我就說，我們先不要拍拖，我們登記(結婚)吧。(桔梗)」

再者，單程證制度建基於血緣和夫妻關係，申請條件限制在法定夫妻，登記結婚是申請單程證的必要前提，不然，中港男女是沒有辦法長期一起生活。也就是說，中國內地的移出制度是中港婚姻一個重要的催化劑，對於想要長期共同生活的兩地男女來說發揮著更顯著的影響力。

肆、「合適」的結婚伴侶

除了來自家庭系統和文化的影響，受訪者也提到對方的外形、性格不錯，其中更提到對方是合適的結婚伴侶，那究竟合適的結婚伴侶指的是什麼？細談之下，「合適」一詞包括了多方面的涵意。

一、對我好：

●把我的話放在心上

我們相處，我覺得他對我很好的，他很細心，我說的話他都有放在心上。有時來月經我會痛，他很緊張我身體，到現在也是。而且，他有行動的，看醫生呵、問候呵，你喜歡吃什麼他都會帶你去，反正關心方面是OK的。(桔梗)

●以陪伴表達愛意

他那時對我很好的，找到一個對自己好的所以就結婚。那時我去學化妝，他會先帶我去上課，他再去上班，到我放學的時間他就下班過來學校接我一起離開，有時候去逛街呵，在外面吃東西，就覺得日子很開心，來了香港就比較辛苦了。(鳳凰木)

●以消費表達愛意

認識了這麼多男生，當時我 27 歲了，好像到了適婚年齡，家裡又催得緊，好像遇到一個他好像滿喜歡我的，又很有誠意，他每個星期來廣州找我，又好像很大方，來了每次都買好東西給我吃，帶我去哪裡吃全都是 1 千元埋單。好喇，反正都要嫁，就賭一次吧。（白千層）

二、不是騙人

中港兩地的情侶不能常見面，面對面的互動機會比較少，早年會有報導內地女性婚後到港生活，發現對方的社經背景、職業、住屋和婚前所知有所出入。對於內地女性來說，增加對方的背景了解可以釋除對對方的懷疑。

那時是我阿姨介紹的，而且阿姨的朋友和他一起工作，加上我也有去過他家，多方面了解不會怕被騙。反正知道了他有沒有結婚，或者還有其他事情隱瞞著我，深入地講，就是知道他的底細。你知道喇，有些人會隱藏個性，我們少面對面相處，只講話是不知道。不過，他有正常家庭，有正常工作，不會有什麼不正常就不怕他騙人。（黃槿）

小心警惕的態度反映跨境關係的風險，對方主動坦誠表示個人的經濟困境，讓木荷下定決心一起生活：「我看他人很誠實（老實），還跟我說：『我沒有錢的，我做"三行"⁹¹，有時下雨沒有工作，我喝酒、抽煙、租房子，沒剩多少錢』，我明白他的處境，而且，我年紀大，只是找人一起湊合生活」。坦誠是建立關係的因素。

三、讓我想結婚

受訪者黃槿、鳳凰木、油桐、桔梗提及開展關係的時候都沒有以婚姻作為前提，「其實開始的時候，沒有想過結婚。因為不一定合適，我上次認識的那個香港男生沒有很合，所以，大家開始只是聊聊」（黃槿），在相處後基於對對方有更多的了解才會有了結婚的想法：

⁹¹泥水、木工、油漆三個行業的簡稱。

是跟他拍拖才有(結婚)這種想法的,我之前剛和他開始也沒有這些想法。之後跟他相處,覺得這個男人很值得付託終生,才有這種想法。第一個關鍵是他對我負責任,人又細心、事事以你為先這些,起碼讓我知道這個男人對感情不是假的(桔梗)。

如同Farrer的研究提及,親密關係充滿了不確定性,談戀愛不一定以結婚為前提,不過,如果這個過程能夠確定方是否適合結婚,也會繼續步入婚姻。其中對關係和未來生活「負責任」的態度,也就是雙方都願意結婚的立場是婚姻的前提。除此以外,對方的個人特質有否符合自己的期待/要求也是重要的:

在交往的過程,說真的,婚姻是 not necessary,可是你覺得這個人合適,將來可以一起走,如果婚姻不是一定要有或者沒有,其實有也無所謂。其實有了婚姻會覺得 settle down,感覺會有不同,而且法律上也有不同,會有保障。其實,我跟他相處,他真的很適合結婚。其實如果把「適合」這個感覺實際化,其實也有很多,像是價值觀、目標、生活方式,even 外形,你心目中的條件他 match 就是他適合了,我知道自己是什麼人,我也想要找一個跟我同類型的人,他大部分都很 match,最主要是他很善良,這個很重要,他的心是很軟很 soft 的。(山茶)

山茶道破了以感覺(feeling)作為包裹的戀愛對象清單,不知道要怎麼講清楚的「適合」感覺其實源自於非常具體的條件要求,對方符合愈多就是愈適合,其中包括了個人特質,對方的行為能否傳遞「真心真意」以及表示對建立家庭的承諾(負責任)等等。

伍、階級品味的婚姻選擇

男、女訪談者都有提及在他們的互動中,最經常的就是聊天,溝通在自由戀愛擔當了表達情感和建立親密感的重要角色。內地女性黃槿、龍柏、木荷、白千層、油桐和(香港男性)落羽松、內地男性馬尾松和香港女性茉莉、以及已經育有小孩的桔梗,婚前婚後都有分居兩地的時候,他們會通過電話或者網絡,分享生活和工作上的點滴,讓身在另一個地方的伴侶都可以和自己同步生活,茉莉就有

講到「我差不多 10 點左右回家，11 點多才到家，大家都會爭取時間在網絡上聊幾句」。婚後當內地配偶回鄉續證，兩人再次分居兩地，也會持續而緊密地透過電話聯聯繫，黃槿就有講到：「我們回大陸他也會天天打電話，可能我們住在一起這麼久了，突然不在，他(老公)會不習慣。(老公)有時工作了一天，有些事要找人聊聊」。伴侶是工作和生活的一個重要的分享對象，就算不在同一個地方，仍然可以使用發達的科技來維持關係、建立親密度。

高學歷的內地女生油桐、桂花、傘樹和香港妻紅戒球有講到，婚前婚後和伴侶都有聊不完的話題，這些話題可以是社會議題、工作狀況、生活逸事……傘樹就講到：「我們像很好的朋友，我們現在討論很多的是社會議題，工作上的事情，因為他會寫文章、出書，我教書，我們工作的範疇有很多交雜，有很多都可以聊」。夫妻就算有不同立場也可以理性地討論對事情的看法，不會因為而損害感情，桂花就講到：

我們晚上都會聊天，會因為很無聊的事吵架，比如工作的 intervention 手法、或者中港的矛盾、會爭吵 policy、會爭吵新聞，很無聊，我們不會吵自己的事情。我不覺得我們是在爭吵你對還是我對，我覺得這是建設性的爭吵，我們很少吵架會傷感情。

在向對方分享著對各種看法的同時，分享著個人的情緒，促進彼此的理解和關係的維繫。對方不單是生活和情感上的伴侶，同時也是理性討論的搭檔。正如 Farrer 的分析，中國人戀愛關係中有一套情感規則規範著情侶間表達不同的愛情原素，和被愛者有親密的溝通、相互瞭解、在對方獲取情緒支持等都是建立親密感 (Sternberg, 1986, 1988) 的重要因素。而由於分隔兩地，溝通更是擔當一個維繫感情穩定，減少不確定性的重要工具。

兩地男女雖然在不同地方成長，幾位高學歷內地女性和在澳洲留學的香港女性紅戒球覺得和伴侶相處起來沒有文化的隔閡，感覺自在。

我跟他生活習慣上，包括喜歡吃的東西、生活方式，其實都還蠻像的，所以也是蠻奇怪的，覺得...好像...生活上沒有特別不喜歡，當然人其實會變，至少在當時的階段，彼此都能夠接受彼此生活方式，也沒有大到說我

不能接受你這樣子。(油桐)

跟她相處是舒服的，性格、興趣都是很合的，大家對不同事物的看法都很相似，例如買東西給對方，幾乎不用問對方這個好不好，那個好不好，我覺得好，她也覺得好，我們就是可以這麼合。(落羽松)

日常相處中，兩人價值觀相近，衝突比較少。相反，南轅北轍的價值觀讓雙方尤其未來生活的規劃有明確的不一致，甚至產生衝突。夫妻教育程度接近的幾位受訪者表示夫妻價值觀對於兩人建立和維持關係會有幫助，例如傘樹就有講到：「我們價值觀時常都一致，非常相似的，而且願意互相溝通、協商。基本價值觀，例如追求平等、自由、人權，我和他都覺得這些不可以 compromised。另外一個就是大家都喜歡貓。如果他不喜歡貓，很難長久生活」。

除了喜好、個人信念，紅戒球就有講到夫妻相同的金錢觀和一致的消費行為可以讓他們的相處和諧。相反，不一致的金錢觀會為日常生活帶來很多衝突：

如果很烏托邦地想，人有藝術家、有寫作家，真的很好。他做事並非以金錢、經濟效益作為最先的考量，在一個北歐小鎮會很欣賞他，甚至街頭賣藝可能在外國很平常，不會有人 look down on 他。不過，在香港，他做這些是否有實際的經濟成果，不會有的，那做這些有什麼用呢？所以，我們會有衝突的。當日常生活，想著柴米油鹽的時候，那經濟壓力誰去承擔，還不是我，那很容易爆發衝突。(茉莉)

不一致的價值觀引起的衝突常見於夫妻教育背景差距較大的夫妻之間。白千層和前夫離婚的其中一個因素在於對於人生規劃的不一致：

我小時候爸爸就跟我講了，人只有 2 條路，一是向前，二是往後。一般人都會向前，如果要向前就必須要付出。我看我前夫，幾十歲比以前更糟，為什麼別人有進步，他沒有進步只有退步？我來香港這麼多年，有讀書、有工作，他還是在無所事事，每天在吸大麻、喝酒，喝醉了就睡在一旁。你問一下你要做怎樣的人？是呵，別人放棄你是不幸的事情，如果你放棄

自己，你想一下這是怎樣的事情，我也沒有選擇呵。

婚配對象的選擇受到其階級位置所影響，林平(2010)認為女性在選擇婚姻對象時會傾向尋求同階層中最大化的婚姻交換關係。他用 Bourdieu 提出的概念「慣習」(habitus)，分析了婚姻和階級品味的關連性。中港婚姻男女之間尤其高學歷內地女性和移居到北京的紅戒球和他們的伴侶雖然來自不同的地方，可是在日常的相處中，不論是飲食、休閒活動、消費、品味都有著類似的喜愛，相處融洽沒有太大的衝突，引用 Bourdieu 的概念來分析，高文化資本的中港夫妻在選擇婚姻對象時，相對來說透露出著明顯的階級品味。他們的家庭經濟、職業方面，以至社會位置都非常接近，讓彼此之間在各方面的行為與偏好(例如：食物、寵物的喜好、平等自由的價值觀、以及對親密關係的看法)有著很多的共通性。受訪者覺得雙方很合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之間的階級品味相近，相反，夫妻間的有很多／大的衝突，其實顯示的是夫妻間的資本和社會位置有著較大的差異。

溝通對中港男女的情感和親密維繫有著重要的影響，對於分隔兩地的中港夫妻來說，對話、溝通是必要的渠道，減低物理距離對關係建立的阻礙和伴侶在生活上的缺席。惟有通過(不同形式的)溝通對話，雙方才得以了解對方的狀況、創造共同感，作為伴侶的陪伴、分享任務才得以完成。正如 Giddens(周素鳳譯，2001)所言，現代的親密關係須要積極維持，對話是關係的基石，不過，中港男女的對話不必然是為了要在情侶間建立平等關係，反而是為了在不同的空間持續建立關係的親密感。而 Giddens 認為現代親密關係有民主化的轉向，相對來說，這些比較容易在高學歷中港夫妻之間察覺，相信與他們擁有更多的文化資本有關，對於自由、平等、民主等普世價值有較多的認識和開放的態度，也更有空間實踐到私人生活中，其中理性的溝通是相當明顯的特徵之一。

中港夫妻同質化的趨向除了基於內地的普及教育水平和內地女性高等教育的提升，階級的(婚姻)品味影響著配偶的選擇，然而身處的社會位置不但象徵了階級品味，也反映了階級資源，兩者構成了配偶選擇的條件與限制。

第二節變動的局勢不變的「上嫁下娶」婚姻觀

壹、香港男性優勢滑落

家人對於子女的結婚對象不是本地人，立場不一。幾乎所有的基層女性的家人並沒有反對她們和香港人結婚以及到香港生活。Ma(2006)曾表示 90 年代透過媒體和親友的接觸，對於內地來說，香港就是現代化的想像，教導著內地民眾何謂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生活。2000 年之後，中港互動的增加以及兩地差距收窄，對於內地民眾來說，香港不再有神秘感，內地對香港的想像轉以全球性的高階消費階級作為慾望對象。尤其當「自由行」的普及，不少內地民眾和這些內地女性在移居香港前都曾透過「自由行」到港旅遊，增加了對香港的認識，也改變了早年對香港的想像，不過，即使內地女性對香港的認知有所改變：「香港也有粗鄙的低下階層」、「我已經見過阿姨住的地方，知道會很窄」，也未有阻礙她們到港生活。城鎮的居民似乎對香港的印象沒有太多的改變。桔梗用「福地」來形容香港，她認為對於一些內地的親屬來說，香港仍然是一個充滿機會，而且可以得到社會福利的地方。縱然香港和內地的經濟差距已縮小，對於一部分農鎮的居民來說，香港仍然是一個具有美好生活想像的地方；這也反映了，當內地配偶來自較農鎮，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可以轉移到香港基層男性。

相對來說，高學歷的內地女性家人對於女兒到港生活，或者和香港人結婚都有些擔心。其中，近年來香港市民對於內地人的負面態度讓內地家長格外小心：

他們現在不願意過來，因為雨傘運動期間以至以前反水貨客，有大陸很多媒體特別誇張地報導，讓內地人看了很害怕「香港怎麼突然變成這樣」，他們感受到當中的不友好，我父母覺得別人不想我們去，為什麼要去呢?(傘樹)

可能是他們受媒體的渲染，之前消息很多嘛，他們會覺得如果這個地方對大陸不友善的話，我的生活條件會比較辛苦，工作壓力會很大呵，會怎樣之類...(油桐)

內地城市父母透過媒體接收到香港和內地的政治緊張關係，而兩地民眾之間也充滿了矛盾，因而擔心內地子女在香港遭遇困難。除了政治因素，生活條件讓內地城市父母擔心。傘樹的父母來香港探望女兒的時候，得知女兒在香港居住的環境不如上海，讓他們心痛傘樹。後來認識了傘樹的伴侶，覺得他「很乖、脾氣很好，各方面都很大體」、「父母覺得他很疼我」，兩人得到家人的同意在 2010 年結婚，不過，父母對於傘樹未來生活的憂慮未有減少。另一位內地高學歷女生桂花的家人，對於桂花婚後的生活保障也有所擔憂：「她們最開始的時候不是很贊成，他們覺得羅漢松的經濟很一般，家裡是完全依靠他供養的，他畢業了就撐起了整個家庭，家庭負擔很重，他們擔心我會辛苦」。在「上嫁下娶」觀念下，即使男女的經濟能力相約(例如桂花和羅漢松)，男性養家能力仍然被期待必須比女性伴侶強。在中國經濟日益提升的當下，內地的城市父母未有放鬆對女婿經濟能力的要求。

參考夏曉鵬(2002)的研究，跨國婚姻的兩國之間，處於國際位置的優勢為核心和半邊陲國家的低技術男子帶來了結婚優勢，以至於這些原本在本國無法娶妻的男子轉而到半邊陲／邊陲國家尋獲婚姻。如今，內地父母對於香港男性經濟能力的擔憂顯示了：一)國際分工和國際位置並不是僵固凝著，因應著國際形勢和全球分工而隨時有所調整；二)中國內地經濟在最近十年的發展大有進步，尤其一、二線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已經追趕上來，加上亞洲其他城市向全球城市的模式發展，香港的在亞洲金融中心位置已受到挑戰，以至於香港的國際位置優勢也有所下降了；三)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男性如同香港的國際位置一樣，並未如 90 年代般具有優勢，對於內地農鎮居民來說，香港仍是具有生活保障的「福地」，香港男性在內地農鎮的婚姻市場仍有優勢；相對來說，香港男性的優勢在內地城市的婚姻市場已隨著當地經濟和生活水準的提升已相對減少，所謂的香港國際位置優勢是相對於內地個別女性/家庭而言，甚至有部分內地城市居民認為，相對於中國，香港已經沒有國際優勢可言，香港現在只是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子女在談婚論嫁之際，還是要小心考慮男方的個人經濟能力。另外，內地男性似乎未有得到中國內地新的國際位置的優勢，當內地男性和香港女性結婚的時候，香港女生的家人和朋友有不少的憂慮，以下部分將會詳述。

貳、家長對男性配偶的經濟擔憂

香港受訪者落羽松、茉莉和桔梗的父母知道子女的結婚對象來自內地，不約而同表示不喜歡，有的表示擔心對方品格不好，有的擔心子女受騙。茉莉媽媽對於女兒要嫁給內地男生有很多疑慮，她對於內地的印象停留在落後、不發達、危險「你去那會把你擄賣了」；另外，媽媽也會擔心茉莉未來生活的保障，所以很反對茉莉和馬尾松結婚：

我明白他們的想法，家人會覺得大學畢業，不期望你找個很出色的老公，可是他們會奇怪為什麼要找一個內地男生呢？當然，他們這樣想是不對的，內地男生又如何？可是，很現實地去想，可能他們會覺得，香港男生再差勁也會找一萬多兩萬薪水；那內地男生他在內地有多少薪水，沒有一萬耶。除非找到好像山西煤礦老闆般有錢的，就可以讓他們覺得內地(老公)也很好。我覺得人有一點向錢導向也是很正常的。(茉莉)

茉莉和馬尾松雙方在教育程度和薪水各方面都有差距，就連內地伴侶馬尾松的父親也在猜疑：

爸爸開始的時候肯定不相信覺得不靠譜，覺得我跟這個女孩差異太大了。記得那會兒我剛告訴他我結婚了，我爸跟我講了好幾次，總之覺得不相信。有一個晚上 1 點多給我發短訊，「這是真的嗎？是不是假的、騙人的？」我可以理解，因為農村嘛，覺得我跟這個女孩差距確實太大了，咱們要是娶個縣城肯定沒問題，要娶個安陽的、鄭州的、北京的、你就覺得不可思議了，你娶個香港人更是... 因為香港人在普通內地人眼中的位置很高，70、80 年代的文化對大陸的影響也很大的，但是這幾年內地發展得比較快，像北京、上海他們就覺得跟香港不怎麼有差，可是很多農村人還沒有是沒有改變對香港的印象，人家還是香港大學的研究生，農村裡特別我爸看重學歷，就覺得唉... 我又是一個剛開始念了一個專科，不來續一個本科，就覺得高攀了。我剛開始結婚前 1、2 年我爸很擔心，覺得我倆婚姻不能維持。(馬尾松)

由此可見，兩地的發展差異和男女雙方的學歷差距，構成人們對於一段中港婚姻的真偽和婚姻關係穩定與否等的想像，尤其當女方的各方面條件在眾人眼中都比男方的優勝，社會大眾更會質疑他們結婚的動機，茉莉的朋友也勸告茉莉要三思：「當我和朋友介紹的時候，他們會有側面的 feedback，呵…你要想清楚哦，網上很聊得開覺得很合是一回事，結婚是一輩子的事喔。你想想，他來香港能否找到工作？以後孩子是說普通話還是怎樣……」，父母和朋友種種的質疑和在經濟的壓力下，讓茉莉陷入了糾結，一度想要取消結婚：「結婚好像很多事情都無法解決，好像金錢和父母的反對。加上一直以來，我都很逞強，跟朋友介紹時會覺得難以啟齒，我要如何去介紹他是內地人，畢竟嫁內地人好像很不濟」。

茉莉和馬尾松在第一次碰面以後都是以網絡和信件往來，加上，他們從認識到結婚在半年內發生，社會上對於非親身互動、短時間的交往抱以懷疑的目光；加上「上嫁下娶」的觀念對於長輩的影響深遠，當女性各方面的能力都較優勝的時候，人們認為這種不符合「同質婚」(homogamy)(內在因素差異最小)的「上嫁 / 下娶」(marriage gradient)(外在因素價值總和最大)的配對，是理性思考不足，要再想清楚。另一方面，在基層的中港婚姻中，大部分內地女性卻被認為過於計算，以感情交換物質或者香港公民身份，這無疑是兩組明顯又有趣的對照，這些中港婚姻的問題不在於是當事人理性不足還是過於計算，而是一方面是未有符合社會對「上嫁下娶」的想像，另一方面非「上嫁下娶」的婚配模式凸顯婚姻中一直都有經濟和交換的因素，引發現代社會的焦慮。再來，像茉莉和馬尾松的女高男低的配對，挑戰了性別角色的規範，搗亂了「男性氣概」和「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不過，同時，也因此讓他們遭到社會、親友甚至自我的懷疑，可見，性別定型到目前仍然是非常僵化。加上媒體對於內地遊客在香港大肆購買，以及部分行為的報導，營造了一種「不文明爆發戶」的低水準形象，相比之下，香港人守法有禮的文明形象，保持了香港身份的一份優越感，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制度壓迫，讓茉莉和馬尾松的婚姻生活充滿了考驗。

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國際位置有所轉換，香港男性在內地婚姻市場的優勢減少，不過，中國內地(基層)男性並未因中國內地躍升的國際位置而有所優勢。而內地的現代化也未有洗刷停留在香港人早期「落後、危險、不發達」的印象。除了未來生活的經濟擔憂，父母也預示了異地婚姻將會加重了女兒的照顧承擔：

他們說，我們一個在香港，一個在深圳，兩地分居，他們不認同。我說這些我都有心裡準備了，他們說不過我，最後就接受了。媽媽現在照顧小孩累了也會說：「你呵，幹嘛這麼辛苦，什麼都自己來，老公卻在大陸享樂、自己吃吃喝喝的。」（桔梗）

相反，已移居到北京生活的紅戒球的父母對於女兒在陌生環境生活顯得更大的擔憂，怕女兒迷路和家居不夠安全，反映了父母對內地環境的不夠現代化的擔心，而對於女兒的物質生活和內地伴侶條件卻未曾透露過什麼憂慮。紅戒球的配偶橡樹家庭經濟優越，他自己在北京從事工程師的專業工作，加上在北京四環已置了物業，兩口子的生活充裕。紅戒球的婚姻可謂「上嫁」婚姻，父母不用擔心女兒的生活保障。內地社經地位優勢的男子在婚姻市場根本不用轉換國家在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已經有足夠能力「下娶」。

中港婚姻透露了兩地人民的締結，不僅僅是兩地發展差距使然，當中交纏了意識型態和實際因素，家人朋友對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婚姻配對的不認同和內地城市父母對香港男性經濟力不足的擔心，尤其突顯了「上嫁下娶」婚姻想像的根深柢固。而這些中港男女即使在家人不認同下仍然結婚成家，反映的不是「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已被鬆動，反而彰顯了「個人自由不可被侵犯」的價值觀在當今兩地社會的盛行，父母即使不同意子女的結婚對象選擇也沒法或者不會作出直接干預，正如第一節所說，父母以軟性勸導和恐嚇的方式提醒子女，事實上，兩地年輕人的婚姻決定仍然摻雜了父母的意見。雖然，「上嫁下娶」婚姻想像根深柢固，不過，仍然有一些中港婚姻在挑戰社會對婚姻的想像，其中夫妻的家庭分工和家務勞動將在下一章詳細探究。

第三節小結

國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幾十年中，人民的親密關係和婚姻觀念都有所改變。市場經濟強調的個人自主，令中國年輕人不以結婚為前提的發展親密關係，加上國家對人民生活保障的退場、以及社會對「剩女」的污名，這些社會現象和國家的制度改變，加劇了人民(尤其父母)對於(子女)婚姻的追求。個人自主的實踐和婚姻的實際因素交替地影響著年輕人，受訪的中港年輕男女在發展親密

關係中，遇到「合適」的婚姻對象也會結婚成家，而「適合」感覺其實源自於非常具體的條件要求，對方符合愈多條件就是愈適合，其中包括了個人特質，對方的行為能否傳遞「真心真意」以及表示對建立家庭的承諾(負責任)等等。兩地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尤其(小)資產階級女性對於婚姻伴侶的選擇，有更多的關注在於雙方的價值觀、喜好和雙方互動。其中，婚姻伴侶選擇和階級品味相關，兩人社會位置愈接近，其階級品味愈相近，中港夫妻的同質性愈高，相處愈為融合；相反，中港夫妻的異質性愈明顯，日常生活的衝突也愈多。戀愛、結婚充滿了不確定性，婚姻有時會被用作突破關係瓶頸的一個方法、手段。對於中港家庭來說，結婚更是「家庭團聚」的前提，由於單程證制度建基於血緣和夫妻關係，唯有透過國家認可的機制才可以具資格申請「家庭團聚」，中國內地的移出制度是中港婚姻一個重要的催化劑。

中國經濟起飛，內地和香港兩地的經濟和現代化差距縮小，尤其大城市居民對於香港的印象已大不如前，而農鎮的居民對香港仍然持有90年代的優異印象。

「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根深柢固，男性仍然被期待要「養家」、能力比老婆強，兩地差距收窄後，香港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已不能彌補男性的個人條件的缺失；惟有當內地伴侶來自農鎮，保持較大的兩地差距，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才得以彌補香港基層男性的不足。中國的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無法轉移到基層和小資產階級內地男性，當出現女高男低、非「上嫁下娶」的中港婚姻配對，兩地父母都會懷疑婚姻的真偽和持續性。父母和年輕人的不同婚姻觀念和婚姻實踐，見證了刻板的性別分工、「同質婚」的「上嫁／下娶」配對的追求，以及個人自主在兩代人之間的角力。

第七章不一樣的性別分工？

儘管兩地的經濟轉型和移民政策的修改，持續為兩地男女(近年尤其多了高學歷人才)提供相知相會的平台和機會。中港兩地經濟差距縮小，中國在國際分工趨向核心位置，「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仍然影響著兩地人民，男性仍被期待各方面的能力比妻子強，中港夫妻間的權力關係是否仍然是男強女弱？當內地和香港女性經濟能力已大有提升，對性別分工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過去的研究(Li, 2002；王和田, 2006)顯示在「上嫁下娶」的跨國／跨境婚姻中，個人經濟能力對於夫妻間的權力關係甚有影響：作為家庭的主要經濟提供者便擁有愈大的決定權和成為關係中的主導者，以至於在家務分工上有更大的議價力。以下將會把受訪的中港家庭分成香港夫內地妻的基層中港家庭和高學歷中港家庭，以及香港妻內地夫三種婚姻配對來探討他們在家庭分工和家務勞動的狀況，從而了解「上嫁下娶」和非「上嫁下娶」的中港婚姻其權力關係的轉變。

第一節基層中港家庭的分工：「真的很辛苦」

壹、沒有薪酬的工作

根據香港統計處的資料，每年約有 4 至 5 萬新移民持單程證到香港定居，2014 年有 40,496 名內地移民持單程證到港定居，是最近十年人數最少的一年。新來港人士當中以女性為主，佔了整體的 50% 至 70%。10 年來，新來港女性的平均年齡維持在 32 歲至 34 歲左右，其中大部分是來港與丈夫團聚。而新來港男性的平均年齡維持在 28 至 34 歲，當中超過 6 成與父母團聚，與伴侶團聚的維持在 10%-16% 左右，已婚內地男性到港定居的比例遠低於內地女性(受訪者中只有 2 位內地男性申請了單程證到港家居，比例與官方資料相約)。

透過單程證來港團聚的中港家庭，在證件審批期間，這些內地女性因為未有居留身份未能在港工作，加上承擔了家中的照顧責任以及至於後來在港定居時也未能進入有酬勞動市場，經濟上只能從屬於家庭，而這些基層中港家庭多數由香港丈夫擔當主要的有酬勞動者，承擔家庭開支，組成了「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據香港統計處 2015 年的一份調查⁹²(下稱：56 號報告書)，香港女性

⁹²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 56 號報告書 (2016 年 11 月 4 日上網，取自於香港政府統計處：

平均每天用 2.2 小時做家務和照顧家人，而男性只用 0.7 小時；女性家務勞動者每天從事無酬家務勞動更高達 5.7 小時。新移民女性來港生活，日常主要是照顧老幼、包辦家庭的大小雜事。2011 年，新移民人口中有 50.2% 為料理家務者，當中 99% (即 35,511 人) 都是女性。相較於全港家庭，新來港家庭有更高比率和其他親屬同住，持單程證來港的受訪內地女性中，除了有兩位來港後住在劏房 (兩位香港丈夫的父母都不在香港)，其餘三位受訪內地女性 (黃槿、龍柏、白千層) 都是先與丈夫、公婆及其他親屬同住，並會協助日常家務及照顧小孩。家居清潔、洗晾衣服都是基本的家務工作；至於料理方面，由於飲食口味不一樣，龍柏和白千層的婆婆會負責做飯，她們有時只要為小孩和自己做就可以了；而黃槿和上班的婆婆則會分工，婆婆買菜、黃槿做晚餐。而其他非與家人同住的受訪者木荷、鳳凰木都會包辦了家居清潔、洗晾衣服、採購、料理和小孩照顧等工作。

提起照顧小孩，初為人母的女性受訪者表示感到吃力，無論小孩在什麼階段都有照顧的困難，像是照顧新生兒，鳳凰木就講到：「要照顧她真的睡不夠，晚上白天都在照顧她，真的很辛苦。她外婆回去鄉下了，我自己一個人照顧她，2、3 個月的時間，我已經瘦了下來，只有 90 多斤」。再加上居住環境擁擠，為了避免小孩哭鬧吵到其他家人，白千層每逢晚上都要把小孩帶到街上，哄他睡：「時間都用在兒子身上，他出生就很難照顧，他整晚都在吵，我晚上都沒得睡。房子有這麼多人住，我只好抱他到樓下。我以前整天都在 XX 銀行那條樓梯坐，從晚上坐到零晨 3、4 點，等他們家人睡了，兒子也熟睡了，我才敢帶他回家」。小孩上了幼稚園、小學，英文讓基層內地女性感到困擾，白千層說：「有次小孩跟我說：『媽媽呵，老師說我 school-bag 很髒呵』，『吓，什麼很髒?』，他就把書包扔過來，『我書包很髒呵』，原來書包是 school-bag，我到現在也不會」，龍柏指導小孩作業更甚：「教他作業很煩，他一年級，我還可以教；現在到了二年級，他問我：『這個字什麼意思』? 糟了，我真的不會，只好查字典，真的很難教呵」。

縱然有部分內地女性與丈夫家人同住，可是，不一定得到他們 (例如婆婆、公公) 的長期和穩定的協助，分擔照顧小孩的責任，讓她們可以安心工作。黃槿和婆婆公公的關係良好，她有事要外出，公公可以幫忙看看小孩，不過，由於公

公不能長時間照顧小孩，黃槿要很快回家。龍柏、白千層和公婆還有其他人同住的時候，都沒有得到協助，白千層表示他們甚至「抱也不抱孫子」。內地女性無可奈何之下，只好轉而向家鄉的父母尋求協助，一種是請父母持三個月的簽證(雙程證)來港幫忙，另一種是內地女性回鄉求助：

那時我和小孩留到半歲才回香港，因為在香港待遇很差，回家爸媽照顧得好點，幫忙看看小孩，不然哪有人幫忙，回到家有爸媽幫忙。我爸很開心，「嘩，你看，很像我女兒」，加上我又是獨生的，所以他們特別開心。我爸是農村男人，你知道的，會有些大男人，不過很疼傘樹子，會經常照顧孫子，幫忙看著他，可是，公公、婆婆怎麼會做這些事呵，他們連抱也不抱。(白千層)

內地基層女性在港生活的時間，承擔了夫家的無酬勞動，就算與其他家人同住，未必可以得到協助，尤其在小孩照顧的部分，遠在家鄉的父母反而是惟一的分擔者。

新來港女性要踏足參與香港的勞動市場其實並不容易，除了兒童照顧的安排，她們必須先取得身份證。單程證申請時間長，內地配偶會有 4、5 年的時間以探親用途的雙程證在港居生活，這段時間內地配偶是無法合法地工作。黃槿便曾有朋友請她幫忙做替工，不過，擔心被發現了會影響單程證的申請，她只做了幾天就沒有再去，也不敢告訴其他家人。不單止無法工作，就連培訓課程也不具資格，內地配偶除了在家做家務、照顧小孩，持單程證的受訪內地女性幾乎在港短期居留期間都有做志工的經驗。鳳凰木在劏房的樓梯看到福利團體的海報宣傳，認識了團體便開始做義工：

因為我們不認識(香港)很少去街，而且也不知道問別人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我沒有拿身份證前都會去做志工，時間過得快一點，去了工作就沒有太多時間做志工。劏房附近有很多社區中心，我會幫長者做飯，有時幫忙去發傳單，有時去跟小朋友玩遊戲。(鳳凰木)

在陌生的環境，這些受訪女性除了待在家裡，很多地方都不認識。參與志工活動

不僅充實了她們的生活，對於她們來說也是一種肯定。木荷在家鄉江門做了二十多年的車衣女工，練得一身本領，有空就去福利團體幫街坊補衣服、換拉鍊，她覺得來到香港可以再次做衣服有一種不能言喻的滿足。訪問期間，有其他志工請教她車衣的問題，木荷都微笑著教導，並主動分享心得和建議。木荷後來告訴我，在香港滿是荊棘的生活，唯有在這裡感受到姊妹的支持和鼓勵。做志工也是她在香港結網開展生活的一個台階。

內地配偶在港的社交網絡、人際資源受限，志工的平台開拓了她們在港的網絡，在情感上和資訊上得到更多的幫忙：

我從小孩幼稚園就開始做志工了，小朋友回學校放下書包在禮堂會有活動讓他們玩，好像滑滑梯之類的，我們負責看著他們的安全和維持秩序，學校有時去參觀和旅行，我們就跟著去，幫忙看著他們玩。當時所有老師校長都很信任我，小孩剛升小一，幼稚園校長還有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再去做義工，新的沒上手叫我們舊的去幫忙。我有時間就會去，其實也滿不錯，可以知道學校發生什麼事，知道學校的運作，自己就看著辦，對小朋友也是好的。（龍柏）

如果說家務勞動是私領域的無酬勞動，那麼公領域的無酬勞動便是義務工作。無酬勞動強調利他精神、無私奉獻，義務工作被視為社區守望相助、互助互愛的精神展現。根據56號報告書的解釋，「無酬活動包括照料家人、為自己或家人做家務、為自己或家人購買貨物／服務、為志願／福利機構及非牟利機構所做的義務工作及為住戶以外的人士所做的無酬工作」。香港大小私人企業、非牟利團體、政府機關無不推崇義務工作，根據香港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的資料，截至2015年12月31日，已登記的個人義工有1,269,245個，其中接近六成(約750,000)是女性參與者。56號報告書的調查也顯示女性(13.5%)在義務工作參與度比男性(9.2%)為高，其中女性家務勞動者(19.7%)是非從事經濟活動者中最經常參與的勞動者之一，更有超過五成女性義務勞動者一年內參與四次或以上的義務勞動，每次義務勞動平均3.4小時。可以想像，女性家務勞動者在社區的義務勞動參與度活躍。雖然到目前未有調查研究內地配偶在香港社區的義務勞動參與狀況，不過從整體女性家務勞動者的參與狀況以及受訪者的經驗，可以估計內地配偶是社工義務勞動的

其中重要一員。

全港性推廣義工活動的另一個平台—「義務工作發展局」把義務工作的資料作了統整⁹³，其中需要服務的社會福利機構類別有不少提供照顧服務，如復康(16%)、安老(12%)、醫療及健康(11%)、家庭及幼兒(11%)等等。配對的義務服務除了大型社區活動，當中有相當部分屬於(社區)照顧項目：例如護送及照顧(8%)、功課輔導(5%)、探訪(4%)、健康護理(3%)、家居清潔及維修(2%)。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屬於殘補式(residue)，尤其強調家庭責任、在家照顧，社會服務以社區支援輔助性質為主；舉例來說，老人身體狀態極度衰弱才可以使用輔助性質的院舍支援服務⁹⁴，由於名額少，直至2013年輪候人數快接近3萬名。再加上社會福利的撥款只有不足三成用在老人、康復、家庭及兒童、青少年等六大服務範疇，公共照顧的效力實際上是微乎其微。而即使福利團體有政府資助，受限於撥款限制，團體無法把支出過於集中在工作薪酬，以致不少服務以義務性質維持，導致出現服務單位需要長期招募義工和呼籲捐款的風氣。更有官方的基金大力推動建立社區資本，不少受資助計劃都會動員社區婦女作為義工。一個2011年開展的計劃⁹⁵，目標之一便是將「照顧家庭轉化為助人家庭」，方法就是招募照顧者成為義工，教授他們不同的照顧技能，培訓了的義工向其他照顧者提供上門看顧服務(如：陪診、陪購物、簡易復康運動、緊急托老等等)。在互助互愛的包裝之下，大量的社區義務勞動正正突顯了追隨自由市場的香港，當下面對公共福利退場，照顧市場化的困境，被貶抑的家務勞動和被讚頌的義務勞動正好填補了公共照顧需要的空隙，而不少從事無酬勞動的正正是被主流社會當作「別有用心」的移民。

貳、履行性別角色的壓力

部分基層內地女性對於自己做為家庭的消費代理或者持家的角色並不抗拒，即使大部分基層家庭的收入有限，如何勤儉持家成為內地女性的任務：

⁹³義務工作發展局 2014-2015 服務年報 (義務工作發展局，2016 年 11 月 3 日瀏覽)

⁹⁴社會福利署署長聶德權在「香港安老院舍服務發展方向」研討會的致辭時就再次重申香港的安老政策方針：香港特區政府的安老政策一向是「居家安老為本，院舍照顧為後援」，並秉持四項基本原則，即「鼓勵居家安老」、「提倡持續照顧」、「集中資源協助極需援助的長者」及「推廣積極樂頤年」去推行和提供安老服務。(2013年4月30日)

⁹⁵資料來源：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http://ciif.cd-preview.com/download/tc/social-captial-development-projects/approved-project-list/17_projsun_0021.pdf (2016 年 12 月 12 日瀏覽)

那時我出來了(香港)，他也只是給我3千塊，3千塊很少呵，那你還要求他買什麼，反正一起過生活就是了，他給得少就省著用。他有時候知道錢差不多用完，就會問我『還夠不夠用呵』。他猜到的，3千塊在香港一個月怎麼夠用呵，就多給3百塊，他不會給很多，他都很省的。(木荷)

木荷和老公住在劏房，老公是做「三行」的零散工，日薪三百多港幣，收入不穩定。木荷平常要想辦法用這三千塊應付衣、食、住、行所需。為了省錢，木荷在香港的日子從來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

正如 Li(2002)的民族誌顯示，有部分香港男性認為內地女性更願意扮演傳統妻子的角色：服從丈夫，任勞任怨照顧丈夫和家庭，以及作為兒童照顧者。事實上，有香港丈夫及其父母在日常生活不時流露了對內地女性作為「順服妻子」的期待：

他離了一次婚，單身了幾年，他家人就說年紀大了就找一個伴，他家主張很傳統鄉下人的思想，找一個老婆回去，要聽話、照顧你、侍候你。可是我不是呵，我不是來做工人照顧你、侍候你，我有自己工作，我有自己時間，我有自己空間，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我不是你今晚要回來，我在跟朋友喝茶，在工作什麼的都要丟下來回家煮飯給你吃。大哥，不是這樣的！你說褲子破了要給你補，不是你說補，我就馬上補，我要找時間，有空就幫你補。可是，他不是這樣想，我只要不馬上幫他補，他就說我不聽話，他爸媽就說，「幹，娶這樣的老婆回來幹什麼...」。(白千層)

白千層並非如老公的期待去做順服的妻子，她努力地在日常生活中保護有限度的自主，家庭關係因為「好老婆」的角色期待變得緊張起來。性別角色要求個體表現出符合特定性別範疇的行為，如果表現出不符合屬性的行為，便會受到社會、文化或者其他系統(例如學校和家庭)的抑制、貶抑、歧視、甚至打壓。而「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不但要求女性要服從丈夫持家有道，同時也規範了男性「要當家」，如果無法成為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這些男性也會承受壓力：「她認識了我幾乎不用工作，她去讀書，每個月有足夠的錢給她用，不知多開心。來

了香港，要她去工作，上班4小時，我自己也不開心，我是一個男人，要女的出來工作，你說心情會如何？！（銀柴）」

在刻板的性別角色規範下，男、女同時承擔著要表現出符合性別屬性行為的壓力。「公」「私」領域的劃分，不但限制了性別分工，也貶抑了「私」領域的所有勞動。「工作」是「男性化」(masculinity)的場域，「家庭」是「女性化」(femininity)的具體象徵(Oakley,1992，轉引自顧燕翎，2000)；男人在公領域從事有薪工作，女人則在私領域從事無酬家務勞動，女性主義者 Ehrenreich(1992)批判這是一種歷史和社會的建構。

參、生產和再生產的兼顧

基層家庭無論在經濟和社會資本方面相對薄弱，以致當有家庭成員(尤其主要的生計承擔者)遭受外在因素影響，例如裁員、生病、死亡、離婚，這些家庭生活狀況便會遭逢巨變。鳳凰木的丈夫被裁，自此患上情緒病失去工作能力；龍柏的丈夫突然失蹤；木荷的丈夫在農曆新年突然暴斃；白千層被家暴需要離婚；已是香港公民的小孩(及丈夫)，可以透過社會福利援助而不致於立即跌入極度困難的狀況，而新來港配偶雖然大多數時間被視為香港男性公民的從屬(例如移民制度)，可是在社會福利方面卻被個人化來處理，例如新移民受限於居港年期的限制，2014年之前不符居港年期7年的要求，她們很多時難以得到社會福利的協助。同一個家庭，唯獨新來港女性得不到公共援助，縱然社會福利資源和婚姻及血親關係綁在一起，新移民家庭成員因「外來者」的身份被視為不具有資格被排除在系統之外，可見社會制度刻意區分「外來者」和「自己人」的身份，以區隔什麼人可以分配到社會資源。

「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模式並非一成不變，當家庭狀況有所改變或者家庭經濟出現困難，即使這些移民女性在兼顧子女、丈夫的照顧責任之下，只好進入到彈性化、低薪、零散化工作，以幫補家庭開支。而高學歷內地女性及在港居住的香港妻子內地丈夫這些家庭，通常夫妻兩人都從事有薪勞動，而高學歷內地女性及丈夫均在港從事專業工作，其家庭的經濟狀況相對穩定。

大部分新來港家庭及新來港女性的經濟狀況在香港社會屬於弱勢。10年來，新來港家庭的平均收入較低；2011年，當全港家庭的每月收入中位數高達\$20,500港幣，新來港家庭的月入中位數約是\$8,000港幣。2011年，17萬新來港人口有4

萬 4 千新來港女性和 2 萬 1 千新來港男性進入勞動市場；不過，他們的每月收入維持在\$7,500 港幣的水平，比全港的人均收入\$12,000 港幣的水平差距甚大。而新來港男女的工資也甚有差距，新來港女性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年為 7,000 港幣，較男性的 9,000 港幣為低(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2014)。

新移民女性家務料理者整體人數一直在下降，直至 2014 年只剩 11,233 人。下降的趨勢除了是受到移入人口數量減少的影響，另外顯示了愈來愈多新來港女性參與經濟活動(不過，不代表她們可以減少參與家務勞動)。香港的貧富差距大，愈來愈多底層家庭難以單人的薪水應付家庭開支，加上新來港人士又難以取得社會福利及支援，導致新來港女性擔當生產和再生產的雙重工作。而在進入勞動市場之前，她們都要找到替代照顧小孩的支援。即使新來港女性即使加入了勞動市場，工作待遇和工作條件並非理想。移民女性面對的不但是性別分工和同工不同酬等的限制以及剝削，還有各種的歧視。

就在鳳凰木和女兒來香港定居前，身為主管的丈夫銀柴被公司裁員，生活壓力下，銀柴得了抑鬱症，醫生診斷不能連續工作六小時，反覆嘗試之下都未能找到可以養家的工作，一家生活面對重大挑戰。在社工協助下，銀柴和小孩得到了綜援，而鳳凰木當時受限於來港生活不足一年的因素未能同樣獲得綜援協助，簡單來說，兩人的綜援金一家三口來用。眼看家庭經濟拮据，鳳凰木取得了香港身份證，隨即在住所附近找了兼職工作，小孩上學她就上班，不過，時薪只有三十塊。老闆不信任新移民，經常會監督鳳凰木有沒有偷懶，又會找她做別人做過了的工作。後來在丈夫朋友的介紹下，去了一家茶餐廳工作，鳳凰木覺得工作節奏很快，尤如打戰般緊張；客人走了，要馬上去收拾，緊接著又有客人進來了。生活艱難，鳳凰木還是一步一步地沉著應對著：「香港的消費是高的，要在限定時間出去工作賺點錢才可以減輕家裡的負擔。這些都不是想不想，而是真的需要做，不得不去做」。

不得不去做的還有白千層，白千層在內地做了五、六年的護士，剛來香港的時候還沒有取得單程證，一直以雙程證續期的方式留在香港照顧小孩，和公婆、小叔一起住在公共房屋。在港生活的每一天，白千層和丈夫日夕才相處發現原來伴侶有吸毒、酗酒的習慣，而且屢勸不聽。兩人的關係在一次家暴中破裂，從此白千層和小孩搬走並單方面申請離婚。同樣地，受限於居港不足一年，只有小孩得到綜援，白千層唯有請母親用三個月探親的簽注來港照顧小孩，然後自己參加

再培訓局舉辦的課程上課。白千層是少數可以解決兒童照顧安排的新來港女性，她用了兩個月的時間順利通過考核，成為了有牌照的保健員，並開始在老人護理院做替假保健員。

香港再培訓局為新來港人士特別提供了一系列技能提升的課程，除了廣東話、英語的語言課程，還有電腦的使用、本地勞動市場的介紹，以及會特別教授零售和服務業的用語和工作場合對應；官方表示課程內容安排是為了配合新來港人士英語和電腦技能欠缺的需求。事實上，香港再培訓局成立之初的定位是針對香港中年低學歷的失業群，於 2004 年及後在民眾要求下才開始把對象放寬至大專或以下失業人士。不少專業、高技術的課程需要相應的學歷、英文水準以及相關工作經驗才能報讀，例如：金融、保險、投資、會計等。如此一來，補充性質的新來港技能提升的課程不足以讓新來港學員的英文能力提升到以上專業課程的入學要求。學歷、工作經驗認證的阻礙和家庭照顧者角色限制，令多數新來港人士從事彈性的工作，導致她們一般參加家居服務、健康護理等課程(例如：家務助理、保健按摩、陪診員、護理員等)，考取相關執照進入勞動市場，為私人照顧市場提供源源不絕的廉價勞動力。課程美其名為新來港人士提升能力，實質是讓新來港人士填充香港非技術服務業空缺。

白千層從前在醫院打吊針、輸液、抽血、送藥、幫小孩做頭皮注射等等的工作，如今在老人護理院派藥、洗傷口、泡奶等工作，實務工作輕鬆了，不過，由於現在工作會用到英文，白千層仍在努力學習和適應。白千層的護士背景讓她的工作駕輕就熟，加上私人老人照顧單位的薪水不高，工作量大，長期缺工。難得遇到一個好用的工人，老闆邀請白千層成為全職員工，可是身為母親的白千層，凡事都以小孩的利益為前提，沒人幫忙照顧的時候，白千層寧願不去工作自己照顧小孩，因此也只能繼續以代假工的方式上班。其他的基層內地女性黃槿、白千層、龍柏、木荷都提到了無人承按照顧小孩的責任，她們難以抽身工作，有些只能在小孩上小學的時間，從事兼職工作。可以說，大部分的內地女性肩負了香港無酬和低薪的照顧工作。

正如 Sassen(2015)所言，全球城市發展持續產生了兩極化的社會結構：1)在勞動者方面，全球城市出現高級專業及行政人員，以及底層服務業勞工(多是外來移民)；2)在經濟部門方面，產生了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參考 2011 年人口統計，新來港人士在港主要集中在住宿及膳食

服務業(24.3%)，他們從事低技術的工作，較多人從事服務及銷售人員(38.1%)和非技術人員(27.3%)，從事這兩項工作職位的比例均比全港比例(17.5%)、(13.3%)都要高；相反，一些需要高學歷、專業資格、具經驗的職位則只有少量新來港人士從事，投入在金融、公共行政、教育、人類醫療保健及社工活動行業的新移民比例只有 7.7%，不過，三位已定居香港多年的內地高學歷女性分別投身於大專教育、社工、金融這些專業行業。同是來自內地的移民，高學歷內地女性和基層新來港女性被區隔在經濟市場的不同位置。高學歷女性透過人才計劃，在專業或者高利潤的行業發展；經單程證來港的基層女性，不但學歷和工作經驗不受認可，加上照顧責任，造成傾向從事彈性化、零散化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又多數是低技術、低薪，加上勞動保障的缺乏，令這群女性長期以來成為勞動市場最被剝削的勞動力之一。

團結香港基金⁹⁶建議在面對人口老化、勞動力下滑的未來嚴峻挑戰，香港現時吸引內地人才效果不彰，宜每年增加 1 萬 5 千個內地人才名額。此建議隨即引來諸多反響，不少圍繞在專才何以是「國內」而非「國際」，增加人口何以是增加內地人才而非本地生育率，本人無意介入「國族」的紛爭，只是想借此討論提出：眾人對於移民的貢獻局限在香港經濟效益，而根據於此標準，來港家庭團聚的(持單程證的)新移民便被視為無甚貢獻，反而會損害香港福利。事實上，移民在香港的生產和再生產的領域貢獻良多，一直不被重視，官方也未有紀錄任何相關數據；驚人的 GDP 背後由無數家庭照顧者用血汗默默支撐起來的。當社會繼續強化「公」「私」領域的區隔，也就得以繼續貶抑無酬勞動，令到從家庭走向市場的女性被局限在次等工人的位置。Gayle Rubin (1975)認為家務為勞工提供的食物、衣物、住宿等須經婦女在家中再生產才能使用，所以女性生產剩餘價值產品。家務勞動不僅對個別男性提供服務，也是一種廉價有效的方式為資本主義提供再生產勞動力。不但在移民制度、學歷和工作經驗不被認可的系統性排除，形成新移民基層女性在經濟上依賴家庭的狀況，而妻子和媽媽的角色期待加上沒有替代的照顧者，她們在參與生產勞動時必須要兼顧家庭照顧，對於工作種類有更多的考慮，造成基層內地女性一般進入到彈性化的低薪服務業工作，填補了低薪服務業對大量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得以支持高利益的經濟部門運作和全球城市

⁹⁶http://news.mingpao.com/ins/instantnews/web_tc/article/20161031/s00001/1477893775474

的發展模式。

第二節高學歷中港家庭：「我們一起做」

在制度限制和惡劣勞動條件的市場下，新來港女性成為好用、便宜、穩定的勞動力，補充了香港的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市場的短缺。相較之下，幾位高學歷的內地女性，在有酬和無酬勞動的參與與上述持單程證來港的女性狀況略有不同。一方面，這幾位高學歷受訪者擔當專業人士，像是社工、大學講師和翻譯，收入不但可以共同支撐家庭經濟，夫妻兩人的收入差距也不明顯。在家務勞動方面，除了桂花有一年時間住在婆家，那段時間的家務都是由婆婆處理；其餘時間，已經長期在港生活的桂花、傘樹、山茶都是夫妻同住，兩人分擔家務：「家務是一個家的基本組成，無法外包。我們住了兩年，都是自己照顧自己。老公是按興趣，我是按需要，老公做他喜歡做的部分，他喜歡做菜、晾衣服、洗衣服，我就做剩下的部分，家裡有什麼需要我就做什麼。（桂花）」

從桂花的回應可以看到羅漢松主動承擔家事。「可能我們的家真的很小，沒有什麼特別多要處理的，做菜是他喜歡做的事，我洗碗他都會陪我，在廚房陪我聊天」。羅漢松和桂花把處理家務勞動當成是營造親密感的一個行動，連洗碗的家務時間也是一種陪伴。不過，這種主動做家務是根據男性喜愛來分配，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包辦老公不做的家務。

除了男性主動承擔家務，高學歷女性也會要求伴侶做家務。傘樹和老公一起生活後，經歷了一段長時間教老公做家務：

我對於別人做家務的要求是高的，他以前在外國讀書也可以生活，完全沒有問題，他也是很愛乾淨。可是，有時候他在細節上做得一般，我會要求他怎麼做怎麼做，他也願意去嘗試。如果他做得不好，我會覺得「早知道我自己做就好了」，變成說我覺得浪費了時間去教他根本教不會的事。當中有很多的沮喪、不開心，會有矛盾的，不過至少現在完成了訓練的過程。

相信有不少家庭會經歷因家務而起的爭執，高學歷受訪女性會用「商量、協商」的方式來處理。傘樹和老公在協商後，聘請了一位家務助理來協助解決家務問題：

我們現在有請一個鐘點阿姨，一星期來兩次，她會幫忙做清潔，她分擔了很多。這是因為家務問題，我們吵了幾次而做出的一個協定。我們的家務助理可以做很多事情，她做得很快速，她不用三個小時就做好了，我們都覺得合作得很愉快，已經相處了兩年了。(傘樹)

同是身兼工作的人士，男性每天處理家務的時間約有0.7小時，而女性則是2.7小時，可想而知，即使夫妻雙方共同分擔家務，女性仍是承擔了較高比例的家務勞動。而家務外包是都會家庭解決家務的方法之一，2013年香港有32萬外籍家務工為本地家庭提供家庭照護勞動⁹⁷，而按時計薪的本地家務助理的數量也為之龐大。縱然已把家務勞動外包，不過仍然有些工作需要自行處理，例如：傘樹要照顧寵物，山茶要照顧小孩。山茶除了聘請家務工處理日常家務，自小孩出生，山茶爸爸媽媽便會以探親簽注來港照顧小孩，又或者帶小孩回遼寧老家照顧。

「現在，我變成不做家務，很少做家務」。傘樹除了大專的教學工作，還會到內地從事研究工作，她現在忙得不可開交，就算喜歡做飯現在也沒辦法做，只能到外面吃。「我老公現在在家做 freelance，所以，家務方面主要他做了」。傘樹和老公的家務分工因應兩人的工作時間有所改變，如同 Coltrane(2000)所說，妻子的就業狀況對自己與丈夫參與家務的時間有顯著的影響：女性工作時間越長，投入家務的時間越短，而丈夫投入家務的時間或比例會隨之增加。

佟新、劉愛玉(2015)表示共同合作做家務的夫妻當中，他們的教育程度差距和女性經濟獨立程度都會影響丈夫在家務勞動的參與；而妻子會要求、接納、享受丈夫的家務勞動，會有效促進夫妻共同合作做家務。受訪的高學歷的女性表示夫妻雙方都有做家務，除了老公會主動承擔家務，把分擔家務當作是營造和維持親密感的一個行動外；也會有高學歷女性會嘗試要求、教導配偶做家務，以至於會出現共同分擔家務勞動的狀況。這些高學歷夫妻都有自置的居所，和父母分開居住的確會減少日常的照顧，加上他們的經濟獨立，可以用外包的方式把家務交託給家務傭工，無疑讓高學歷女性承擔較少量的家務勞動。不過，即便分工相對減少了，由於性別分工定型，女性仍然是被視為主要的承擔者，包辦丈夫沒興趣

⁹⁷50 號報告指出在聘用家庭傭工的住戶中，有 75%男性和 60%女性不用分擔家務。

的家務又或者子女照顧工作。這不難發現，高學歷內地女性個人資源(學歷、收入、職業)的增加，的確提升她們與伴侶議價的能力，甚至要求對方分擔家務，在強調女性的家庭角色和責任的社會氛圍下，共同分工的模式無疑對性別分工作出稍微的鬆動。

第三節香港妻內地夫的家務分工：「都是他做的」

至於香港妻子內地丈夫的家務分工狀況，到內地定居的家庭和在香港定居的狀況稍有不同。搬去北京的紅戒球和銀樺，還有暫時在深圳和公婆一起住的蒲桃，他們的家庭經濟狀況相對充裕，老公是主要的經濟承擔者，聘請了家務工處理日常家務，香港女性則主要照顧小孩。其餘幾位在港生活的香港女性都有繼續工作，桔梗、木棉和家人一起住，家務一般由媽媽處理。茉莉在香港租了一個單位自住，一般由她自己處理，懷孕以後馬尾松更經常到香港，馬尾松在港的時間都會負責所有的家務勞動。

長期居住在香港的受訪女性，在丈夫取得單程證之前仍然與家人同住，家務分工方面按照婚前的模式繼續由母親來處理；至於小孩照顧方面，桔梗上班時間由媽媽照顧小孩，下了班就自己顧小孩。也就是說，家庭網絡(尤其媽媽)在日常生活上支援了香港女性很多，讓這些受訪女性在等待老公來港團聚的時間兼顧工作和養育小孩。國內一份全國性調查顯示(於嘉，2014)，無論在城鎮還是農村，婚後與老年人居住會減少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尤其是已婚女性和自己母親一起住，每週家務勞動時間更會分別減少3.09和3.55小時，與婆婆一起住每週則減少0.87小時家務勞動時間。由此可見，雖然說女性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可是，在多數同住家庭中，女兒比媳婦得到更多的協助。加上種族和階級的因素，香港女兒、(內地)高學歷媳婦、內地基層媳婦，三者在香港家庭中得到支援的差別待遇就更加明顯，無疑地內地基層媳婦就是得到支援最少的一群。

當夫妻同住的時候，香港妻和內地夫的家務分工就和其他的受訪家庭不一樣。蒲桃生小孩前會比較經常到內地探望老公，家務勞動都是老公處理：

沒有生阿B的時候，也多數是他做家務的，他會收拾、洗衣服、拖地，我很少做這些的。除非他很累、很辛苦，他叫我做，我才去做的。他沒有很累或者生病了，都是他自己做的。什麼都不用我做，現在更不用我做。老

公會主動做很多事，比如說，家裡有什麼用完了，他都會主動地買，我生了阿B之後，他都很自覺地去做，我沒有生阿B的時候，他覺得自己很忙才叫我去做這做那，他現在都會自己去做。(蒲桃)

茉莉懷孕時，老公更常留在香港照顧日常起居飲食：

他在家事情都是他做的，尤其我現在懷孕更不用我操心。他很好，我6點半起床，他比我早起15分鐘，下樓做早餐什麼的。不會有「結婚後，我要煮飯，打掃什麼什麼的」，有人take care自己，當然這個dependence不好，但是，又真的覺得有人照顧很好呵，自己變得懶惰，有時他不在，我都到外面吃。(茉莉)

桔梗生了小孩，老公更常到香港照顧小孩：「我老公會照顧小孩呵，他很在行，他來香港，看到我媽媽辛苦會幫忙煮菜之類的。前一陣子，爸爸媽媽去旅行，他也幫忙照顧小孩一個星期，這方面他是OK的。(桔梗)」

一方面，內地丈夫在香港的時候不需要外出工作，因此有更多時間處理家務和照顧小孩。另一方面，在香港居住的女性持續工作，桔梗和茉莉的收入佔了主要的家庭收入，以相對資源論來說，香港女性擁有更多的交換資源，更有權力使對方從事家務工作。還有的是，這些內地男性更傾向用參與家務勞動的方式表達對妻子的情感支持，尤其當香港女性懷孕、生小孩以後，他們更為主動擔當家務。佟新、劉愛玉(2015)的研究專門分析了促成夫妻合作型家務勞動的因素，發現除了平等的性別角色觀念外，家務勞動具備情感功能，男女雙方都會以分擔家務勞動的方式表達對配偶的情感，男性尤其會在孩子六歲之前(家庭正是在家務繁忙的週期)，用參與家務勞動的方式表達對妻子的情感支持。這些分居兩地的中港家庭，尤其是香港女性內地男性的配對，雖然夫妻都有工作，可是，照顧小孩的責任仍然落在香港女性身上，加上分居兩地，香港女性長期獨力照顧小孩。內地丈夫對香港妻子在家庭經濟和照顧的肯定，轉化成為主動承擔家務的行動，撫慰香港妻子的辛勞。

不過，性別化的分工有著根深柢固的影響力，正如 Major(1993)所言，在性別分工影響下，女性傾向於接受男人賺錢養家，女人負責家事的角色期望，產生

不平等卻又很滿意的弔詭情境。對於目前家庭以非「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茉莉有如下想法：

我們有共識，這只是過渡期，我經常提醒自己，有時經歷 hardship 會有盡頭的。如果我要一輩子想「他一輩子做家庭主夫，煮飯掃地，我就是 bread-winner，我就是養起家的人」，如果我這樣想，關係也不會健康，我每天回去覺得自己要抬起頭看不起他，因為他找不到錢，在家掃地照顧小孩，這樣也不好。我覺得大家都要經歷，這只是一個 transition，有一天他會改變。我有跟他說：「你也不 enjoy 在家做家務工作，是不是？」，他也說是呵，而 reality 他真的還沒取得身份證，那他又可以怎樣，難道去逼他嗎？沒有身份證，我也要他去工作，逼也沒用呵，我們要客觀地看環境，是他不想做，取得身份證天天躺在家也不工作，還是客觀環境，他還沒取得身分證真的做不了，我也要去看看呵。(茉莉)

茉莉把「女主外，男主內」的分工模式視為馬尾松沒拿到身份證不能在港工作的過渡階段，雖然她沒有期待「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不過，她期待的是丈夫外出工作，因為在社會文化方面來說，不工作會構成男性氣概的損害，銀柴患上情緒病不能工作時也曾有類似的焦慮。「大家都 agree 什麼工作也要先去做，就算不喜歡 waiter 工作也要先做，當是 transitional 的 2、3 年也好。早上工作，晚上努力讀書，去取得 qualification 就可以轉換工作。不能說，我想做 professional 工作，但又不去考這些資格。」工作薪水有多少不要緊，再考到專業資格就可以取得專業工作。這種想法，在香港這個自由主義社會非常盛行，認為個人可以通過學歷和努力在社會階梯中取得更高位置(谷淑美、潘毅，2003)。

老公馬尾松對於「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有不一樣的想法：

主要是看女方賺錢多少嘛，她要是一個月賺 1 萬多塊那當然有壓力，2 個肯定要吵架。她現在賺 3 萬塊錢，我們夠花了也不會吵架，我覺得經濟原因是很實際的原因，兩人關係也很有影響。但是經濟因素確實是很大因素，要是兩人現在賺 1 萬多，我天天都要坐著，不天天吵番才怪了，她覺得我累死累活的，想幹啥吃啥都沒有，那肯定就會有火。那現在是有 3 萬塊，

想吃點啥幹啥都有的話就不會了，對於這個時代在變呵，也不一定是以前「男主外，女主內」。兩人既然一起生活，誰的能力高誰有想幹什麼都可以商量，比如說像茉莉也不是家庭主婦型的，那她就去工作，我就在家做飯也行，雖然說起來不好聽，但是生活畢竟是兩個人過的，不是給別人看的，對不對？兩人合適就行，我也知道做男人肯定責任要大，我在家坐著其實也不舒服也會有壓力，但是那你沒辦法，那你怎麼辦？她不能在內地找工作，我在大陸把她一個人扔在這也不行。對於「男主外，女主內」我覺得時代在變，大家不用看那麼重。（馬尾松）

對於家庭角色分工，馬尾松並未有一種固定的分工模式想像，他覺得可以用能力和喜好來決定而非性別，賺錢能力高的就去工作，不喜歡做家務的就由另外一個應付家務勞動。至於「女主外，男主內」的分工模式，他認為收入夠用的前提下，這種分工模式沒有問題。雖然他強調這是兩個人的事，但是他同時認為男人（養家）責任大，不去工作會感到壓力，這反映出性別分工的規訓力量的強大。

第四節小結

綜觀多種配對模式的中港婚姻，家庭分工和家務勞動出現多元化的樣態，社會普遍接受女性外出工作，不過前提是不能影響家內的照顧任務；男性必須要工作養家的想法未有鬆動，性別分工的觀念仍然存在。從基層港夫陸妻、高學歷港夫陸妻和港妻陸夫三種中港婚姻配對模式的家庭分工和家務分工經驗可以看到：香港和內地女性經濟能力提升，從事全職工作的女性其收入對家庭經濟有著重要的貢獻，稍有動搖了刻板的男強女弱的性別分工想像；女性經濟獨立有助於提升家務分工的議價能力。不過，家務勞動仍以女性為主要承擔者，經濟充裕的家庭可以以外包方式把家務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和本地勞動階層女性身上；而基層家庭則由移民女性或者同住母親來處理。另一方面，無論是高學歷香港男性和來基層內地男性更願意主動分擔家務，用以建立關係的親密感和表達對配偶的情感，妻子也會樂意接受並表示讚賞，證實了分擔家務的確能夠達到建立親密感和表達情感的目的。

現代的家庭角色和家務分工是物質條件和親密關係互為影響的結果。同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可是基層中港夫妻和定居內地的中產中港夫妻

同樣承擔了的性別角色期待，不過，基層男女由於物質條件的匱乏和低收入，面臨履行性別角色更大的壓力，例如：基層男性能否「養家」，以及內地女性在實際生活中無法把家務分擔出去，承擔了更高的勞動強度。把分擔家務當作是營造和維持親密感的一個行動，除了跟丈夫的教育程度、性別平等觀念相關以外，作為自由市場的底層工人，工時長薪水低，很多時候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和心力參與到家務和子女照顧當中。對基層工人來說，讓家人得以溫飽就是他的責任和承擔；對於基層女性來說，照顧好家庭是個人價值和自我的肯定。基層男性做不做家務除了跟性別平等意識有關外，也跟工人所承受的血汗勞動的嚴重性相關。

第八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結果

二十世紀前，中國在國際分工上仍然是邊陲國家的位置，香港半邊陲的分工位置彌補了香港男性個人條件不足，讓香港基層男性可以在內地農村找到妻子，香港丈夫內地妻子被視為(空間的)上嫁下娶的婚姻。由於世界體系的分工一直在變動，來到二十一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持續強勁，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港兩地的位置一時之間難以辨別誰高誰低。此研究嘗試在在一個尚未明朗的格局下，探究兩地經濟變化和移民制度對於中港婚姻造成了怎樣的影響。

中國改革開放經濟走向自由市場，香港成為連接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橋樑，回歸後香港角色反而變得被動和依賴中國市場。中港兩地人民在國家經濟佈局中有了更多互動機會，每當推行新一輪的經濟計劃對中港婚姻產生影響。1990 年之後，內地設立經濟特區和香港的去工業化，促成了一批中港兩地男、女工人流動到深圳工作，增加了認識和互動的機會。2000 年後內地經濟特區經歷生產成本的上升，資方把廠房陸續轉移到內陸省市，經濟特區再次轉型，第三產業逐漸擴展，香港在內地的業務從製造業轉移成服務業，向內地市場提供專業的服務。2000 年以後的中港婚姻，愈來愈多內地女性來港前的職業從工廠工人轉換成服務生、文員，此時白領、專業、年青香港男性也有所增加。在吸納內地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發展(中國的)全球城市經濟策略下，2000 年開始香港不斷放寬內地學生到港升學限制，2008 年開始大力推行「非本地生留港就業計劃」，促成了更多內地高學歷人才留港就業，和本地人開展親密關係落地生根。這些高學歷中港婚姻其社經地位也較 2010 年前的中港夫妻要高，夫妻在學歷、收入、職業、年齡等方面呈現高度同質性。

二十一世紀，亞洲多個城市積極向全球城市模式發展，想要在國際占一席位，香港面對其他亞洲城市的競爭，積極推行人才計劃，希望藉著寬鬆的人才移入管道，吸納更多人才提升國際競爭力。然而眾多人才計劃成效一般，內地學生來港就學然後留港工作的增幅最為明顯。內地學生畢業後，紛紛投入香港生產總值最高的行業，包括：「進出口、貿易、批發及零售」、「公共行政、社會及個人服務業」、「金融及保險」。如同 Sassen (2015)所言，全球城市發展持續產生了兩

極化(polarization)的社會結構，產生了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以及低利潤的非正規經濟部門。高利潤的專業服務部門需要大量廉價的服務業部門來支撐各項庶務工作，而低薪、零散化的庶務工作則由基層移民女性來承擔。基層內地女性透過家庭團聚途徑申請單程證到港生活，學歷和工作經歷認可的障礙以及家庭照顧責任，讓這些移民女性只能在服務業從事零散、兼職工作。人才計劃和單程證猶如一個輸入內地移民的雙管道系統，分別把高學歷女性和基層女性輸送去香港兩極化的生產部門，支撐著香港的全球城市發展。不過，由於內地和香港在國際體系的位置仍在變動中，有內地高學歷人才不願意放棄國內戶籍，反而使用便利的工作簽注留港工作(而非成為公民)，以保留彈性之身留待日後再決定公民身份。這也就更可以反映了現在中港兩地的國際分工位置晦暗未明的狀態。

在尚未明朗的格局中，到香港定居的內地女性比起早年的移民女性無論在學歷、社經地位較為優勢。中港男女的社經背景差距縮小了，尤其資產階級的兩地女性經濟力有所提升，對於家庭分工和家務分工的議價力甚有影響。中國經濟起飛，內地和香港兩地的經濟和現代化差距縮小。即使男女的經濟能力相約，男性仍然被期待「養家」、能力比老婆強，可見「上嫁下娶」的婚姻觀念根深柢固。香港男性的優勢在內地城市的婚姻市場已隨著當地經濟和生活水準的提升已相對減少，所謂的香港國際位置優勢是相對於內地個別女性/家庭而言，大城市居民對於香港的印象大不如前，香港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已不能彌補男性的個人條件的缺失；相反，農鎮居民對香港仍然持有 90 年代的優異印象。惟有當內地伴侶來自農鎮，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才得以彌補香港基層男性的不足。

內地社經地位優勢的男子在婚姻市場根本不用轉換國家在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已經有足夠能力「下娶」。中國在國際分工位置的優勢無法轉移到基層和小資產階級內地男性，當出現女高男低、非「上嫁下娶」的中港婚姻配對，兩地父母都會懷疑婚姻的真偽和持續性。雖然中港婚姻女高男低的配對挑戰了性別角色的規範，搗亂了「男性氣概」和「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可是，同時遭到社會、親友甚至自我的懷疑，可見，性別定型到目前仍然是非常僵化。

社會文化和國家的制度改變，加劇了人民(尤其父母)對於(子女)婚姻的追求。個人自主的實踐和婚姻的實際因素交替地影響著年輕人，受訪的中港年輕男女在發展親密關係中，遇到「合適」的婚姻對象也會結婚成家，而「適合」感覺源自於具體的條件要求，其中包括了個人特質，對方的行為能否傳遞「真心真意」以

及表示對建立家庭的承諾(負責任)等等。兩地女性經濟能力的提升，尤其(小)資產階級女性選擇婚姻伴侶時，會有更多的關注在雙方的價值觀、喜好和互動。事實上，婚姻伴侶選擇和階級品味相關，兩人社會位置愈接近，其階級品味愈相近。造成了中港夫妻的同質性愈高，相處愈為融合；相反，中港夫妻的異質性愈明顯，日常生活的衝突也愈多。父母和年輕人的不同婚姻觀念和婚姻實踐，見證了刻板的性別分工、「同質婚」的「上嫁下娶」配對的追求，以及個人自主在兩代人之間的角力。

從多對受訪中港夫妻的經驗可以看到社會普遍接受女性外出工作，不過前提是不能影響家內的照顧責任；男性必須要工作養家的想法亦未有鬆動，性別分工的觀念仍然僵固。香港和內地女性經濟能力提升，從事全職工作的女性其收入對家庭經濟有著重要的貢獻，稍微動搖了刻板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想像；而女性經濟獨立有助於提升家務分工的議價能力。不過，家務勞動仍以女性為主要承擔者，經濟充裕的家庭可以以外包方式把家務轉移到第三世界國家和本地勞動階層女性身上；而基層家庭則由移民女性或者同住母親來處理。另一方面，高學歷香港男性和來基層內地男性更願意主動分擔家務，用以建立關係的親密感和表達對配偶的情感，妻子也會樂意接受並表示讚賞，證實了分擔家務的確能夠達到建立親密感和表達情感的目的。

第二節反省及未來研究建議

香港官方現有的跨境／跨國婚姻數據只有呈現中港婚姻相關資料，尤其持單程證來港團聚的數據相對豐富。一方面，香港和其他國家／地區的婚姻數量和配對模式都未有放在公開的統計數據庫，研究者難以比對中港婚姻和非中港婚姻夫妻的背景狀況。再來，雖然專才移民或者專才工作簽證的數量可以在入境事務處的資料庫找到，可是其他資料則無從尋獲，簡單如男女比例、平均年齡、行業分佈、學歷、婚姻狀態、有多少比例成為永久居民等等。可見，香港政府對於婚姻移民和專才移民的資料掌握和開放性是非常有限的。縱然香港移民政策和人口政策一直在改變，不同形式的配對有增加的趨勢，中港婚姻的焦點始終集中於基層的香港男性和內地女性的模式。然而，官方對於跨境婚姻的成因及這些家庭的處境並沒有興趣了解，一是只當成是中港融合的政績，二是只看到如何使用移民的人力；由於未有深入了解，即使官方投放到移民服務卻未有對移民的生活有明顯

的改變，反而更招人口實，說是移民占用香港社會福利。Lucy William(2010)在研究全球跨境婚姻時就發現各國在相關統計數字就出現了多方面的問題，例如欠缺了婚姻移民清晰的定義，誰是婚姻移民，以及對於家庭遷移的理論化。

如何定義跨境婚姻的確是鮮少研究會探討的。當我找尋訪談對象的時候就思考了很久，怎樣才算是中港跨境婚姻？我嘗試從與已有的研究著手了解，有關中港跨境婚姻的研究，研究對象主要以婚姻移民為主，也就是說男女雙方婚前分別是中國內地和香港的居民，內地一方於婚後用合法途徑遞移到香港，香港丈夫內地妻子就是普遍的一種模式。有研究把在香港出生和內地出生的夫妻組合歸類為異族通婚(exogamous marriages)，夫妻兩人都是香港或者內地出生的則屬於同族通婚(endogamous marriages)，他們把 2011 年(人口普查)前，來港不足一年的新移民女性和香港出生的男性的婚姻配對定義為異族通婚、中港跨境婚姻，而他們和中國內地居民結婚則屬於同族通婚。除了以出生地劃分，也有用公民身份來區分；有另一個中港婚姻研究，提及一些案例，結婚時兩者都是內地居民，在香港移民政策修改之下，後來其中一方成為了具有香港居民資格的合法移民者，另一方也隨後以夫妻團聚之原因申請移居到港。出生地和公民身份似乎是普遍中港跨境婚姻研究的參考因素。不過，隨著經濟、移民法的修改，現時的中港婚姻模式較早年多元，除了高學歷的中港婚姻，像我這種自小從內地移居香港，如果跟香港人結婚，仍算是中港婚姻？還是我跟內地人結婚才算是呢？而我的身份認同、文化習性的確和內地同輩青年人不一樣，要如何區分呢？在此研究有兩位女性受訪者在兒童時期(12 歲前後)來香港定居，自此在香港接受教育，有一位的身分認同是香港人，另一位則是中國人，他們都和內地出生的男性結婚，婚後分居於兩地。由於前人的研究沒有涵蓋這種類型，我嘗試綜合公民身份、接受教育的地方以及個人認同把以上的受訪者歸類為中港跨境婚姻。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不停變更的當下，對於何謂中港跨境婚姻實屬要作更深入的探究。

定義的疑慮令我不禁在想，跨境婚姻反映的是一種流動的人生經歷，而「跨境」既代表了國家/地方的邊界、兩套不同的出入境管控以及兩個不同的文化或者種族等，當要去劃分締結婚姻的人是屬於哪一邊的時候，是否以一種粗暴的定點方式區分他們的原生地、遷移的時間，而僵化了流動的人生經歷？或許，對於中港跨境婚姻定義的探究其實不是要列出其定義的規條，而是要避免簡化的分類排除了一些新的或者不為人注意的模式。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Giddens Anthony 著、周素鳳譯 (2001)《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Bonaich,Eda and Cheng Lucie (2012) 〈國際勞工流移之理論取徑〉，收錄於夏曉鶄(編)，《理論與實踐的開拓：成露茜文集》，頁 117-174。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叢書。
- Jamieson, L.著、蔡明璋譯 (2002)《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Intimacy: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Modern Societies)，台北：群學。
- Sara L. Friedman 著、夏璐,周凱,閻小駿譯(2014)〈當代中國的女性、婚姻及國家〉，Elizabeth J. Perry,Mark Selden 編《中國社會：變革、衝突與抗爭》，167-196。
- Saskia Sassen 著 (1991)《全球城市：紐約、倫敦、巴黎、東京》，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 Saskia Sassen 著、謝孟宗譯 (2015)《大驅離：揭露二十一世紀全球經濟的殘酷真相》，台北：商周
- Stalker, P 著、蔡繼光譯(2002)《國際遷徙與移民：解讀 [離國出走]》，台北：書林。
- Beck, U& Beck-Gernsheim, E 著、樊榮譯 (2014)《全球熱戀：全球化時代下的愛情與家庭》，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
- 丁金宏, 朱庭生, 朱冰玲等人 (1999)〈論城市兩地戶口婚姻的增長, 特徵及其社會政策寓意——以上海市為例〉，《人口研究》，(5)：1-8。
- 丁國輝、林靜雯 (2013)〈女性的經濟角色對家庭生活的影響〉，載蔡玉萍、張妙清編，《她者—香港女性的現況與挑戰》。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140-155。
- 方鳳美著、麥子譯 (2015) 《獨生：中國最激進的實驗》。
- 毛俊響、杜倩(2014)〈單程證申請程序中有關問題的法律分析〉，《“一國兩制”研究》，4：91-97。
- 王明輝 (2006)〈跨國婚姻親密關係之探討：以澎湖地區大陸媳婦的婚姻為例〉，《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9(1)，61-87。

- 王雅鈴 (2015) 〈跨國婚姻中親密關係的發展與經營-新移民女性觀點的探究〉，《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1： 123-128。
- 王蒼柏 (2007) 〈跨境人口問題及其政策意義--基於香港的分析〉，《南方人口》，第7期。
- 田晶瑩、王宏仁 (2006) 〈男性氣魄與可 [娶] 的跨國婚姻: 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臺灣東南亞學刊》， 3(1)， 3-36。
- 佐藤隆夫(1989)。《農村與國際婚姻》。東京:日本評論社。
- 李美玲、楊亞潔、伊慶春 (2000) 〈家務分工: 就業現實還是平等理念?〉，《臺灣社會學刊》，24： 59-88。
- 李靜君 (原文譯作李慶昆)，2000，《深圳勞動力市場的社會組織》，周紅雲編譯，載俞可平等主編《海外學者論中國經濟特區》，中央編譯出版社。
- 谷淑美(2001) 〈移民政策與身份建構—1950-1980〉，《政策通訊》，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第13期。
- 谷淑美、潘毅 (2003) 〈香港公民身份的形成和蛻變—一個理論初探〉，《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6： 115-139。
- 於嘉 (2014) 〈性別觀念、現代化與女性的家務勞動時間〉，《社會》， 34(2)， 166-192。
- 林平 (2010) 〈我的美麗與哀愁: 在中國大陸的單身臺灣女性〉，《人口學刊》，41： 111-151。
- 邵一鳴 (1997) 〈大陸移民對香港人口和社會的影響〉，《人口研究》， 5：34-37。
- 洪理達著、陳瑄譯 (2015) 《中國剩女:性別歧視與財富分配不均的權力遊戲》，台北：八旗文化。
- 洪雪蓮 (1999) 《「內地新來港已婚婦女處境」"質性研究報告書》。香港：荃灣明愛社區中心、荃灣臨時區議會教育工作小組。
- 洪雪蓮、馮國堅 (2006) 〈新來港婦女--女性主義閱讀與實踐〉，梁麗清、陳錦華編《性別與社會工作: 理論與實踐》，175-186。香港：中文大學。
- 胡瑩、李樹苗 (2013) 〈中國當代農村流動女性的婚姻模式及影響因素—基於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研究〉，《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4): 40-47。
- 香港人口政策專責小組 (2003) 《人口政策建議2003》。

- 香港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 (2015) 《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2015》。
- 香港民政事務處 (2015)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的統計數字1992-2015》。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1) 《在中國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1997、2001、2005、2010、2011》。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2) 《2011 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內地來港定居未足 7 年人士報告》。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4) 《1991 年至 2013 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4) 《香港的女性及男性主要統計數字 2014 版》。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4) 《香港統計年刊 1995-2014》。
- 香港政府統計處 (2016) 《香港統計月刊 2016 年 9 月》。
- 香港統計處 (2013) 《香港統計年刊 2016 年》。
- 香港集思會，(2013)。上網日期：2015年8月30日，取自：
<http://www.ideascentre.h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09/02/Cross-border-Marriages-Report-TC.pdf>
- 夏曉鵬 (2002) 《資本國際化與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
- 孫沛東 (2012) 〈婚姻進入的現代性困境〉，《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82-91。
- 孫沛東 (2014) 《誰來娶我的女兒？：上海相親角與“白髮相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耿羽 (2011) 〈關於海外農村女性海外婚姻的考察〉，《中國青年研究》。
- 崔志輝 (2014) 《新來港人士生活滿足感調查 2014》，香港樹仁大學社區研究中心宏及施慈善基金。上網日期：2015 年 6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windshieldcharitable.org/download/report\(2014-1\).pdf](http://www.windshieldcharitable.org/download/report(2014-1).pdf)
- 張少強、崔志輝 (2015) 《香港後工業年代的生活故事》，香港：三聯書店。
- 張育嘉 (2015) 《一家人？異邦人？陸生來台的制度框架與國族劃界》，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位論文, 1-98.
- 曹疏影、鄧小樺編，(2008) 《是她也是你和我：準來港女性訪談錄》，香港：香港婦女基督徒協會。
- 梁漢柱、李劍明、陳曙峯、勞資關係協進會，(2004 年 9 月) 《遷移限制與失序

生命歷程: 內地香港跨境家庭生計策略研究》。上網日期: 2015 年 10 月 30 日, 取自: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0855990_qianyixianzhiyushixushengminglicheng_neidexianggangkuajingjiatingshengjiceeyanjiuMigration_Controls_and_Disrupted_Life_Courses_A_study_of_Livelihood_Strategies_of_Mainland-Hong_Kong_Cross-Border_Famil

- 郭志儀 (1997) 〈香港的經濟發展與移民〉, 《西北人口》, 第 2 期。
- 陳國賁編, (2008) 《吾家吾園: 中港家庭的社會學研究》, 香港: 中華。
- 陳國賁編, (2011) 《貧窮與變遷: 香港新移民家庭的生活故事》, 香港: 中華。
- 陳淑敏 (2009) 〈跨越界線: 高度現代性社會脈絡下公民身分領域界定之探討〉,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29: 95-134。
- 陳慧文 (2011) 〈廢婚, 廢家, 廢姓: 何震的 [盡廢人治] 說〉, 《置疑婚姻家庭連續體》, 新北市: 蜃樓出版社, 69-89。
- 彭澤生 (2010) 〈港右? 互聯網上對新移民的憎惡〉, 《文化研究@ 嶺南》, 20(1), 5。
- 曾熾芬 (2006) 〈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 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61: 73-107。
- 甯應斌 (2012) 《民困愁城: 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 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黃宗儀 (2008) 〈全球城市區域治理之外香港的跨境身分論述與再現〉, 《地理學報》, 52: 1-30。
- 黃洪 (2015) 《「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 香港: 中華。
- 黃德北, 2006, 〈全球化與夾處在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珠江三角洲農民工〉, 《政治學報》, 44: 67-100。
- 趙永佳、丁國輝、黃子為、&尹寶珊 (2014) 〈現代香港人的傳統家庭觀念〉, 《當代港澳研究》, 79-81。
- 趙永佳、呂大樂, 1997, 〈當工廠北移之後——香港工業轉型與就業問題〉, 《香港: 文明的延續與斷裂?》臺北: 聯經, 231-263。
- 趙彥寧 (2004) 〈現代性想像與國境管理的衝突: 以中國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案例〉, 《台灣社會學刊》, 32: 59-102。

- 趙淑珠 (2003) 〈未婚單身女性生活經驗之研究: 婚姻意義的反思〉, 《教育心理學報》, 2: 221-246。
- 劉梅君 (2000) 〈“廉價外勞” 論述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38: 59-90。
- 劉愛玉、佟新 (2014) 〈性別觀念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基於第三期全國婦女地位調查〉, 《中國社會科學》, 2: 116-129。
- 潘毅、盧暉臨、張慧鵬 (2011) 《大工地上中國農民工之歌》, 香港: 商務。
- 蔡明璋 (2002) 《權力, 性別意識, 親密關係與家務分工》, 論文發表於台灣社會學會 2002 年年會論文, 台中東海大學: 台灣社會學會, 12: 14-15。
- 蔡雅玉 (2001) 《台越跨國婚姻之探》。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昭娟 (2000) 《國際遷移之調適研究: 以彰化縣社頭鄉外籍新娘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論文。
- 駱穎佳 (2016) 《邊緣上的香港: 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 香港: 印象文字。
- 薛澤華等編, (2001) 《回憶: 新來港婦女口述歷史》, 香港: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 藍佩嘉 (2014) 〈遷移的女性: 再生產危機與交織的壓迫〉, 《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 2014 年》, 頁 309 至 341。
- 藍逸之 (2013) 〈一個新自由城市, 兩種都市政權? 1997 後香港都市治理的空間爭議〉, 《城市學學》, 1: 89-141。
- 羅小鋒 (2001、2008) 〈家庭策略視角下的香港: 內地跨境家庭維繫—基於香港內地移民的實證研究〉, 《南方人口》, 第 4 期。
- 羅永生 (2014) 〈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思想》, 26: 113-156。
- 譚深 (1997) 〈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性別差異〉, 《社會學研究》, 1:42-47。
- 顧燕翎主編 (2000) 《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 台北: 女書文化。

西文部分：

- Arif, Dirlik. (1993) Modernism and anti-Modernism: Maoist Marxism,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Autumn, 37-46.
- Bogue, D. J. (1969). Migratio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Principles of Demography*, John Wiley, New York, 752-823.
- Coltrane, Scott. (2000). Research on Household Labor: Modeling and Measuring the Social Embeddedness of Routine Family Work,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1208-1233.
- Constable, N. (2003).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Pen pals,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mail order" marri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nstable, N. (2005). A tale of two marriages: International matchmaking and gendered mobility. *Cross-border marriages: Gender and mobility in transnational Asia*, 166-186.
- Croll, E. 1981. *The Politic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n C.C. and Huang.Y.Q (1998). Waves of Rural Brides: Female Marriage Migration in Chin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88: 2.
- Farrer, J. (2014). Love, Sex, and Commitment: Delinking Premarital Intimacy from Marriage in Urban China. In *Wives, Husbands, and Lovers: Marriage and Sexuality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Urb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alo Alto.
- Gayle Rubin (1975).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New York : Monthly Review Press.
- Glodava, M., & Onizuka, R. (1994). *Mail-Order Brides: Women For Sale*. Fort Collins. CO: Alaken, Inc.
- Ho, Wing-Chung et al. (2014). Determinants of perceived integration among Chinese migrant mothers living in low-income communities of Hong Kong: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ervice practitioners.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
- Hochschild, A. (1989). *The second shift*. New York: Avon Books.
- Hsia, Hsiao-Chuan, (2015), Reproduction Crisis, Illegality, and Migrant Women under Capitalist Globaliz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in Sara Friedman and Pardis Mahdavi (eds.) *Migrant Encounters: Intimate Labor, the State and Mobility Across Asia*, pp, 160-183,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Ishii Yuka 1996, "Forward to a better life: The situation of Asian women married to Japanese men in Japan in the 1990s". In G. Battistella and A. Paganoni (eds) *Asian Women in Migration* (Quezon City: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pp. 147-164.
- Jampaklay, A. (2006) How does leaving home affect marital timing? An event-history analysis of migration and marriage in Nang Rong, Thailand. *Demography*, 43(4), 711-725.
- Kvale, S. (1996) . *Interviews: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California: Sage.
- Law Kam-ye and Lee Kim-ming. (2006). Citizenship, Economy and Social Exclusion of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6(2): 217-242.
- Li, Wai-ki Viki. (2001) *Seeking an Ideal Wife: Why Hong Kong Men Pursue Mainland Chinese Spouse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 Phil. Thesis.
- Love, Heather (2008), Compulsory Happiness and Queer Existence .*New Formation: A Journal of Culture /Theory/Politics* 63, 52-64.
- Ma, E. K. W. (2006) Transborder visibility The cultural transfer between Hong Kong and South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9(3), 347-357.
- Ma, Zhongdong (John), et al. (2010). Examining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Hong Kong: 1998-2005 .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Demographic Patterns and Social Issues*.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87-101.
- Major, Brenda. (1993). *Gender, Entitlement, the Distribution of Family Labor*.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49(3):141-159.
- Manser, M., & Brown, M. (1980). Marriage and household decision-making: A bargaining analysi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1-44.
- McElroy, M. B., & Horney, M. J. (1981). Nash-bargained household decisions: Toward a generalization of the theory of dem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333-349.
- Nicole, Newendorp. (2008), *Uneasy Reunions: Immigration, Citizenship, and Family Life in Post-1997*. Hong Kong: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iper, N., & Roces, M. (Eds.). (2004).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Pong, Suet-ling, et al. (2014). Blurring Boundaries? Immigration and Exogamous

- Marriages in Hong Kong.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0(4): 629-652.
- Sassen, S.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 Siu, Helen F. (2008) Positioning 'Hong Kong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Helen F. Siu and Agnes S. Ku (eds.), *Hong Kong Mobile: Making a Global Popul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pp. 117–148.
- Sternberg, R. J. (1986). A 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 *Psychological Review*, 93(2), 119–135.
- Sternberg, R. J. (1988). *The Triangle of Love*. New York: Basic Books.
- Tu, J. C. 2007. Cross-Border Marriage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tion and Society* 3: 29-43
- Wang, Hong-Zen and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2009) Gender, Family and State in East Asian Cross-Border Marriages, editor(s): Hong-Zen Wang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1-12,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William Lucy. (2010). an overview of global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Cross-Border Marriage Migration in Global Context*. Palgrave Macmillan UK.
- Yamanaka, K. (2009) Intermarriage between Nepali Migrant Men and Citizen Women in Japan. editor(s): Hong-Zen Wang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Cross-border marriages with Asian characteristics*. 147-175, Taipei: Center for Asia-Pacific Area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 Yan, YunXiang (2003) *Private Life under Socialism: Love, Intimacy, and Family Change in a Chinese Village 1949-199*.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Y., Hannum, E., & Wang, M. (2008). Gender-based employ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s in urban China: Consider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arriage and parenthood. *Social Forces*, 86(4), 1529-1560.